

LU CHENG SHI ZHI

2021 | 春夏卷(总第15期)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鹿城史志

资料来源“鹿城史志”地方志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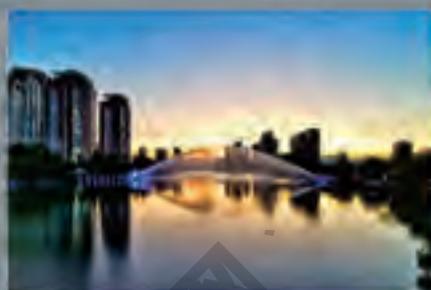
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
温州市鹿城区地方志研究室

主办

白鹿光影



夜色辉煌



星河夜色



佛光塔金碧



佛光塔



壮观岛风貌

摄影作者: 吴 莹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鹿城史志

LU CHENG SHI ZHI

2001 年总第(八第)期

内部发行 5.00/册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温州市鹿城王梅象馆 主办
温州市鹿城区地方志办公室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鹿城史志》

2021 | 春夏卷（总第15期）

主 任 朱如明

副 主 任 王剑峰

委 员 李洪湖 谢一方 戴爱华

主 编 王剑峰

审 校 沈蒲州

责任编辑 戴爱华 孙任翔 李岳松 朱凌云 褚宏健

编 务 林 旷 商 艳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庆祝建党
100周年
专题**

- 改革开放与中国鞋都的崛起
——以鹿城鞋业发展为例 李岳松 01
- 实践传承“红船精神”的思考
——让“红船精神”助推温、台两地
发展携手与共 李晓松 16
- 浅谈温独支的红船精神 金上进 25
- 创业团队中“小知阶层”对“温
独支”组织失败之影响研究 周生辉 叶未央 34
- 浅析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鹿城
经济的影响
——以1992年至1997年为例 朱景绣 44

往事琐谈

- 革命夫妻胡识因与郑恻尘 刘定卿 52
- 由老干部的子女看其父辈的高风亮节
——浅议学党史中的一点体会 周坚建 62
- 当年，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杨建新 65
- 周少莲与东山书院 周邦杰 69

记忆人物

- 缘结鹿城 情融党办 王邦志 73
- 我的大学 徐波克 82
- 童年轶事 王曙 93
- 童年印象
——在温州乡下的那些日子里 诸向东 104

| | | | |
|-------------|----------------------------|-----|-----|
| 瓯越人文 | 弘一大师的“第二常住”地庆福寺 就在这里 | 黄培量 | 115 |
| | 温州历史上十大书院 | 周晓明 | 121 |
| 考据索隐 | 陈宜中通归之地青奥考略 | 张鹤松 | 127 |
| | 谈《温州市鹿城区地名志》中景点 对联的一些问题 | 沈洪保 | 146 |
| | 1166年，温州那场海溢 | 朱继亮 | 154 |
| | 《先妻薛氏孺人圻志》释读 | 王剑峰 | 162 |
| 艺苑漫兴 | 诗图九山 | 黄兴龙 | 166 |
| | 康宁巷的往日时光 | 贾振葵 | 176 |
| | 书法探讨七则 | 浮石 | 181 |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改革开放与中国鞋都的崛起

——以鹿城鞋业发展为例

李岳松

温州（鹿城）鞋革业源远流长，早在 500 多年前的明朝成化年间，温州生产的靴鞋就已成为朝廷贡品。在新中国成立后，温州皮革业更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第一双猪皮革皮鞋、第一双硫化皮鞋、第一双压模皮鞋、第一双胶粘皮鞋等全部诞生在温州。可以说，温州鹿城是中国鞋革业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绵延不断的中国鞋革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和代表。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神州大地。地处东海一隅的温州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领改革开放之先，开始在市场上敏锐地寻找先机。

1981 年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原温州市所属的国营、集体鞋厂，全部划归市管，温州城区仅留下几家街道小鞋厂。鹿城鞋业只得从头起步，重新发展。鹿城鞋业在改革大潮中崛起，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走出了国门，建成了中国鞋都，成为中国鞋业的航母。

一、鹿城鞋业的发展历程

1、在改革大潮中崛起的鹿城鞋业

1978 年，鹿城境内有国营鞋厂 2 家，大集体鞋厂 8 家，街道办鞋厂 9

家，皮鞋年产量达 49.68 万双，制鞋业基本是国营、集体一统天下。20 世纪 70 年代末，温州第一皮鞋厂率先突破禁区，设计并生产了一批半高跟胶粘女式鞋，博得女士的青睐而风靡全国。

余阿寿、陈国荣、郑秀康等一批原先在国有和集体鞋厂从事皮鞋制作业的先觉者，以自己从事鞋业的经历察觉到了一个浩淼无际的“市场”，也嗅到了政策变化松动的气息。

1980 年，郑秀康毅然辞职，忍痛离开他为之奋斗 20 年的鞋革企业，夫妻俩创办了“红象皮鞋制作场”，1983 年更名为鸿盛皮鞋皮件厂，1985 年，郑秀康牵头，让亲戚朋友参与“风险股本金合作”——温州特色的股份合作方式。到 1987 年上半年，鸿盛皮鞋皮件厂已拥有近 500 万元资产。

1981 年，经过多年磨练的余阿寿，终于鼓起勇气，做出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在老家租下 40 多平方米的农民房，办起了皮鞋工场。翌年，“借”得一块社队企业的招牌，在郊区办起了南塘皮鞋厂。后来又与人合股，创办双华皮鞋厂、黎一皮鞋厂。到 1988 年，改为洪殿街道企业康达皮鞋厂。六七年间，余阿寿的鞋厂不断发展，先后在金华、九江、武汉等地开设皮鞋店和销售网点 30 多个，年销售额高达 1000 余万元。这些网点是实施专卖、建立营销网络策略的雏形。这一创造性的举措，也是余阿寿对温州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功绩。余阿寿的“皮鞋寿”雅号自此不胫而走。

鹿城个体经济，以制鞋业作为突破口之一，率先破土而出，并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在温州掀起一股“皮鞋热”。一大批从二轻系统集体鞋厂出来的熟练技工或退休离职人员，通过以师带徒方式，传授制鞋技术，很快地成为带动鹿城鞋业发展的技术骨干。到 1981 年底，全区个体鞋户已有 99 家，“皮鞋佬”成为全区民营经济的“元老”和先锋。

这些个体私营鞋厂，率先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形成应变快速的灵活机制，厂长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每年春夏，厂长（经理）们将在广州、深圳等地捕捉、采集到的鞋类最新市场供求信息、鞋样流行款式、样品带回温州。不到 20 天，就能研制开发出式样新颖、

外观漂亮、价格低廉的新产品。如此循环往复，新产品、新款式层出不穷，告别了过去国营集体制鞋企业三年五载才换一个款式的历史，使温州生产的皮鞋产品颇具市场竞争力。随后，通过温州模式的供销大军，把新产品推向全国，并迅速开拓市场。

这时期，温州鞋业产销旺盛，不管质量如何都能销出。1987年全区鞋产量达342万双，产值3932万元。在鹿城来福门、信河街、西站一带有1000多家柜台，形成鞋商云集的鞋类专业批发交易中心，被誉为“鞋城”。温州很快成为闻名全国的鞋类生产基地。这时期创办的一批鞋厂，如1988年的私营鸿盛皮鞋皮件厂（先后改为长城鞋业公司、康奈集团）等后来都脱颖而出成为鹿城一流鞋类企业。

2、在艰难曲折的整顿中求发展

鹿城鞋业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正当温州鞋红遍全国时，一些厂家见利忘义，温州鞋不再物美价廉，而是粗制滥造、以次充好，中间商又一味追求廉价而不顾及品质，造成产品质量急剧下降。不少劣质鞋流向全国，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引起强烈不满。1987年8月8日，温州皮鞋跌进了自己挖下的泥坑里，一些打着上海联营招牌的温州劣质皮鞋被曝光，杭州武林广场火烧温州劣质皮鞋5000多双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中国。温州劣质鞋先后在上海、锦州、辽阳、柳州等地被查处，并在报纸上曝光。随后南京、武汉、上海等10多个城市纷纷采取措施，明令禁止销售温州鞋，拒绝温州鞋进入市场。顿时，曾经走红全国的温州鞋声誉一落千丈，温州如同“瘟州”那样，让人厌恶、让人鄙视。由于销售受阻，产量急剧下降，很多制鞋企业纷纷倒闭。

虽然这把“火”中并没有鸿盛皮鞋，但从各地驱赶温州鞋的事件中说明，大众已认定“凡打温州牌的都是伪劣粗制产品”，直接波及温州生产质量上乘的厂家。郑秀康携带自己工厂精心加工的款式新颖、质量优良的皮鞋，赶往全国各地“游说”。各地客户都说：“你的皮鞋做得好，但你的皮鞋是温州的，‘出生’不好啊！”痛心疾首的郑秀康回到温州后当即立下誓言：

“我要生产温州最好乃至中国最好的皮鞋！”

1990年，国家轻工业部等中央6个单位联合发出《坚决制止生产经营伪劣皮鞋的通知》，其中点名晋江、泉州、温州等地生产的劣质皮鞋。国家派出6个部委领导组成“温州鞋业整顿小组”到温州，指导温州整顿鞋业生产。

面临严峻的形势，温州市、鹿城区党委和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对鞋业生产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并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

首先，职能管理部门加强领导，并建立行业协会，实行双管齐下。1988年6月4日，中国鞋业第一个协会——温州鹿城鞋业协会宣告成立。在授牌仪式上，协会联合370多位鞋厂厂长发出倡议：“凡我鞋业同仁，都要以鞋城声誉为重，讲究皮鞋质量，不赚昧心钱。”1989年，建立鹿城区鞋业质量整顿管理领导小组并设办公室，开始对鞋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区工经委设立鞋业管理科；各街道（乡镇）具体落实一、二名鞋业专管员；区鞋业质量检测站同步设立，区政府拨款购置检测专用设备。

其次，制定规章，狠抓整顿。协会与有关部门一起制定了《鹿城区鞋业质量整顿管理条例》《鞋类质量整顿验收细则》（以下简称《条例》《细则》）等一系列加强质量和行业管理的文件，全面开展清理整顿。《条例》规定1989年起暂停审批鞋类新企业，对现有的制鞋企业按《细则》逐家进行质量检测、整顿验收，逐项考核评分，对合格者，颁发合格证；未合格者，限期改进再检；再检不合格者，吊销营业执照或停产整顿。同时，大力开展对假冒、劣质“三无”皮鞋的查处活动，取缔无证生产单位23家，坚决杜绝“三无”皮鞋。

第三，大力开展创优争先活动，重树温州鞋业形象。1990年6月5日，鹿城鞋业协会联合全区鞋业企业发出治理经济环境、恢复温州鞋声誉的“倡议书”，开展评选鞋类产品“信得过”企业；1990年起，举办“鹿城杯”鞋业产品大奖赛；1991年11月，鹿城鞋业协会在中央电视台举行“鞋城新貌”新闻发布会，为温州鞋质量正名。会后，《经济日报》刊发《痛定

思痛，从严治理，“温州皮鞋”再次赢得市场》，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至1991年底，1264家制鞋企业有78%获得合格证。

1992年上半年，举办首届鹿城鞋文化节，国内外客商、经济界人士400余人，新闻单位30余家应邀参加，边听汇报、边实地考察鹿城鞋业整顿成果，重树鹿城鞋业形象。是年7月，经国家技术监督局对28个省、市制鞋行业的统一检验，鹿城皮鞋的合格率达77.4%，高于68.9%的全国平均水平。经过3年持续的清理整顿，鹿城皮鞋的质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同时，鹿城区还组织举办鞋类产品“信得过”企业评选活动和“鹿城杯”鞋类产品大奖赛。截至1997年，“鹿城杯”鞋类产品大奖赛已连续举办7届，评出“信得过”企业106家，其中78家制鞋企业获保质免检。

3、重现辉煌，走出国门

20世纪90年代，鹿城鞋业在整顿、提高、发展中，逐步走向成熟，进入发展成熟提高阶段，从上规模、创品牌，到进军国际市场。

一是企业上规模扩大生产。鹿城鞋业摆脱家庭作坊经营模式后，皮鞋厂纷纷移向上桥、下桥、黄龙、双屿和仰义等地。据1992年6月统计，鹿城区有皮鞋厂1264户，其中集体818家、个体446家，鞋料店252户，皮鞋店845户，从业人员达8万多人；年产皮鞋1600万双，年产值逾5亿元。至1998年，已有100多家企业在市郊开发区建成120多万平方米厂房，结束长期以来靠租用民房生产的历史，企业规模迅速扩大。

1988年至1989年间，郑秀康先后去上海、广州和意大利等地考察学习国内外优秀的制鞋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从中寻求重振温州鞋业的道路。1990年春，将鸿盛皮鞋皮件厂更名为温州长城鞋业公司，并注册了寓意“健康发展、其奈我何”的“康奈”人头肖像商标；投入百万巨资，改造温州原始手工作坊的制鞋工艺。

1989年华生皮鞋厂引进第一条机械化生产流水线，至1998年全区已拥有生产流水线近400条。一些龙头企业已配备电脑、扫描仪等，以CAD先进技术代替人工设计鞋样。

二是创名牌成为企业奋斗的目标。鹿城鞋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三无”产品，发展到1995年，有266家鞋类企业注册商标，并开始走上创名牌之路。1990年在全国鞋帽展销会名优产品评比中，鹿城鞋类产品获质量、设计等4个奖项的一等奖。在1993年“中国首届鞋业大王博览会”上，长城鞋业公司捧回了温州有史以来首次国家级殊荣——“中国十大鞋业大王”称号，霸力皮鞋被评为“中国创新鞋王”，吉尔达等3家鞋业公司获“金鞋奖”，另有6家鞋业公司被列为推荐产品。温州鞋业的产品赢得了市场与消费者的青睐，为温州市“质量立市，二次创业”工程打响了第一炮。是年，温州举办鞋业花色品种、设计大赛，全市26家企业获奖，鹿城就占了10家。

郑秀康和他的长城鞋业公司启动第二次技术改造项目。从1990年开始投入100万元，改造原始制鞋工艺后，又于1996年投入600余万元购进台湾制鞋设备，并率先引进CAD、CAM多维电脑设计系统。1993年成功研制生产了欧派的“大丽莱”高档商品男鞋。1994年，郑秀康代表温州皮鞋企业赴沪参加“真皮标志”筹备会议。他的“大丽莱”精品皮鞋让同仁感到惊讶，人人赞不绝口：“想不到在短短的5年里，温州皮鞋业变化这么大，发展这么好！”这些产品不仅改变了广大客商对温州皮鞋的看法，更增加了社会对温州产品的信任感。

1995年，在成都举办的全国优质轻工产品交易博览会上，东艺、池尔等13家鞋企获金奖。同年，巨一鞋业集团总经理、女企业家李爱莲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并发言，鹿城24家鞋类产品获“95世界妇女购物节”金奖。1996年，济南“首届中国鞋业博览会”上，评出全国设计金奖10名，鹿城占了3名；获设计银奖者20名，鹿城占了5名。1996年，“康奈”为温州鞋业获得第一个“真皮鞋王”称号。1998年，“康奈”“吉尔达”皮鞋，双双摘取“中国真皮鞋王”称号，“康奈”两度蝉联这一荣誉称号。在全国10家“中国真皮鞋王”中，温州有3家，鹿城有2家。是年，全区已获准拥挂“真皮标志”企业6家，占全国52家的8.66%。同年9月，长城、吉尔达、霸力、富利得、奇伟等企业，被全国制鞋标准

化中心评定为“贯彻鞋类标准模范单位”，占全国的22%。长城还被授予“中国鞋业质量龙头”称号。截至年底，全区已有“康奈”“吉尔达”“浙霸”“东艺”4家鞋企获浙江著名商标，其中“康奈”“浙霸”“吉尔达”荣获浙江名牌称号；长城、吉尔达、爱迪斯、东艺、霸力等8家获“浙江省消费者信得过产品”称号。1999年12月，“康奈”获“中国驰名商标”，为浙江省3个驰名商标之一。在2000年全国“真皮标志杯”皮鞋设计大奖赛中，东艺荣获唯一的女鞋特等奖和男鞋一等奖第一名。同年10月，东艺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三是走出国门，进军国际市场。在巩固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鹿城鞋业努力开拓国际市场。1995年至1998年，鹿城区共组团12批178人次，先后参加了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鞋类展览会，第七届莫斯科国际鞋类、皮革制品及设备展览会，美国春秋两季制鞋业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第26届国际制鞋技术展览会等，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截至1994年，全区出口鞋企24家，到1995年增至68家，出口值2.15亿元。1998年，出口值达6.4亿元。全区外贸出口中，鞋类商品名列前茅，所占比例达22.09%。

4、从假冒伪劣皮鞋到被他人假冒

鹿城区委、区政府狠抓品牌战略，鹿城鞋业狠抓鞋品质量，鹿城皮鞋在激烈的竞争中重现辉煌，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随着温州（鹿城）皮鞋业的不断发展，先后在边贸活跃地区乌鲁木齐建立了鹿城鞋业协会，在国内鞋类批发市场武汉市成立了温州鞋业经营者分会。为适应鞋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骨干企业开始采用网络连锁经营和地区总代理、总经销等经营方式推销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鹿城皮鞋的质量、知名度和信誉不断提高，令外地客商刮目相看。从1987年下半年的外地拒销温州鞋，到90年代初外地鞋城纷纷到温州招商，把目光盯着温州，使鹿城鞋业的产值、产量大幅度提高。1993年、1994年，天津温州鞋商城、上海永益鞋城、黑龙江黑河市鞋城、北京虹桥贸易中心、南京金鼎市场等客商络绎

不绝地来鹿城招商，这与过去的市场销售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

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对全国制鞋企业统检，鹿城皮鞋合格率为7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8.8%；1996年，国家鞋类产品检验监督中心对胶粘皮鞋进行全国统检，鹿城合率为90.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7%，长城、吉尔达、三鹰等3家企业位列全国统检前20名。

从过去温州皮鞋假冒外地商标，到现在的温州鞋品牌成为别人假冒的对象。1996年，沈阳查获5家假冒鹿城产的“浙霸”牌女皮鞋的企业。1999年12月，杭州查获仿冒温州品牌皮鞋2000多双，并在杭州武林广场当众点火烧毁。中国皮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淑华称：“这说明温州鞋确实打了翻身仗。”浙江电台和《浙江日报》《温州侨乡报》报道：“12年前武林门一把火，把温州鞋烧得声名狼籍，烧醒了温州人的质量观；如今一把火，反映了温州鞋从仿冒别人到被别人仿冒，争回了温州鞋‘雪耻’的一口气”。时隔12年后，同样在杭州的一把火烧亮了温州人的新形象。

20世纪90年代，国内鞋类市场竞争十分激烈，鹿城鞋业仍保持日益发展的趋势。1992年，全区鞋类企业1405家，从业人员1.5万人，产值4.4亿元；1994年，鞋企增加至1882家，产值15.3亿元。90年代后期，一些有实力的大型鞋类企业兴起，而一批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迫停产注销，到1997年鞋类企业降至1072家，1998年再降至952家，但总产值却大幅度上升，达到32亿元。

此外，鞋类生产品种繁多，门类齐全，与鞋业协作配套生产的如鞋底、鞋楦、鞋跟、内衬、鞋盒等配套专业生产企业也都发展良好。鞋样设计异军突起，设计室有五六十家。各种鞋机厂数十家，1998年销售额近二亿元。鞋料专业市场由府前街迁到河通桥，并形成壬宅前、隔岸路 and 黄龙等鞋料市场，市区鞋料经销商店达500多家。

5、建成温州中国鞋都产业园，提高国际竞争力

1999年10月6日，规划面积6.5平方公里的温州鹿城（中国）鞋都

产业园区在双屿奠基，至年底已有 273 家制鞋企业申请入园。2000 年 7 月 28 日，温州市飞禽鞋业有限公司厂区举行开工典礼，园区首家企业进场施工。10 月 16 日，温州中国鞋文化博物馆在中国鞋都产业园奠基，2001 年 10 月建成开馆。2001 年 1 月，位于中国鞋都产业园的康奈集团第一家海外专卖店在法国巴黎开业，成为中国皮鞋在国外开设的首家连锁专卖店。3 月，康奈、吉尔达等品牌被国家质监局评为中国皮鞋类首批“国家免检产品”。7 月 19 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与园区办公室签署了联合成立鞋革业培训中心协议。同月 23 日，四川大学、温州大学联合在鞋都园区设立现代网络教学中心。9 月 12 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皮革工业协会联合发文，授予温州“中国鞋都”荣誉称号。至此，鹿城鞋业继续朝着“上规模上档次”的方向蓬勃发展。

2002 年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组团和企业自行组团出国，鹿城鞋业分别对东西欧、拉美、南美、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日本、古巴、乌克兰、迪拜、俄罗斯等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进行考察和洽谈业务达 1600 多人次。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制鞋设备、原辅材料、工艺和管理机制。一批龙头企业还在美国、意大利、法国、希腊、比利时、葡萄牙等国主要城市设立机构或开设专卖店，减少中间环节，降低销售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

2002 年 5 月 18 日，鞋业协会开通了“网上中国鞋都”电子商务网，有会员 1100 家，产品 2000 多种，至年底网站页面访问数达 8 万余次，到 2003 年底成为中国最大的鞋业电子商务平台。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鹿城已有 50 来家鞋企开展电子商务营销，其中康奈集团仅在 11 月 11 日这一天，就实现了 1350 万元的销售额。

2003 年 9 月，全球第二大零售商——法国家乐福将温州定为其在中国唯一的鞋类生产基地。康奈集团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已在国外开设 80 多家专卖店（柜）。12 月，康奈集团被中国轻工业经济联合会评为第二批 11 家“向世界名牌进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之一。同时，意大利帕拉会展公司在黎瓦中心展会扩建展馆，专门建立“中国鞋都”温州展馆。

2006年7月19日，面积达280平方米的首家康奈海外旗舰店亮相巴黎市中心，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鞋类”品牌跻身境外主流消费的标志性事件。

在国家有关部门授予温州“中国鞋都”殊荣形势推动下，鹿城区委、区政府加快中国鞋都产业园建设步伐。到2008年，中国鞋都产业园区已建成了鞋文化博物馆、鞋都文化广场、鞋都安心公寓。2009年，建成国家鞋类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鞋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鞋都小学、鞋都垃圾转运站等配套项目日趋完善。

温州中国鞋都产业园区于1999年8月筹建至2013年，园区一、二、三期和总部经济园一期先后建成投产。园区累计引进企业161家；其中一期引进24家，建厂房面积78万平方米；二期引进25家，建厂房面积45万平方米；三期引进企业66家，厂房建筑面积90万平方米；总部经济园一期引进企业46家，建筑面积15.3万平方米。鞋都三期已于2012年基本建设完工。2019年，园区集聚制鞋企业1300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90家，亿元企业14家；截至2019年10月，规上工业产值53亿元，增速4.68%；规模以下工业产值16.57亿元，增速14.04%；新产品产值17亿元，增速13.96%。有省级科技型企业6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

园区企业获得中国真皮领先鞋王2个，中国真皮鞋王2个，真皮名鞋1个，中国驰名商标16个，中国名牌2个，中国出口名牌3个，国家免检产品28个，中国鞋都功勋企业4家，形成了名牌聚集、龙头企业聚集、生产要素聚集的良好态势和“品牌”“名地”效应。中国鞋都已成为一个集鞋类生产、贸易、科研、检测、信息、商务等于一体，功能齐全、配套设施和技术支撑服务体系日趋完善的国家级鞋业产业集聚区、国家级鞋类出口示范区。鞋都园区产业规模优势明显，战略地位凸显，是国家级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目前正在申报创建全国鞋业产业集聚区和全国鞋类知名品牌示范区。

鞋都产业园区已形成以鞋产业链及智能制造为特色的传统鞋革工业区，以皮鞋为主体产业和皮革机械、鞋用材料等配套完善的大、中、小企

业共存的鞋业产业体系，有中国鞋都鞋革城、集邦化工市场商务中心、国家鞋类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温州）、中胤省级重点企业设计院、鞋文化博物馆、鞋都文化广场（区图书馆）、温州中津先进科技研究院、温州国际鞋城、国际轻工淘宝城等检测、设计、展示机构和公共服务配套服务单位。近年来，广州、成都等鞋类生产基地高端品牌不断入驻。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产业创新化能力不足。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创意设计成本高、创新人才相对匮乏，鞋都本地企业多以中低端模仿为主，很少能独立开发和设计出有创意、高品位鞋样。鞋业价值链关键环节薄弱，自主研发、自主品牌相对缺乏等成为鞋业提升发展重要“瓶颈”。

企业国际化步伐缓慢。鹿城（中国）鞋都鞋企多以家族制企业为主，如康奈、巨一等，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利用资本市场运作“走出去”开展海外并购重组等国际化步伐较为缓慢，深刻影响产业升级、产业转型、渠道拓展和品牌延伸。

集群协同化发展薄弱。虽然园区生产网络健全，供应链体系完善，但鞋业同质化、过度竞争等现象严重，鞋业产品细分度不够，本地企业打价格战等现象严重，导致国内销售基本集中在二、三线城市市场；国际销售带来的贸易摩擦事件频发，产业集群缺乏协同化发展格局。尤其受疫情影响，国际销售受阻。

“产城分离”现象突出。园区的商业金融、休闲娱乐、公共服务等城市功能供给与配套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匹配中高层次人才公寓及员工宿舍等配套问题；人才、资金等要素集聚缺乏软环境支撑，制约鞋都进一步发展。^①

三、目标与发展思路

按照省市区三级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方案要求，以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为中心，切实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深化推进“鞋都名镇建设、时尚名师集聚、智造名企培育、创新名品提升”四大工程。

力争到 2022 年，形成以鞋产业链及智能制造为特色的传统鞋革小镇，重点发展鞋革制品业、配套产业制造业、现代物流产业以及设计、展示、交易等生产型服务业。培养和引进国际、国内知名鞋业设计师团队 20 个，规模以上企业上云 100%，5G 网络全覆盖，皮鞋产品质量总体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化、时尚化、集中化、品牌化发展水平，推进“中国鞋都”向“世界鞋都”发展。

（一）瞄准世界鞋都，实施鞋都名镇建设工程

1、**创建省级特色鹿城鞋艺小镇。**统筹推进空间腾挪，落实一期以生活为主，二、三期以智造生产为主的发展定位，为新一轮发展留出空间，努力打造沿江生活休闲景观带和智能集聚工业区，推进产城融合，确保 2022 年创成特色小镇。

2、**完善周边生产配套设施，吸引企业入驻。**抓住国内产能转移的机遇，吸引广州等地优质生产型服务业入驻，提高产业设计能力和销售渠道，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通过配套提升，新增规上企业、规上商贸业、规上服务业及亿元以上企业家。

3、**完善周边生活配套设施。**加大时尚智造区周边旧村整村拆建力度，补齐生活配套短板。充分利用边角地，加快开发建设蓝领公寓和文体休闲设施。建设蓝领公寓、新增标准化厂改房和中高端商业圈、完善园区路网，形成“快速 10 分钟”购物娱乐生活圈。

4、**完善周边生态配套设施。**持续防治大气污染和企业环评工作，优化丰门辖区沿河、沿路、沿山生态环境，完成管网治理工程，做好边坡环

境综合治理，改善生产生活环境。

（二）进入高端设计，实施时尚名师集聚工程

1、**引进时尚设计师。**依托市人才新政40条和区人才引进相关计划，汇集“创业创新”力量，培养和引进国际、国内知名鞋业设计师团队。组织高端培训和考察活动，推动创意设计理论教育和实践培训相结合。完善人才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用人环境。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加强与大专院校、温州鞋革职业中专的交流合作，建立创意设计教育实训基地。通过校地合作，创建四川大学温州鞋革产业研究院^②，开展技术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应用，推动鞋革业转型发展。

2、**建设时尚设计基地。**依托中胤时尚新建大楼开展招商引资，吸引国内外多领域创意领袖企业、知名设计师、个人工作室等入驻，形成创意设计、艺术培训、时尚传媒、知识产权等为主导的“时尚众创空间”。争取2022年底创成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个。

3、**创建省级重点企业设计院。**选择符合条件的鞋业企业和设计企业开展省级重点企业设计院的创建工作，如太极、珂卡芙等，支持企业引进国内外高端设计人才和团队，加快提升时尚创新设计能力。力争到2022年，新增鞋业时尚设计研究院。

4、**引进国际时尚盛会。**支持鞋业企业参展温州国际时尚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海国际鞋类博览会等行业相关博览会，扩大产业信息交流。举办各类国际鞋业交流活动，开展专业性学术交流和主题性高层论坛，承办一系列高端展会、赛事等，搭建国际、国内双向交流平台。每年举办鞋业设计大赛，鞋类采购节。

（三）创建国际一流，实施智造名企培育工程

1、**推进园区云平台建设。**搭建鞋业智造云平台，加快生产关键技术、关键设备的自动化、信息化升级改造，制定“企业上云”专项工作方案，

打造云上鞋都。借助科技力量，以数字化的科技驱动带来产业的变革，推动温州鞋革产业的转型升级。

2、打造鞋艺小镇智慧工程。通过建设 5G 公共服务网络，研发智慧小镇 APP，实现掌上租房、招聘、社保办理、商业服务等功能。建成数字化、智能化的鹿城时尚鞋旅小镇。

3、推进企业股改上市。培育彦林、巨一、中胤等重点成长型企业，实行一企一策，落实专门人员及时跟进帮扶，力争企业上市。2020 年 10 月，中胤时尚正式挂牌深交所创业板，实现鹿城建区后境内 A 股上市零的突破。

4、招引总部企业。用好招引政策和惠企政策，引进鞋业总部企业，加快总部经济发展，吸引外地龙头鞋业、配套企业、工业设计等鞋产业链总部企业入驻，带动本地企业加速发展。

5、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淘汰“低散乱”企业，提升整体亩均水平。壮大市场主体，保持市场整体活力。以创建“生态皮革”项目为突破口，寻找产业未来出路。以数字化的科技驱动带来产业的变革，借助科技的力量将中国鞋都建成数字化时代下的智能化时尚鞋旅小镇，推动温州鞋革产业转型升级^③。

（四）创设领先平台，实施创新名品提升工程

1、建设鞋业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用好太极、珂卡芙等相应阵地，支持行业骨干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实体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鼓励企业采取不同模式建设检测中心、设计中心和小试、中试实验室等研发机构。做好为企业提供产品设计、技术开发、专利申报等公共服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科技型企业。

2、开辟名品展销窗口。谋划建设高起点、高标准、高品质的鞋都会展中心、鞋都客厅，为鞋都企业提供专业化作品展示、产品展览和交易公共服务平台。引导时尚消费，发展网红直播营销，促进大众消费升级。支持依托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创建集时尚名品展示、发布、交易等功能的“在

线时尚产业带”、网上“时尚名品馆”。支持传统市场、商业街改造升级，科学规划采购商品和市场集聚区范围，搭建鞋业市场综合服务平台。

3、完善工作服务机制。为做好鞋都产业园区提升工作，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解决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把最优的政策整合到鞋都产业园区，激励广大企业投身行业改造、产业升级。加大投入力度，加快鞋业改造提升和产城融合步伐。

深化“四个平台”建设和“最多跑一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针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落实专人对接、专人代办、专人负责，实行快速受理、限时办理、销号办结。着力营造鹿城皮革产业良好的发展氛围，扩大区域影响力，提高鞋都产业整体竞争力。

注 释：

① 鹿城区丰门街道办事处《鞋都产业园区转型升级方案（2020-2022）》2019年12月。

② 谢树华《四川大学温州鞋革产业研究院昨天揭牌：打造温州鞋革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平台》《温州都市报》2020年10月20日第2版。

③ 钱金波《运用科技力量 才有温州产业的未来》《温州都市报》2020年10月20日第3版。

实践传承“红船精神”的思考

——让“红船精神”助推温、台两地发展携手与共

李晓松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这是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对“红船精神”的精辟概括，不仅再现了“红船精神”的伟岸风采，更为我们弘扬“红船精神”指明了方向。

浙南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刘英和粟裕率领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同浙南人民群众并肩作战，创建浙南革命根据地，成功召开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及一起战斗在瓯越大地上的“红十三军”“三五支队”“闽浙剿匪”“反蒋武装小股”的英烈们，都体现“初心为民，使命担当”的浙南革命传统与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我是一个幸运儿，1964年，19岁的我高考入伍大连海军舰艇指挥学院，1965年入党，开启人生26年戎马生涯和20年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领导工作；先后在东海舰队舟山基地军、师两级司令部从事作战参谋兼党委秘书工作；后因执行中央30号文件，温州市内卫、边防、消防三警合并组建武

警部队和浙南沿海缉私工作需要，被组织调任温州武警支队长兼温州地区海防指挥部副总指挥。转业地方后，先后担任市府打私办副主任、市江滨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亲历温州 16 年海上缉私和 5 年江滨路工程建设之后，返回市府至退休。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在退休十年之后，这些看似无缘文学创作和城市区域规划的人生经历，无意间成了我业余文学写作和城市区域规划的积淀。机缘巧合，让我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在“浙南红都”平阳山门的怀溪里，相逢神奇的“母婴石”，在其潜移默化的感召下，开始 25 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处女作《母婴石记》——温州一家人故事的写作，并于 2015 年 5 月付梓出版。此后，我又抱着把续集《母婴石记》——温州一家人的后续故事写得更好一些的想法，紧接着开始续集的创作；其间，还应邀参加鹿城区委党史部门组织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中国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征文活动，我撰写的“烽火岁月时，军民鱼水情”一文获得一等奖；《母婴石记》续集的写作也于前年（2019）初完成初稿，待机出版。

俗话说：“面有心生，心随境转”。相对于其他职业的作家、写手，我的这些业余写作话题，充其量，只是对人生往事的回顾，一生积累的收藏和对部队军营生活难忘记忆的回想而已。然而，真正挥之不去的写作记忆，却不是以上罗列的拙文笔墨，而是我同志愿者们一起，在“红船精神”鼓舞下，历时八年，用心血和担当编制而成的《中国·温州新港旅经济实验区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即关于设立环温州湾特别经济行政区的规划建议。换句话说，就是在退休十年之后的日子里，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用于对温、台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发展未来总体规划的思考与写作上。就这样，带着对这片红土地的敬畏之心，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并在自家书房的计算机上，日夜敲打报告文字，绘制规划图纸，陪伴我的是不眠的深夜与早起的黎明。

出乎意料的，是该规划不仅获得国家领导机关的关切重视，而且得到了当地党政机关与社会各界的好评。鉴于本文篇幅文字的限制和规划前期

工作的繁文縟节，现择其要，以浓缩的简朴故事，展示其蕴藏的梗概内涵。

走进红土地 感悟党初心

我曾在戎马生涯的时光里，写过这句自勉的警句：“自古有心天不负，从来有志事竟成。”出于对纪实文学《母婴石记》——温州一家人故事的写作需要，我把探寻“母婴石”出土在红土地——“浙南红都——平阳凤卧”红色记忆的契机，当作走进故事情节的敲门砖；并在平阳县山门镇怀溪溪畔的东门村租住的房子里采风写作，历时两年。几乎跑遍了凤卧镇、凤林村、冠尖山等附近高山密林，及诸如凤林、马哲、南士垟、吴士垟、河山、龙尾、平琪、南胜等大小村落；多次瞻仰了“山门红军公园”“一大会址”“冠尖纪念馆”及“浙南刘胡兰——郑明德纪念馆旧址”等。我从小喜爱听故事，记忆最深的就是学校老师讲述的，原中共浙南特委常委兼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与女儿“浙南刘胡兰——郑明德”的动人故事。但不同的是，百闻不如一见，身临其境，就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几乎每一次的探寻瞻仰都是一次红色洗礼；让我深深体会到，在这群山连绵的小山村里，中国共产党早已播下了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红色的革命斗争精神不仅深深烙在了平阳人民的心坎里，并正在转化为指引他们探索发展，建设美好家园的内在动力，让我心潮澎湃，无限敬畏。在“母婴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的脑海里好似有一股催人笔耕的思维流动，为我开启了对亲历往事的追忆，对人称浙南李双双、新中国初期的省级劳模——母亲王凤素一家三代人经历的风雨人生的回想，让我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顺利完成了纪实文学《母婴石记》——温州一家人故事的写作。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相信，扎根故乡土地，热爱当下生活，关心国家大事，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力所能及的贡献，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但是，树立起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特别是无私奉献精神，那就很不容易。由此可见，以“红船精神”和红区人民英勇斗争精神，引

领全国人民高擎传统旗帜，踏着英雄的足迹，昂首阔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路上，是当前国民教育的当务之急。

“生逢盛世，肩负重任。”现以笔者与自己对话的角度，我在想，至今已退休 16 年的自己，是选择与年轻人并肩战斗？还是居家养老，颐养天年呢？出人意料的是我选择的是前者，而且挑拣了为温、台两地规划携手与共发展未来的担子。不能不说，这是“红船精神”的鼓舞与红区人民英勇斗争精神的激励及自己人生潜能的发挥。何为“发挥人生潜能”？历尽日久天长的积累沉淀而形成的潜在能量，在国家与人民需要的时候，为之无私奉献。此外，该规划建议还得到不少特殊志愿者的支持与鼓励；特别应当感谢的是，原温州市府副秘书长兼计经委副主任郑明楠关于“温州应建经济新区”的提示；原中共鹿城区委党史办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岳松关于“温州湾经济新区规划离不开台州玉环市的参与”的建议；温州晚报雪君工作室，我们的党代表郑雪君也以“人大提案”推崇上述规划建议及原温州电视台领导、著名播音员吴翔吟呼吁相关新闻媒体关注该规划建议。

八年磨一剑 筑梦新港旅

“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城市规划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群众的满意度来衡量。”这是 2014 年 2 月和 2017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北京市时作的重要指示。

在 2013 年至 2021 年的八年时间里，我同几位志愿者一起，始终积极关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和温、台两地的经济社会现状，遵循“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与生态安全”的基本原则，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深入调查研究，洞开创新思维，潜心编制规划建议报告；多次给当地党委政府领导机关建言献策，获得好评。正如 2019 年 7 月 17 日温州市改革发展委战略规划处呈报市府分管领导“初步意见”的文首所言：“《温州新港旅

经济实验区总体规划建议》鸿篇巨制，高瞻远瞩。该规划聚焦于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提出在乐清、永嘉、洞头和玉环四地规划集港口、旅游与商贸为一体的实验区计划，描绘了温州发展的宏伟蓝图，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意义。”“对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不忘故里根，银发报桑梓。那时，退休后的我，完全可以不去承担这些，因为没有人可供使唤，也无更多的人可与商量，如此重大的区域性城市规划，没有人会孤军作战。但我知道，很多伟大的成功，都是从无奈的处境开始的，“红船精神”与“浙南红都”等革命老前辈的英勇斗争精神无一不是如此。有鉴于此，对温、台两地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知根知底的自己，没有理由置身事外。我们生活在新时代，沐浴在国家“民族复兴”“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和国家级新区各地申报入围的春风里，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并自然而然地激发出“老有所为”的洪荒之力。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其实，编制上述规划建议报告犹如“十月怀胎”。这八年的时间中，我们几乎都在与当地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乃至包括“海西区”“长三角”在内的跨省跨地的相关部门沟通了解、实地调研考察与相互交流；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在向国家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请示汇报中寻求关注支持；其余的大部时间都用在环温州湾的乐清、永嘉、洞头、玉环等四个县市区一线的奔走调研和与大自然的心灵沟通中寻求答案，几乎跑遍了环温州湾四县市区的山山水水、江溪坑潭、边寨村落、海岛湾岙；尤其是对港口岸线、机场选址、自贸港区、产业功能区等都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详细调研勘察。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通过八年时间的调查研究与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摸清了未来“温州湾经济区”的地理信息、自然资源、产业现状、陆海交通、山海风貌、海洋经济及发展空间、外部关联等事关城市区域规划的基本情况。

温州湾位于北起隘顽湾，南至南麂山列岛之间的水域，湾区附近大陆

由瓯江、飞云江、敖江等江河冲积，而成为我国有名的河网化地区，平原之后为浙南山地。其最美江河景致是以田园风光著称的楠溪江，著名的山水景观是毗连楠溪江的海上名山北雁荡山，濒海滩涂湿地资源最充裕的是乐清湾的玉环岛北部和乐清澳北端及南岳打水湾至翁垟歧头山以东，共计约百万余亩；温州湾由隘顽湾、漩门湾、坎门湾、乐清湾、黑牛湾、大渔湾等六个大小海湾组成；湾内主要水道航门有三蒜岛与石塘间水道、披山与大铜精间水道、长山与大鹿山间水道、鹿西岛与玉环岛间水道、沙头水道、黄大峡、青山北水道、南水道、深门洞头峡等九大航门水道构成。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温州湾区内至今尚有 50 公里的黄金深水岸线尚未得到合理开发利用，而且都是港湾四面环山，海岸景色优美，布局错落有致，极具“东方大港”与“国际航运中心”的风姿潜质；并能与山海特色的山水人文景观与海岛旖旎风光珠连璧合，自成国内旅游大市场和国际旅游目的地。

海湾经济是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新高地，全球 60% 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湾区部分。规划中的“新港旅”温州湾新区，总面积 9438.6 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 4580.3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5858.3 平方公里；其中用于“新港旅”区域城市建设和产业用地的陆域面积仅占 10% 以内，原则上不超过 458 平方公里，且均在生态红线之外，其绝大部分的陆域面积，特别是滨海湿地及海洋水域均纳入生态保护范围。旨在建设一个具有新时代特色、“一带一路”功能、“双循环”格局和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及产业升级、军民融合示范新区的特别经济行政区与浙南人民履行“红船精神”激情奋斗创建民族伟业的示范区。

初步勾勒的“新港旅温州湾新区”，定位高远，中国特色，国际标准。施行“自贸港”“自贸区”“台贸区”同时建；“自贸港”“国际旅游空港”“国际邮轮目的港”与“风电母港”同时建；“国际旅游目的地”“国内旅游大市场”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同时建；四个大中型控制型水库、26 个地下堰坝水库与 16 座 4A 级生态旅游景观小城、50 个 3A 级生态旅游景观村同时建；四所本科大学，四个三甲医院与两个国际人居生态城与中

国古村落影视城暨拍摄基地同时建的建城方案。

该规划拟将列入国家战略资本项目，建设分近中远三期，以“十四五”至“二零三五”三个五年计划内完成。其中“十四五”期间完成基础设施与主体工程投资，估算投资4.1万亿元，约占总投资金额的50%。由此可见，规划中的“新港旅温州湾新区”建设将走一条新路。

借红色底蕴 迎夕阳征程

如果有人要问：温、台两地的城市建设都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何还要设立“新港旅环温州湾新区”？

我的回答是：作为浙南最大和重要海港城市的温州、台州两地的发展均面临地理空间的严重受限，特别是在海空两港建设与旅游大市场建设方面的开发利用明显滞后薄弱，无法发挥应有作用，面对美丽富饶，风姿伟岸的温州湾的开发建设，孤掌难鸣，无力承担。实施温、台两地协同合作发展，是新形势下创新发展、打造新增长极的迫切需要。

设立“新港旅温州湾新区”，不仅有利于加速浙江省统一规划部署的温台大都市群的快速形成，也是有机链接和融入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并能有力推动两地同根同源的民营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甚至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积极贡献。

如果有人问我：当下的最大愿望是什么？你是七十六高龄的人，为何还要如此关注温、台两地的发展未来？

我的回答是：深望国家能将设立“新港旅温州湾新区”的规划早日列入“十四五”规划与“二零三五”远景规划；并希望温、台两市党委、政府积极携手，主动沟通协调一致，并经报省委、省府同意后，再向国家申报。

笔者关注温、台两地发展未来的初衷，只是抛砖引玉，只能尽微薄之力，但一个老共产党员，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应尽的公民义务。

其实，与其说义务编制《新港旅》温州湾新区规划是作者出于对革命工作的责任心与使命感；还不如说，这是“红船精神”的鼓舞和新时代的召唤，比起我们的革命前辈先烈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撒热血的无畏牺牲精神，我们所做的这点事，真的差距甚远，太平凡了。再说，虽然这份特殊的工作任务确实辛苦，也劳累，但也可让自己经受新的考验，成为追求价值实现，乐于奉献社会，在生命中享受最大幸福的人。

目前，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中国·温州新港旅经济实验区总体规划预可行性报告》的建议初稿，已于今年（2021）初呈报国家改革发展委，旨在为国家级高层次专家对该规划的经济效益、战略意义、实施条件进行充分论证和科学评估提供参考。



乐清湾大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毛主席在长征路上的名作《忆秦娥娄山关》中的豪迈诗句，创建“新港旅温州湾新区”，旨在对接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而规划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但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会因“一带一路”“双循环格局”战略指引下，加速崛起，更加繁荣昌盛！

我们坦言：让“红船精神”助推温、台两地发展，携手与共，温、台未来必将奋迅拔起！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浅谈温独支的红船精神

金上进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诞生，100年风雨兼程，100年峥嵘岁月，习近平总书记为“红船精神”内涵作了高度概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在红船精神引领下，1924年12月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以下简称“温独支”）在温州诞生，是浙南最早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浙南的开创者，揭开了浙南革命风云激荡、烽火连天的序幕。温独支领导浙南各界人民弘扬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忠诚为民的革命精神，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浙南的传播和发展，为浙南的救亡图存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认为，温独支的精神，也体现了“红船精神”。

一、温独支诞生缘起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近代中国外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受军阀混战和封建势力残酷剥削压迫，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均在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件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及“巴黎和会”的侮辱，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进程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2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派谢文锦、胡公冕等十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进修马克思主义理论。谢文锦是永嘉楠溪人，1921年12月入党^①，是我党最早党员之一。1924年8月下旬，中央委派时任中共上海地委组织部主任谢文锦回温州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全国革命形势，并筹建党团组织。

谢文锦与胡识因、郑恻尘夫妇是同乡人。胡系温州新民小学负责人兼女子师范学校教师，郑系温州中一花席公司总技师，比较容易接受先进思想。谢首先介绍她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温独支的成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②。

谢文锦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培养了一批先进青年，先后发展林平海、庄竞秋、胡惠民入党。1924年12月，温独支在城区新河街侯衙巷新民小学（曾氏宗祠）成立，胡识因任书记，由上海党组织直接领导。这是浙南最早成立的第一个中共党组织，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从此浙南人民的革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到1925年10月，温独支发展党员13人^③。在建党的同时，谢文锦又介绍了戴宝椿、金贯真、李得钊等8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温州支部，戴宝椿任书记。至1926年底，温独支共发展党团员50余人，为温独支的发展和壮大夯实了基础。

二、温独支主要事迹

1、反帝反军阀反恶霸。温独支成立不久，根据党中央指示，温独支人员帮助国民党员王超凡等成立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温独支成员以个人名

义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县党部工作。县党部建立后，温独支成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人士，领导开展各项革命活动。

1926年，北平发生“三·一八”惨案。4月10日，温独支发动温州学联会等10多个社团成立温州各界“京案后援会”。12日，温州学联会在十中召开殉难同胞追悼大会，声讨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并号召温州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捍卫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努力斗争。

1927年3月4日，温独支领导温州总工会、温州学联发动反英大游行。5日，又领导温州城区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举行罢工，声讨恶霸张焕坤依附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官府，欺压工人等恶劣行径，并捣毁其新建住宅。15日，组织瑞安城关农民、工人万余人召开大会，声讨压迫人民的“四凶十恶”的罪行。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并捣毁首恶鲍漱泉的住宅。

2、不断发展革命力量。1926年9月，温独支为发展革命力量，设干事会，下设文科支部和其他支部，学校设小组。10月，建立中共乐清支部，下设5个小组；11月，建立中共瑞安小组。1927年2月，改建中共瑞安特别支部，下设5个支部，同时在永嘉建立中共岩头支部。到1927年，温独支发展党员169人，其中温州城区61人（含今鹿城、瓯海、龙湾）、永嘉24人、乐清26人、瑞安34人、平阳（含苍南）11人、文成11人、泰顺2人。

3、三斗温州西山会议派。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11月，国民党内出现了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王超凡等人秉承西山会议派旨意，在温州大搞分裂活动。于是温独支跟以王超凡为首的温州西山会议派展开了三次斗争。

一踢西山会议派王超凡。在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大期间，由于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大会重申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会后，胡识因返温贯彻会议精神，改组了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将王超凡、魏介夫踢出党部，而以郑恻尘、陈仲雷、戴树棠、胡识因和国民党员王纪、项强、吴秋江等为执委。

二毁温州大公报馆。1925年5月11日，该报登载西山会议派的爪牙——一个姓管学生写的一篇歪曲事实的报道，恶毒攻击革命学生，引起公愤。第十师范小组，在温独支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召开师生大会，决定开除姓管的学生。学生代表到报社与西山会议派论理，竟被他们污蔑造反，代表们怒不可遏，召集三四百位学生冲进报社，捣毁了报馆。

三促“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活动召开。1926年5月，温独支筹备纪念“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大会时，西山会议派诬告郑恻尘借口纪念“五卅”，扰乱治安，阴谋暴动，造成郑恻尘被反动当局无理扣押，并禁止举行纪念会。温独支全体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义愤填膺，集中在司令部前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郑恻尘。十师学生戴国鹏等还组织敢死队，欲与王超凡死拼。反动当局慑于广大干部群众舆论的压力，只得释放郑恻尘，于是“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如期在十中召开^④。

4、广泛开展群众运动。1927年1月，温独支领导人、永嘉县农会会长王国桢，深入农村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县成立500余个农会，会员达9万余人，在全县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和抗税斗争，推行“耕者有其田”新举措。

1927年2月，温独支成员、平阳县农会会长张培农，领导全县发展几十个农会，会员数万人。4月8日，在温独支的领导下，张培农、吴信直召集平阳江南、万全和小南等地农会会员千余人，在县城召开批斗大劣绅吴醒玉大会。

5、迎接北伐军入温州。1927年1月15日，温独支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迎接北伐军独立第三师三团的宣传队首先进入温城。17日，县党部召集各界代表开会，成立“温州各界欢迎北伐军大会筹备会”和“永嘉公团革命军招待处”。24日，在温独支的领导下，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温州市民庆祝北伐胜利大会^⑤。

三、温独支的红船精神

1、**温独支具有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军阀混战的旧中国，1924年12月，温独支成立，以奋斗者的勇气，追求革命理想，以探路者的魄力，驱黑暗迎曙光，以先行者的姿态，勇立时代潮头，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温独支是温州地区第一个党组织，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温州的开创者。

“大革命”失败后，温独支首创者谢文锦、领导人郑恻尘被捕牺牲，温独支陷入困境。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以温独支成员为骨干的共产党人，发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在浙南大地坚持不懈地斗争，先后创立了中共浙南特委、红十三军和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他们及时转入农村，发展党员，整顿和恢复农会组织，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红十三军武装斗争遭受严重挫折时，中共温州特委领导人（温独支成员）王金姆、王国楨、朱绍玉相继牺牲，以原温独支成员叶廷鹏、陈卓如为首的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以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继续举起革命大旗，前赴后继，开拓前进，成立了中共浙南委员会，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浙南游击区，积极与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取得联系，迎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进驻平阳北港，为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断地把浙南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有力策应和支援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

2、**温独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其奋斗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反帝反霸。**温独支建立三年来，坚定理想信念，为人民的正义事业而斗争，领导温州学联会召开“五卅惨案”殉难同胞追悼大会，声讨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发动温州人民反英大游

行；发动温州城区码头工人、建筑工人、瑞安城关万余农民、工人与恶霸分子进行不屈不挠地斗争，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伸张正义，捣毁恶霸的住宅。

二是打击右派，三战三捷。剔除了西山会议派的王超凡，捣毁了西山会议派把持的《温州大公报》报馆，促成了五卅惨案纪念活动如期召开。

三是发动群众，打击黑恶。温独支领导永嘉成立 500 多个农会，会员达 9 万余人，在全县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和抗税斗争。在平阳万全、小南等乡镇成立几十个农会，会员数万人，还召集会员千余人，集中到县城举行批斗大劣绅吴醒玉大会，沉重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

四是坚持反蒋，不屈不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王超凡、魏介夫等人，大肆逮捕温独支领导人和温籍共产党员，疯狂屠杀温独支领导人谢文锦、郑恻尘、蔡雄、金贯真和革命群众，还通缉温独支主要领导人胡识因。同时，取缔了以左派为核心的工农学各级群众组织，温州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

然而，温独支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征服、吓倒，全部转入地下，他们在南门外荷花地方，租来一间房子，出版油印刊物《照胆报》，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罪恶，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以及矢志与敌人斗争到底的革命意志。

3、温独支具有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立党为公，就是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忠诚为民，就是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说，共产党立党的初心，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是共产党的奉献精神。

温独支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站在人民的立场，替人民办事。每次运动，比如分田地、抗捐税、打土豪，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利益，直接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其切身的苦痛；每次运动，如声援“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大游行，都喊出了被压迫人民反帝爱国的心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狰狞面目。

无论是组织工会、农会，还是学联、妇联，最终目的都是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正因为站在人民的立场，立党为公，所以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持。

四、温独支的红船精神启示

温独支的红船精神留给我们后人启迪良多，主要有：

1、红船精神昭示我们，**敢为人先，敢于担当**。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因循守旧，要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敢于突破前人的勇气和智慧，自觉克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100年来，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红色根脉历久弥新，温州人民敢为人先，敢于担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的历史地位，演绎了《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人》和《温州三家人》的精彩传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温州实践。

时至今天，我们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像温独支革命先烈们一样，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坚定信念，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敢于担当，再铸温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辉煌。

2、红船精神昭示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温独支从成立之日起，就坚定理想信念，为践行理想而奋斗，团结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起来革命，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用逮捕、屠杀，把共产党扼杀在摇篮里。可是共产党员没有被杀绝，百折不挠，转入地下，打击敌人，排除万难，取得胜利。

今天红船精神鼓舞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不怕艰难、坚韧不拔、矢志拼搏、艰苦创业，敢于担当起历史的重担，奋力贯彻“八八战略”，全力推动经济大市向经济强市、创业之都向创新之城、基本小康向高水平全面

小康迭代升级，把温州建设得更加美好。我们还要牢记习总书记指示，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各个环节，克服一切困难，努力为谱写美丽温州的精彩篇章而奋斗。

3、红船精神昭示我们，**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时值建党 100 周年之际，我们仍然要坚持温独支的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精神。共产党没有任何自身特殊的利益，唯有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姓公，那就是天下为公！共产党奋斗、追求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劳苦大众谋福利。忠诚为民，就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心全意，心行一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德，真正干出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政绩。事实胜过雄辩。2020 年，我们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是 6871 亿元、602 亿元，这两项指标分别进入全国所有城市 30 强和 20 强，城市品牌价值跻身全国 20 强，蝉联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位列地市级榜首^⑥。

4、红船精神昭示我们，**坚持统战，凝聚力量**。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温独支充分认识到，反帝反封建仅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尚不够，应当建立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温独支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发动学校教职员、学生、农民及社会各界人士起来革命，与他们打成一片，结成统一战线，在情感上和生活上与他们建立较密切的关系，挺身而出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所以赢得他们的同情、援助和合作。

温独支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开始时仅有十几个党员，一个支部，到 1927 年底，发展到 169 人，农会会员发展到十几万人。到 1949 年 5 月，党的组织已遍及城乡，深入工厂、农村、学校、部队各个方面。从温独支发展到中共浙南特委（地委），16 个县委、52 个区委，党员 41624 人。有了这样强大的党的队伍，才赢得了浙南地区 14 个县的广阔地域的和平解放^⑦。

今天，新时代建设，我们正需要弘扬温独支的红船精神，团结最广大

的人民群众，众志成城，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五城五高地”建设，全力做强全省第三极、建好长三角南大门，奋力续写好新时代温州创新史。

五、结语

温独支虽遭破坏停止活动，一批党员及其领导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献身，但凝聚了永垂不朽的温独支的红船精神。在近三年时间里，温独支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实现地方国共合作，广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在浙南大地播撒了革命种子，在温州各县建立了党组织(小组)、农会、社团，发展了近二百名中共党员和十几万农会会员，为日后中共党组织在浙南的重建、农民武装暴动和浙南革命烽火的燎原奠定了坚实基础。温独支的红船精神就是今天敢为人先、敢于拼搏的“温州精神”的写照。

幸福不忘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 100 周年之际，我们要深切怀念为国捐躯的温独支的先烈们，一定要将温独支的红船精神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团结一心，凝聚力量，努力工作，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加快打造美美与共的高品质幸福生活，努力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

参考文献：

-
- ① 李岳松《丰碑·温独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第 55 页。
 - ② 《中共温州党史·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第 27 页。
 - ③④ 刘金君《丰碑·试论“温独支”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第 66-69 页。
 - ⑤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温州中共党史学会《丰碑·综述》20-29 页。
 - ⑥ 瓯网《传承红色基因 坚守初心使命》。
 - ⑦ 吴祖熙《丰碑·永远的丰碑》第 38 页。

创业团队中“小知知识阶层”对“温独支”组织失败之影响研究

周生辉 叶未央

一、引言

百年党史学习活动作为 2021 年的重大部署，正由党委政府主导、民间鼎力支持的方式在全国全面开展。中共自百年前建党以来，从初始的 50 余位党员，成长为至今拥有 9000 多万党员的大党，并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其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更上一层楼，因此中共近年来被社会广泛地誉为“全球最牛创业团队”。其作为一个创业团队的成功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已极为丰富，但对中共基层组织的“创业经验”，海内外的相关研究至今仍很薄弱，对中共基层组织失败教训的总结成果自然就更为稀少。而中共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所以本文以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以下简称“温独支”）为案例，借鉴相关创业理论探讨创业团队中“小知知识阶层”对大革命时期中共基层组织成败之影响。

周生辉：温州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

叶未央：温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医学博士。

温独支成立于1924年12月，创始人是1922年入党的、肩负回浙南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任务的谢文锦，他很快发展郑恻尘、胡识因夫妇入党，并介绍戴宝椿、金贯真等8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了温独支这个中共新的基层组织。到1926年年底，温独支发展党团员50多人，并以温州地区为革命中心，开展了相应革命活动：如协助国民党成立永嘉县党部；组织三、四百位学生攻击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掌控的《温州大公报》；并在一定程度领导了温州地区的工会、农会、学联等群众活动，在长江三角洲的中共发展史册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是，与同时期两湖地区中共的狂飙突进相比，温独支则大为逊色。即使在北伐军过境前后，温独支也发展缓慢（而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大大促进了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发展）。在“四·一二”政变前后，温独支被强大的敌人打得猝不及防，组织失败因此不可避免。温州党史研究者对温独支在浙南推动革命活动的贡献，给以高度评价，但从创业团队角度论及温独支“组织失败”深层原因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本文借鉴相关创业理论，探讨创业团队中“小知识阶层”对大革命时期中共基层组织建设成败到底有怎样的影响？以加深我们对大革命时期中共组织的理解，并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温独支的发展史。

二、文献综述

团队成员的认知结构影响着创业的成败，这对核心主导型创业团队（张玉利，杨俊，2018）更是如此。中共温独支是大革命时期谢文锦一手创建的革命组织，是典型的核心主导型“创业”。我们通过探讨其成员的身份构成和认知结构，能加深我们对中共基层组织创业成败的认识。

中共需要在温州创业以解放民众，因此必须构建相应组织。Katz 和 Gartner（1988）指出新创组织具有目的、边界、交换和资源等特征。创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创建能完成战略目标的组织。而组织是构建在资源基

础上的一个生态系统，组织活动必须是遵守目标指向的行为逻辑。而在创业资源方面，人力资本的作用至关重要。Dobrev（2002）认为创业者的自我身份认知影响着组织的形成、发展和壮大。

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对创业者而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是其必须高度重视的。创业者应具备创业活动相应的认知结构和应变能力，能随时进行“创业即兴”（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从而能在瞬息万变的组织环境里生存和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叶竹馨，买忆媛，2018）。创业团队个体成员的知识结构和激情都是不同的，“想做”是一种认知，“能做”却是一种行为导向，两者未必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创业者应联合有创业激情和共同信念的人，相互激励以成功创业（Balacbandra，2018；熊立，杨勇，贾建锋，2019）。

面对强大的敌人，革命活动必须以团队的方式进行。Quick（1992）指出创业团队活动的成败，首先要考虑团队成员是否有共同的努力目标，他们能否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把此目标置为工作的首位，并为之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Kamm 和 Shuman 等人（1990）则认为在创业的初始阶段，组织的发展基本上取决于创业团队，创业团队的成败左右着组织最终的成败。

三、温独支创业团队中小知识阶层分析

加入革命党派，即意味着人力资源自身的角色转型。中共在温州创业团队成员的初始角色，大多是“教员”或“学生”。他们具有高于当时普通工农的外来知识储备，但对社会现实和斗争策略方面，则极为漠然。

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创业初期党员和团员身份构成

| | | | |
|----|-----|--|-------------------------------------|
| 党员 | 谢文锦 | 曾为小学教员和校长、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翻译、中共中央秘书、中共上海区委委员，30岁 | 思想激进，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有魄力，有能力，富有牺牲精神，斗争能力强 |
| | 胡识因 | 新民小学教员、校长，31岁 | 有组织能力，敢行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
| | 郑恻尘 | 经商、中一花席厂总技师，36岁 | 追求实业救国但知行不通，敢行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
| 团员 | 戴宝椿 | 温州女师及高小教务、永嘉县议员，24岁 | 有主义倾向，极诚恳，富活动性，颇能负责 |
| | 何志泽 | 温州《大公报》编辑，21岁 | 做事很负责，极诚实可靠，对主义相当了解 |
| | 金贯真 | 十师附小教员，23岁 | 极诚实可靠，颇了解社会，并知道病源所在和改革法 |
| | 陈济民 | 第五高小教务，24岁 | 性格率直，做事负责，对主义了解不深，但有十二分倾向 |
| | 金弘谛 | 浙江第十师肄业，24岁 | 很诚恳，对改革现社会热情，肯读我们的出版物 |
| | 李德昭 | 艺文中学任事，21岁 | 极诚恳可靠，很有觉悟 |
| | 金守中 | 浙江第十中学就读，23岁 | 颇诚实，改革社会意见激烈，肯负责 |
| | 谢雪轩 | 第八高小教务，24岁 | 极诚恳，很活动，做事负责，对我们主义有热烈倾向 |

注：表中对谢文锦、胡识因和郑恻尘的论述，来自《文心涅槃 谢文锦烈士传》《丰碑》等著作；其余来自《谢文锦介绍戴宝椿等8人加入S·Y》一文。本文对其表述略有改写。

1. 温独支初期“创业”成员的教员或学生身份构成

温独支初期的 11 个党团员，除了金弘谛职业不明之外，只有郑恻尘、何志泽是“社会人士”，其余全是教员或学生。按民国初年社会阶层划分标准，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底层知识分子，同样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因而有其相应的革命性。但同时也具有底层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斗争性总体不强，或不敢斗争，或不懂斗争策略。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一文中，将学生、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和小商人等，划入“小知识阶层”，与自耕农同属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时，其左派能加入斗争行列之中，中派也能加入革命，就是其右派分子，也能附和着革命。但在革命低潮时，容易被血腥镇压所吓到，悲观失望，甚至叛变投敌。小资产阶级的认知结构使他们往往缺乏工农群众斗争的坚韧性和勇敢。毛泽东精辟地指出，包括小知识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胆子小”“怕官”“也有点怕革命”，一方面他们有革命的需求，另一方面对革命又有怀疑，不敢大胆行动。

温独支组织初始的创业成员，几乎全属于“小知识阶层”，因此他们正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论述的那样：胆小，怯懦，不敢行动（当然谢文锦、郑恻尘和金贯真等革命烈士除外）。吕人望在 1928 年 3 月《关于温州情况给中共浙江省委的报告》中，愤怒指出大革命失败后，温独支部分成员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温州能够工作的同志纷纷离去，而留在本地的温独支成员，大半是投机的机会主义者，不但不敢参与战斗，还幻想借助国民党的反动力量，来应对温州农村的矛盾冲突；而部分温独支成员，甚至完全失去了革命的勇气，只敢窝在家里。

必须肯定的是，“小知识阶层”中的谢文锦、郑恻尘和胡识因等革命者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但随着他们的离去或牺牲，小知识阶层中的其他“动摇分子”缺乏革命的勇气，无法承担“中共温州创业”的重任。而创业者必须具有冒险精神，从事的是“英雄型事业”（hero enterprises），能

为社会创造价值 (Davidsson, Wiklund, 2001)。而小知 识阶层中的怯懦者，其行为选择不可能是“英雄导向”，在“知”的方面，他们似乎和金贯真等烈士一般有共同的信仰 (Balacandra, 2018)，但“行”的方面，让他们暴露了利己的机会主义者真实面目。温独支的难以迅猛壮大，就理所当然。

2. 创业团队中“小知 识阶层”的认知结构使温独支难以深入群众

马克思主义是为劳苦大众争取利益的，这决定了中共的人民性价值取向。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诉求，要求中共的基层组织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并形成相应的“路径依赖”。群众路线必须是党团员自然的或嵌入式的认知内容和行为选择，需要通过党团员的行为导向体现出来。但小知 识阶层的利己偏好 (亚当·斯密, 1776) 往往削弱他们的战斗力。1926 年 1 月戴国鹏在寄送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的信中，则直白地道出温州团委“实际”并未开展什么活动；“团温州支部”几乎同时也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信中，提及温州偏僻，同志稀少，工作极难开展，即使开展了相应的活动也无成效，宣传工作相对容易一些，但温州党团员也非常缺乏这方面努力；信中坦诚作为“教员”的温独支成员，因为忙于教学等自身工作，几乎无法接近工农群众。

但客观条件其实允许温独支成员进行群众宣传。温独支在 1926 年 6 月的《工作计划》中指出，温州是宗法社会，温州人的同乡、同宗和同行等观念强烈；此地民风豪爽彪悍，人民容易被组织，所以这里是做群众运动的好地方。1926 年 1 月《团温州支部给团中央的信》也坦承温州群众喜听“讲书”，温独支也曾参与其中，听讲者“皆为工农”，听后“拍掌称是”。但温独支“教员”“碍于学校功课”，更怕引起外界的“注视”，所以他们的革命宣传也仅是偶或为之的活动。1926 年 2 月《团温州支部给团中央的信》中，则进一步指出团温州支部因为成员回家过年，“多没有开会”，尽管他们本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深入工人队伍中进行革命活动，因为“附近工人很有觉悟，很可以做一番扩大组织”，但温州支部成员缺乏革命积极性，

回家过年了。

1926年10月，陈綱垒致信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等领导，惭愧地言及工作不但毫无进展，事实上已经形同于无，因为在温州的党团员太少了；即使温独支开展农民运动，因为警察前来监视，本来能从容开会，也因为“同学”没有经验，也缺乏勇气，导致会议草草结束。所以温独支的群众宣传工作，也开展得很不如人意。《温州独支关于永嘉社会调查及农民协会组织情形的报告》（1926年11月）一文更犀利地指出，温州地主对佃农拼命压榨，永嘉县租率表面是四六分，但因为地主等以大斗、大秤称谷等原因，租率甚至不止“三七分”，所以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报告指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的剥削“达于极点”，所以温州农运本来发展前景极好，但温州相关农会领导者仅仅进行半天“讲演”后即宣布散会，导致大量前来参会的群众听说会议已经草草结束，只能怏怏而归。

小知识阶层认知方面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倾向，导致温独支在客观条件较好的社会环境中，仍然不能深入群众，最多做“零星”的社会宣传。他们难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冲锋陷阵。



信河街侯衙巷新民小学（温独支旧址）

3. 小知识阶层主导的温独支组织管理问题

团温州支部在1926年3月下旬寄信团中央，汇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的情况，信中提及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温州学界反帝浪潮高涨的情况下，因主持活动的人“不行”，接任者也懦弱无能，导致温州爱国学生会事务难以开展。

同年4月，中共上海区委论及温州等地党的组织工作情况时，在历数中共浙江组织之领导不负责而且主观独断、宁波党组织发展党团员到120人业绩可观后，直陈温州负责人是女性，“同学才7人”，语气颇为轻蔑（尽管也有相应的对温独支工作的肯定）。温独支在1926年6月的《工作计划》中，概括地反省了过去工作中“同志太少”，且流动性很大的缺点：如谢文锦在温独支成立后不久即前往外地工作，工作能力较强的郑恻尘和胡识因夫妇也因事离开温州。所以温独支颇感扩大组织的必要性，以使每一个小的群众组织中，都有党团员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但他们依然不肯亲力亲为，而是过多地强调让“学生”到群众中去参与地方的政治活动。

1926年9月的《温州独支工作报告》进一步反省了自身组织方面的问题，一是无形中的关门主义思想：他们认为“温州同志”人数少，但“质量好”，可惜胆子太小，生怕叛徒告密——这正是温独支成员认知误区导致的结果：胆小的人如何能勇于参加高风险的革命活动？二是反省了自身工作的不足：只能在形式上号召群众，却因为党团员太少，工作无法合理分配，导致温独支不能真正地深入群众。

温独支自1924年年底成立，但因为在创业初期，创业团队成员大多是“教员”或“学生”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认知等方面的局限性导致组织无法及时扩大，工作难以深入群众，因而在国民党右派地攻击下，组织失败就成为了必然。

四、研究结论、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小知识阶层属于小资产阶级，因为怯懦，所以不敢斗争，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加入中共党团组织后，无法胜任高风险“组织创业”工作。

温独支初期“创业”成员大部分是教员或学生身份，属于小知识阶层。尽管温独支中的谢文锦、郑恻尘和金贯真等革命者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但随着他们的离去或牺牲，温独支中部分怯懦的小知识阶层分子，其行为选择不可能是“英雄导向”，所以无法承担“中共温州创业”的重任。小知识阶层认知方面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倾向以及他们脱离社会实践的缺点，也导致温独支在客观条件较好的革命环境中，仍然不能深入群众。所以，内心怯懦和认知脱离革命实践的问题，使温独支在组织管理方面形成了关门主义思想倾向，因而只能在形式上号召群众，而不能真正地深入群众。其组织失败也就理所当然。

大革命失败后，温独支留下的文献资料不多，本研究因此难以深入探究温独支成员的身份构成和认知误区，这影响了本文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搜索更多的资料，加深对温独支组织的理解。

主要参考文献：

-
- 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14.
 - ②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1-122.
 - ③ 阮元. 十三经注疏. 论语注疏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453-2536.

- ④ 亚当·斯密·国富论 [M], 唐日松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1-726.
- ⑤ 周祯祥. 道义逻辑、行动逻辑和规范逻辑 [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1 (9):61-64.
-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第一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1-648.
- ⑦ 熊立, 杨勇, 贾建锋. “能做”和“想做”: 基于内驱力的二元创业即兴对双创绩效影响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9, (12): 137-151.
- ⑧ Kamm J. B., Shuman J. C., Seeger J. A., and Nurick A. J. Entrepreneurial teams in new venture creation: a research agenda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0, 14 (4): 7-17.
- ⑨ Katz J., Gartner W. B. Properties of emerging organiz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8, 13 (3): 429-441.
- ⑩ Davidsson p., Wiklund J. Levels of analysi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urrent research practi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1, (Summer): 81-99.
- ⑪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中共党史学会. 丰碑——纪念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 90 周年 [M]. 温州: 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2014:1-305.
- ⑫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浙南革命历史文献汇编 (一、二战时期) [M]. 北京: 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6:1-528.

浅析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鹿城经济的影响

——以1992年至1997年为例

朱景绣

一、引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挖掘红船精神与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创建的时代价值，深入研究、挖掘浙南革命精神和城区红色历史文化，守好红色根脉，推动红动浙南，在续写创新史中奋勇争先、担当作为、走在前列。在这样红色百年的大时代背景下，笔者撷取1992年至1997年这个历史时期，来回顾和浅析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鹿城经济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世界的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精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次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通常人们把这些讲话称作“南

方谈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正式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南方谈话精神的热潮。各行各业都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加快了改革和建设的步伐。“温州模式”获得认可，结束了对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

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鹿城经济的影响

1、对公有制经济的影响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物质基础，能否搞好公有制经济，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1990年后，国有企业效益开始滑坡，部分企业亏损严重。国营企业面临着许多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企业内部存有許多弊端，但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几年来，各类国营企业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经济成分发展的冲击；外部条件不佳，缺乏公开竞争的环境。

中央提出要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温州市委提出集中力量搞活国营、集体骨干企业。鹿城区委认为，不但要搞活全区7家国营企业，还要加上规范化的股份合作企业。1992年4月16日，中共鹿城区委工作会议指出，“在所有制问题上，要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实行国营、集体、个体（私营）三者一起上，放手发展多种经济。我们要在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份中，不断壮大公有制经济的实力^①。”

1992年7月，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1993年3月，省政府根据国务院《条例》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浙江实际，制定颁布《浙江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同时，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浙江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在此基础上，省政府确定萧山、瑞安、兰溪、桐乡、德清、新昌、玉环等7个县（市）作为省级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配套改革的试点县，确定30家国有企业作为转换经营体制试点，温州东方工业集团

公司为试点企业之一。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着力于制度创新，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省政府将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企业产权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来。

此外，鹿城区集体企业在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比较灵活的经营机制，但其固有的企业产权不明、投资体制不顺、凝聚力不强以及企业管理政企不分等因素，使其逐步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集体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区街企业属于自筹资金、自我产品、自我市场、自我管理的“四自”集体企业。为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区街、乡镇集体企业的经营机制，以便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区委、区政府于1993年8月颁发《鹿城区集体企业股份制改造实施办法（试行）》，1994年4月颁发《关于挂名集体企业产权界定工作的试行意见》等政策，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基础上，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大胆探索，积极试点，对集体企业实行了股份制改造。改制后的区集体企业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发生了变化，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2、对个体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影响

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它的形成是较大的生存压力、较少的计划经济的束缚和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台州等地的人民群众走上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民营经济真正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重申了私营经济的补充地位，明确指出不同所有制企业可以联合经营。这为民营企业进入下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巨大鼓舞下，鹿城区人民精神振奋，改革开放步

伐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区委、区政府认真传达、贯彻中央2号文件，围绕加快鹿城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这个主题，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统一思想认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增强改革开放意识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党的十四大以后，全区进一步掀起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潮，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经济建设的工作重点和主攻方向进一步明确。适当调整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确立“依法治国”“科技兴区”战略，先后出台了有关扶持重点企业、工商税务、工业区开发、发展外向型经济和第三产业、简化企业审批手续、下放公司审批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1993年3月26日，中共鹿城区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大力推进企业股份化、股份集团化、集团混合化的进程，引导集体企业、股合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通过互相参股走向联合，增强经济、技术实力，增强市场竞争能力。”^②

1993年4月6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规定除国家法律、法规明文禁止个体、私营企业经营的行业和商品外，均允许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依法开业和经营；指出凡是适应个体、私营经营的行业，都应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要求各地落实政策、实行分类指导，逐步形成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同年12月23日，鹿城区私营企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区私营企业协会。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位，消除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温州进入以“块状经济”“产业集群”“虚拟经营”和“走出去”为主要特征的“二次创业阶段”。1994年1月7日，中共鹿城区委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我区经济质的提高，必须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发展战

略上^③。”

为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企业之间优势互补，优化组织结构，发挥企业群体优势和结合功能，增强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本着企业自愿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1994年区委、区政府制定了《关于组建企业集团的若干规定》等政策，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积极鼓励、引导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或私营企业，组成集团企业形式的法人联合体，以更好地实现跨地区发展。并积极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使新组建的集团企业享受我区“重中之重”企业等优惠政策。1994年9月21日，鹿城区首家区街集团企业——温州精工集团组建，标志着区街企业向上规模、上档次迈出了新的步伐。11月7日，温州市首家村级集团——温州华昌集团有限公司获准成立，这是由城郊乡巽山村经济合作社整体改组而成的，标志着农村集体所有制向股份制转化，为全市农村向城市化体制转轨走出了新路。1995年4月1日，鹿城区首家三产企业集团——温州家具集团成立，这是鹿城区促进三产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的新举措。

1995年7月20日，区委四届九次全会扩大会议提出，“必须在全市率先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转移和增长方式转变。鹿城中心城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综合实力，而提高综合实力，就要率先把经济发展战略从注重发展二产转移到发展二产、三产并举上来，把经济增长方式从注重量的扩展转到质与量并举上来^④。”

1996年，鹿城区积极实施“三个一批”工业经济发展战略，即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形成一批支柱优势产业、发展一批骨干企业 and 企业集团，树立一批名牌产品，以“小、低、散”为主要特征的区街工业正逐步开始由粗放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1996年10月8日，九山集团由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这是继巽山华昌集团、黎一南亚集团之后出现的集团公司。1997年1月，鹿城区被列入省“五个一批”的企业有金泰集团、神力集团、长城鞋业公司，被列入市“五个一批”的有10家企业。

此外，温州人精神是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温州人精神还体现在特别能“走出去”。到1996年，有超过100万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30多万温州人奔向海外市场。全国各地形成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和温州村。出现“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有温州人去开拓市场”的局面。同时，为在外温州人服务的各地温州商会纷纷建立。

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民营经济进行重新定位，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民营企业从此进入发展的高峰时期。同时，把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全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

3、对外向型经济的影响

浙江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1991年浙江实现全境开放。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浙江的对外开放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设立外贸出口发展基金、赋予有条件的大中型生产企业（集团）进出口经营权、对出口企业实行信贷倾斜等一系列鼓励扩大外贸出口的政策。

1992年，鹿城区对外开放更加活跃。当年出现了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组织形式，并逐渐成为全区商贸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同年，全区共有三资企业47家，其中投产22家，出口额0.17亿元。

1993年，区委、区政府制定《关于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奖励规定》和《关于简化鹿城区利用外资项目审批手续的规定》，为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和优惠条件。1994年，制定颁发《关于鼓励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本意见》。1997年3月，面对外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区政府提出“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开拓多元市场”“多渠道吸引外资”和“扩大自营出口面”等四大经贸战略。4月，区委发出《关于加快引进外资促进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1）进一步统一思想；（2）

切实加强对开放型经济工作的领导；（3）全面实行开放型经济岗位责任制；（4）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要把引资重点放在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嫁接“两类企业”及第三产业上；（5）努力改善投资环境；（6）制订总体规划，加快基础建设。

1993年，是鹿城区外资发展最快、势头最猛的年份，共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7家，合同利用外资3066.72万美元。1996年以来，受国家利用外资政策及其他外经贸政策调整的影响，鹿城区利用外资步伐放慢，至1997年落入低谷，外资数量显著减少。1996年~1997年，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共18家，合同利用外资388.02万美元。1998年以后，利用外资呈现恢复性增长，并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鹿城区利用外资的范围集中于传统的服装、鞋业、烟具、眼镜以及电子仪表、房地产等行业。到了90年代后期，利用外资逐渐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特点，已拓展到三大产业30余个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呈较快增长之势，而农业利用外资方面亦有所突破。

此外，鹿城区企业走出国门到境外创办企业、设立窗口谋求发展由来已久，但真正以企业名义赴境外投资并经过政府规范审批的，始于1996年。1996年7月，经国家经贸委与西班牙政府批准，大批量生产“华威”系列空调产品，以供应西班牙为主的西欧、北非市场，华威公司这一大胆尝试首开鹿城区境外投资先河。

三、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鹿城人带着“敢为天下先”的温州模式的首创精神，积极开拓进取，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下，更是活力迸发，热情高涨。1993年，温州市提出了“二次创业”发展战略，在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下，鹿城区于1994年开始第二次创业，尽管在改革和创业过程中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时期鹿城的经济是跳跃式的发展，对当时鹿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此后鹿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李岳松 褚宏健

注 释：

① 王思爱：《解放思想 大胆探索 抓住时机 真抓实干 加快我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伐——在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文件选编》（第三辑）1990年1月—1992年12月，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12月编印，第183页。

② 金邦清：《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为把鹿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区而奋斗——在中共温州市鹿城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文件选编》（第四辑）1993年1月—1997年12月，2015年11月编印，第21页。

③ 金邦清：《在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九四年一月七日），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文件选编》（第四辑）1993年1月—1997年12月，2015年11月编印，第85页。

④ 金邦清：《坚定信心 增创优势 努力开创鹿城第二次创业的新局面——在区委四届九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文件选编》（第四辑）1993年1月—1997年12月，2015年11月编印，第241页。

革命夫妻胡识因与郑恻尘

刘定卿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夫妻志同道合一起参加革命的并不多见。但在温州就有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她们在谢文锦的领导下，创建我党在温州最早的党组织——温州独立支部，这就是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第一任书记胡识因和她的丈夫郑恻尘。

一、夫妻双双同时参加革命

胡识因，女，永嘉人，1893年出生，家境比较富裕。7岁时，随家迁至温州。16岁时，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年转入上海女子体操学校，毕业后在杭州等地任教。1920年回到温州市区，创办私立新民小学，自任校长。

郑恻尘，1888年3月26日出生在永嘉表山乡，原名郑采臣，出身小康之家，自幼聪颖，心灵手巧。16岁考入温州第十中学，毕业后到北京浙江学堂和杭州王氏工艺讲习所学习。1910年回到温州，因反对母亲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与胡识因认识结婚。创办“振亚肥皂公司”，虽然失败，但这是他创办工厂的尝试。

1911年，武昌起义那一年，他前往湖北投考革命军，并参加了前线作

战。1912年转入湖北第二军官学校学习，即将毕业时，感到所谓的“国民革命”与自己救国志愿不符，毅然离开军校返回温州。

五四运动时，日本有大量的花席进到温州市场，学生开始抵制日货。郑恻尘认为日本能制造花席，中国人也可以，于是他研究花席生产的工艺和机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的研制和努力，郑恻尘生产出半机械化的打席机，接着又试制成功印花机，可以在席上印刷花卉、人物、风景、鸟兽等。

郑恻尘聪明好学，擅长书法和图画，能写一手好字。他书写的“中一花席公司墙界”仍保留至今。该厂出产的花席图案，大部分是郑恻尘自己画的。1919年，他卖掉家中的20亩地和3间半房子，筹措资金与人合股，在温州九圣殿巷办起“中一花席公司”。他自任总技师。

后来，中一花席公司不断扩大，又在西溪司巷、三官殿巷设立分厂，最盛时有1500余人，是当时温州最大的工厂。温州生产的花席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国外新加坡、南洋等地，把日本的花席挤出了温州和浙江的市场。

温州产有一种咸草，也叫三角草，生长在沿海江边，秆体成三角形，草秆长，压扁后可以编织草席。在温州用这种草编席是郑恻尘发明的。他对三角草用化学办法漂去碱性，使咸草质地更软，印上花色图案后显得更鲜艳。这种席可以折叠，携带方便，很受群众欢迎。

1924年秋，谢文锦来到温州开展革命工作。由于都是永嘉老乡，胡识因和郑恻尘在他的影响和引导下，于1924年冬天由谢文锦介绍一起入党，并筹建



郑恻尘

温州独立支部，开展党的工作。从此，夫妻一起参加革命，开始走上了为中国革命奋斗的征途。

二、胡识因和郑恻尘为革命竭尽全力

当时，胡公冕来永嘉为北伐军招募青年，郑恻尘积极协助胡公冕，在温州组织了二批数百名青年到广东支援北伐。因为消息走漏，胡公冕遭到军阀搜捕。郑恻尘亲自护送胡公冕搭船去上海，并担负起送革命青年去广州的重任。他买通“海晏”号轮船上的账房，将他们分批运往广州。当运送第三批青年时，郑恻尘被敌人发现并被捕，关押在瓯海道司令部。经多方营救，郑恻尘才被释放。

独立支部成立后，党支部在思想进步的学生、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先后介绍了金贯真、林去病、林平海、王国桢、王金姆、蔡雄、李德姑、叶廷鹏等入党。后来，这些人都在土地革命时期成为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的骨干，其中金贯真还是红十三军的政委，王国桢成为中共浙南特委的第一任书记。在红十三军失败后，叶廷鹏仍然在平阳坚持斗争，最后与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会合。“温独支”成员后来大部分壮烈牺牲，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国共合作期间，郑恻尘是温州独立支部协助国民党组建永嘉党部的总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成功地筹建了国民党永嘉党部，并在国民党党部中，安排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



胡识因

当时，上海、北平等大城市都纷纷成立“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推动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问题。温州独立支部也接到上级指示，要发动妇女，在温州成立“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并寄来了上海等地的妇女书和大批宣传品。胡识因立即发动教育界、妇女界筹备成立“温州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要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相呼应。

1925年元旦，温州独立党支部书记胡识因组建“温州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在七星殿巷女子师范讲习所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男女平等、同工同酬”，还提出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胡识因在工作中注意培养和发展党员，将“温州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中的女师学生邵锦云、林锦心等吸收为党员。后来，“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全国会议”在北平召开，温州也派代表戴宾参加。

胡识因在担任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书记期间，帮助国民党组建永嘉党部和乐清党部，组织温州学生进行学生运动等。特别是她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期间，创办了《浙江妇女》半月刊，为妇女解放和维护妇女权利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温独支”除重视学生、妇女运动外，还十分重视工人和农民运动，在温州成立了总工会，由雷高升任总工会主席；在永嘉成立农民协会，由王国桢任永嘉县农会会长；在平阳成立农民协会，由叶廷鹏担任平阳农会会长。

郑恻尘是中一席厂的工程师，又是该厂的股东，他首先在自己的工厂里“造反”，开展工人运动。他关心工人疾苦，举办工人夜校，为工人谋利益，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草席厂工会，维护工人自己的利益。他既是实业家，又是革命者，但是他把革命放在首位，这在当时革命者中是很少见的。

1926年，中共瑞安特别支部在瑞安城关话桑楼成立，温州独立支部成员林去病为书记。林去病是瑞安人，后调至宁波任市委书记，1929年5月在宁波被捕，1932年5月12日在浙江陆军监狱被害。

1927年春，北伐东路军第17军军长曹万顺（共产党员）率部抵温，

沿途受到浙南人民的热烈欢迎。途经瑞安境内时，中共瑞安县委发动 1000 多农民欢迎北伐军，并为 17 军运送军粮和弹药。

北伐军进入浙江后，盘踞在浙江的军阀孙传芳被打倒，浙江被国民党光复。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些机关相继迁回杭州，全省各地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纷纷成立。这段时间是温州国共和作最好的时期。

三、“温独支”帮助国民党建立永嘉县党部

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影响下，国共开始合作。1923 年 11 月，中共三届一次全会在上海召开，党中央曾作出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国民党，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鼓励共产党员加入，允许共产党员有两重身份，在国民党内建立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由共产党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

在国共合作时期，尽管当时温州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组织，两党关系正在蜜月期，两党的党员合作共同革命推翻反动军阀。1925 年春，“温独支”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后，立即指派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在温州筹建国民党党部。

“温独支”派郑恻尘与当时温州的国民党党员王超凡联系，王超凡当时是国民党永嘉党部筹备委员。在郑恻尘和胡识因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在温州发展国民党组织。

国民党永嘉党部筹建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存在两派斗争，一派是右派势力，以王超凡为首；一派是左派势力，以“温独支”的共产党员郑恻尘为首。由于当时温州国民党正处在筹建时期，力量还不是很强大，因此，国民党党部的执委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

1926 年 3 月，国民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温州代表有郑恻尘、胡识因、陈仲雷、管绍源出席大会。在会上，郑恻尘、胡识因当

选为执委。当时全省一共有9名执委，温州就占了2席，可见当时温州国民党在浙江的实力。6月，在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中，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书记胡识因被选为省党部妇工部部长，郑恻尘为省党部商民部部长。到国民党二大前，全省已有23个县市成立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党员达2000余人，在各地国民党党部中绝大部分为共产党员。

1926年4月，永嘉县国民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国民党永嘉县临时党部成员。8月，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正式成立。当时，担任执委的有胡识因、郑恻尘、陈仲雷、戴树棠、王超凡、魏介夫、苏中常等。由郑恻尘分管工商，陈仲雷分管农青，妇女由胡识因负责，秘书由戴树棠负责，可以说温州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位置，几乎都由共产党员占据了。

1927年2月，浙江光复，主持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中华电邀郑恻尘和胡识因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工作，郑恻尘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和商民部部长，胡识因任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胡识因和郑恻尘调离温州后，温州独立支部的书记先由唐公宪担任。11月，唐公宪因病离开温州，书记一职就由陈仲雷担任。

四、温独支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西山会议派是指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右派，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谢持、邹鲁、居正和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主席的林森等13人为首，发起清党活动。他们不充许在国民党内有共产党的存在，也不充许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指手划脚。

1925年11月23日，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解决国民党内共产党的问题，要求清党。他们甚至断言：“如果不在国民党内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在会上，他们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并要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职务。还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

合作等议案。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北平西山开的，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就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这就是“西山会议派”的来历。

“西山会议派”的主张是明显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就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这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国民党有识之士左派的反对。

1926年1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在大会上大声谴责“西山会议派”，她说：“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国共合作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一贯提倡的。谁反对，谁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

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刚刚去世，宋庆龄的话还是非常有力量的。会议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谢持、邹鲁等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取得了胜利。但是，“西山会议派”的影响在国民党顽固派中开始扎根，此后，蒋介石也参加进来。国民党为了不被共产党赤化，开始清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共产党彻底分道扬镳。

在“西山会议派”的鼓动下，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掀起清党活动。在温州，以王超凡、魏介夫、吴江冷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分子，在浙江“西山会议派”的头子沈定一的鼓动下，在永嘉国民党党部内也掀起清党活动，遭到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内占多数的共产党员反对。胡识因和郑恻尘号召大家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广大国民党员，温州也改组了永嘉县党部，取消了王超凡等西山派人物执行委员的资格。当时这样的处置，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会议的决议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西山会议派的清党活动暂时被打压下去。

从此，“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王超凡等人与温州共产党员结下了心结。他们开始在温州与当时中共温州独立支部负责人郑恻尘闹分裂，并处处陷共产党员于不义。

1926年，温州独立支部召开“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大会，借此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王超凡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密谋破坏国耻

纪念活动。他们用诡计窃得大会告人民书等宣传资料，将其资料向当时驻温军阀、瓯海道司令彭德铨报告，诬告郑恻尘领导共产党人于“五卅”密谋暴动。彭德铨以谈话为名，将郑恻尘骗到司令部拘留起来。后经革命群众据理力争，才将郑恻尘释放。

五、郑恻尘在杭州被捕牺牲

1927年4月11日晚，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清党的名义在杭州逮捕共产党人。他们包围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抓捕在国民党党部里的共产党员。当时，郑恻尘不在国民党党部，军警扑空后又包围了郑恻尘的家。

郑恻尘夫妇住在杭州忠孝巷12号。这里本来比较秘密，平时很少有闲人出入，党的左派和中共浙江省委的会议也经常在这里开会。后来，因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人员也来来往往，秘密地点就公开了。那时候国共合作，我党一些同志以为天下太平，没有防范意识。因此，郑恻尘的住处发生问题也再所难免。

4月11日中午，浙江省国民党一位经济部主任带着军队来搜捕郑恻尘。当时，郑恻尘正与杭州地委书记庄文恭、宣传部长华林、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长潘枫涂（共产党员）等三人在开会。听到外面有人叫喊，郑恻尘知道不好，急忙带庄文恭等人躲进房后暗弄里，将门掩上，自己躺在床帐里装睡。军警进来后，郑恻尘为了掩护战友，主动掀开帐子坐起来说：“我就是郑恻尘。”郑恻尘被敌人逮捕直接带走，庄文恭等三人得以侥幸脱险。胡识因因外出躲过一劫。

郑恻尘被捕后，胡识因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并要求组织营救。由于胡识因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对象，她带着孩子到处躲藏，处境十分危险。

7月29日凌晨，郑恻尘和宣中禅、王宇椿3人在杭州陆军监狱被秘密杀害。郑恻尘的遗体初由其亲戚和友人埋葬于清泰门外荒野，在墓志上写

有“日起”作为标识。郑恻尘牺牲后，党组织和同志们都一直瞒着胡识因。10月，党中央将她和2个孩子送往苏联，让胡识因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不久，15岁的女儿病逝。此时，她已经知道丈夫已经牺牲，给她打击很大。

1929年秋，胡识因从苏联回国后，在杭州清泰门外找到树有“日起”墓志的坟，另立了一块“郑恻尘府君之墓”的石碑，以纪念夫君。1936年5月，胡识因将丈夫的墓迁葬于龙驹坞，并为其做坟。后因该地修路，由救济院拾取骨骸，暂厝松木场的山上。直到解放后，于1955年5月报请中共浙江省民政厅同意，于次年迁葬于杭州南山天龙寺公墓内，并重修了烈士墓。

六、胡识因后来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

1929年秋，胡识因从苏联回来后，在上海举办工人夜校。红十三军成立后，她在上海担任红十三军与党中央的联络员。1932年9月，胡公冕在上海被捕，后关押在南京，重病在狱。胡识因赶到南京，胡公冕将他5岁的病儿托付给她抚养。她在南京住了3年。1936年2月，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保胡出狱治病。出狱后，胡公冕随邵力子到西安疗养。1936年8月，她离开南京，到上海肇和中学担任教师。

胡公冕出狱后即脱党，对胡识因的影响很大。胡识因也失去了党组织的联系，从此她再也没有参加党的活动。1938年8月，在地方人士的劝请下，胡识因回乡担任岩头小学校长。抗战胜利后，一度到上海，先后担任肇和、崇农两所小学校长。她一直在教育战线上默默地工作，直到1948才回到温州。在这段时间里，她再也没有回到党的身边。我们不清楚她脱党的原因，也许是她丈夫牺牲的原因，也许是胡公冕对她的影响，也许是她生活上的原因，其中肯定有一段难以启齿的伤心事。胡识因为什么脱党？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全国解放后，党组织考虑到她曾是浙南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为革命作过贡献。政府安排胡识因到第八小学任校长。她于1954年9月退休，

1956年2月被提名为温州首届政协委员。

但是，胡识因的命运依然坎坷。由于她性格直爽，对当时党内的不正之风和政府部门的弊政有不同的看法，被认为是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在这段时间里，她最痛苦的是精神压抑，十分忧郁，生活也异常艰难，甚至还靠摆摊渡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以至于后来生活不能自理，于1974年3月病逝。在她去世后的第5年，终于在1979年被评为。

胡识因是我党早期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浙南妇女运动的领导者。我党在浙南的革命斗争史中，有她不可磨灭的功绩。她的一生曲折而坎坷，由于种种原因，她脱离了党的关系，但她一直关心中国的革命，关心浙南的革命斗争，在教育战线上默默无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直到生命终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回顾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人经过百年的奋斗，终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无数革命先烈的前仆后继为革命牺牲，就没有我们伟大的事业。让我们不忘初心，缅怀烈士遗志，牢记党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由老干部的子女看其父辈的高风亮节

——浅议学党史中的一点体会

周坚建

党的百年辉煌，与党的老干部的高风亮节是密不可分的。学党史的实践中，我深切地体会到老一代党的老干部的襟怀无比宽阔，是永远值得世人，尤其是新时代的从政者高山仰止和仿效的。笔者年逾七十，中青年时代曾在温州印刷机械厂当过工人、科长与厂级领导；由于该厂干部子女多，我常常通过他们，领略到老干部的开明、正直与严以律己的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以致临老不忘颂扬他们，逢人就宣传他们的往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温州市委书记刘朝中（1915—2007）的大女儿刘某，六十年代中期毕业于中医校，进厂后是个中医师。难能可贵是她丝毫没有什么优越感，工作勤勉，生活朴素，为人谦恭，评工资分房子从不与人相争，深受工人师傅的称道。我想不到她干了几十年退休时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厂医外，连一个中共党员也不是。是她不够党员条件吗？否！她踊跃而热情地参加听党课，也不隐讳自己的见解。我作为厂党委副书记，曾找她谈过话，并问她为什么迟迟不打入党申请报告。她只认为自己离党员的标准尚有差距，应当继续努力。如果在当下，或换作另外一个人，就

算她的父母不干预，相关部门或老下属，说怎么也会来问责。届时，基层党组织除了“检讨”或“突击发展”还能怎么样？现在想起来，厂党委在这件事上是有失误的，因为即使是平民子女，也应从政治上关心每一位政治进步者，但我们有所疏忽。这是题外之义。我只推崇刘书记及其家人的崇高襟怀，党性高于一切，从不为女儿的事，掺乎个人的东西来干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

建国之后温州市第一任市长胡景城（1917—1987）的小爱子胡某，也曾在我那个厂当工人，一直是个机械维修工。工人们看在眼里：他像个“奶油小生”，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见人显得腼腆，但上班干活从来一丝不苟、忙这忙那……有一年春节，老厂长老书记“于心不忍”去他家看望老市长，顺便听取对胡某的使用意见。胡老夫妇又让座，又泡茶，只希望厂方严格要求其子，好好学技术，多给他事干。其后，厂领导遵嘱不误，胡公子沉在车间没半句怨言，并成了一名技术骨干。他业余很注意学习，关心时事，最后通过自身努力，通过考试成了《温州日报》记者，被千把人的大厂传为佳话。工人们称赞胡氏父子都“硬核”，不走“后门”。

整整四十年了，那时我在一个车间任党支部书记。一天午后，长期主管全市工业的副市长张学义（1927—2016）突然来到车间，我以为有什么重要事，赶紧迎了上去。原来他是来向我了解其子小张的近期生产表现。因小张平日有点调皮，我稍作迟疑了一下，老市长心领神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直截了当对我说：“书记哟，我知道这儿子散慢，你们不要顾虑，他偷懒捣蛋就不客气。必要时打电话给我……”顿时，说得我们几个头儿闷气全消，深感老市长“神头灵清”，可亲可敬。其实，我早知他家教甚严，从不迁就子女：四个女儿中有三个下乡支边；所有子女中，无一从政。

一代党的老干部，无论是战争时代出生入死，还是和平建设年代处于执政地位，除了兢兢业业，立党为公，还严格限制自己的亲属不占便宜，不为他们的升迁动脑筋、打算盘，从而使党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威望。正是他们的“硬核”，才铸成了铁骨铮铮的党魂。以史为鉴，对照今天，

现状令人匪夷所思。“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习惯上被说成是封建社会的潜规则。想不到都什么时候了，有些当官的总想封妻荫子，为自己子女或老婆、亲属弄个官儿当当；有的刚刚挤进科级，就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塞进副县或更高的位子。如此种种，举不胜举。如都能像鄙人所举，像上述三位革命老前辈一样，岂非党之幸，民之福？“老人亭”里还有什么不中听的闲言碎语？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当年，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杨建新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来临之际，不妨回忆一下自己三十多年前那一次“带伤擒凶”的经历吧。

那是在1980年的初冬，本人由北京军区特种兵部队退役若干年后考入温州市公安局交通队，在队部担任文书。

这一天是本人的调休日，本人与同事金警官一起骑车上街办事。到了市中心人民路原新中国电影院（大约是现在的人民东路移动公司附近）附近时，我俩突然看见马路中间有三名人高马大的家伙围着一名挑着菜筐的农民拳打脚踢实施抢劫，而那名被打的农民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边呼喊着“抢劫啦……打人啦……”一边痛苦地蜷曲着身子，双手紧紧地捂着腰间的袋子。

“抢劫！”笔者和同为退伍军人的金警官几乎是同时喊出声来，然后就像士兵遇见敌情似的，立即加快速度，开弓利箭一般向着那几个犯罪分子冲了过去，一边大声喝道：“警察！不许动！”

当时的社会，大多数违法犯罪分子对警察还是有着很强的恐惧感的。所以，那几个犯罪嫌疑人听见了我俩的喝令，又看见两名身穿“海军蓝”警便服的年轻人骑车冲将过来，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分作几路四散逃命。见此情况，我俩兵分两路。金警官向南追逐，我则向北拐入现在移动公司

大楼西侧的小弄堂追拿另一名嫌犯。

因为当时的人民路尚未开发扩建，这条小巷子宽度也就两米多。我的“坐骑”是一辆老旧破损的28吋自行车，启动慢，刹车制动又不灵，还要避开身边三三两两的路人，故而不敢骑的太快。而那个嫌犯明显对这一带路线比较熟悉，逃窜的飞快，所以双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于是我只能一边追，一边大声喝令他立即停止逃跑，跟随我投案自首！

正在这时，我看见小巷另一头拐进来一辆“板车”，也就是当年温州大街小巷常见的那种人力货车，车上装满了砖块，而板车四周围着大约四五十名熊腰虎背的壮汉，正推着车对着我们相向而来。

我见了此景真是喜从心来：此时只要板车稍稍侧一下堵住小巷，这个嫌犯马上就会走投无路束手就擒。我赶紧向推车的壮汉们挥手示意，一边大声呼叫：“我是警察，他是抢劫犯，拦住他！”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只见嫌犯接近板车时，那一群壮汉像是中了邪一样，齐刷刷侧过身子，硬是给这个逃跑的家伙让出一条通道，然后眼睁睁目送这家伙从眼皮底下一闪而过……当时我那个气啊，真想跳下车，扇这群懦夫“大男人”一人一巴掌！

好在穿过这条小巷就拐进了比较宽敞的谢池巷了，我的车行优势见了效，很快就追上了嫌犯。然后我等不及下车，连人带车撞向嫌犯，两人一车同时摔倒在人行道边上。

因为我个子小巧灵活，先于嫌犯从地上一跃而起，然后使出自己军警生涯中所习练的“擒拿格斗术”，扼腕，别肘，锁喉……骑压在嫌犯身上手脚并施。

可是俗话说“一力敌十功”！对方是一米八零左右的大高个，体重不下一百八十斤，我当时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五，体重不超过一百二十斤，无论身高还是体重，双方实力对比过于悬殊，我所施用的那一套“擒拿格斗术”居然没能见效！不仅未能迅速制服嫌犯，反而在混战中自己先行受伤了——不知什么时候，我感觉右手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紧接着就是一阵

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出虚汗，我下意识地瞥了右手一眼，发现右手中指掌骨外翻，已经明显变形，……略懂医道的我顿时情知不妙——右手中指骨折了！

这时，嫌犯似乎发现了我的气势有所松懈，乘机从地上爬起来，试图再次逃跑。

然而，多年军警生涯所赋予的钢铁般的意志品质这时发挥作用了。我强忍剧痛，倏地跳起身拦在他前面，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喝一声：“站住！”然后改用腿脚攻其“下三路”，运用侦察兵的“连环腿”格斗术，先后蹬出左右双腿，朝着嫌犯的裆部飞弹过去。

说来也是天意。嫌犯的身高成全了我，其裆部垂直高度正好处于我“连环腿”的最佳攻击范围之内，我弹出去脚掌不偏不倚正中他的裆部！只见嫌犯立马伸手捂住胯裆倒在地上不住翻滚，哇哇乱叫，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额头和鼻尖上也渗出了汗珠！

不过为了防止嫌犯诈伤反击，我接着跨前一步，用左腿膝盖使劲撞向嫌犯胸腹部两个致命要穴所在部位，然后左手锁喉，用受伤了的右手伸向裤腰带，大拇指撩起右侧腰间那条被许多同事用来系挂钥匙的“五四手枪系带”，然后喝令道：“看到手枪没有？再动就开枪了！”

嫌犯这时大概确实是疼得无力反抗了，只见他微微张开眼，看了看我右手撩起的“手枪带”，然后有气无力地说道：“不跑了，我不跑了……”

这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走上前来，对着地上的嫌犯教训道：“你们这些人啊，就是不学好。今天吃苦头了吧！”而周围其他人也聚拢过来，一起围观这个已经成了“病猫”的“毛人”（温州方言，意指“坏人”）。

在确认嫌犯已经丧失抵抗力以后，我指点着人群里一名有些面熟的“新中国电影院”放映员和另外几名热心群众，让他们帮着解下嫌犯的裤腰带，又把他双脚鞋带左右相交系在一起以防他再次逃跑（那时的社会环境下，老百姓对人民警察比较敬仰，对违法犯罪现象也敢于“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然后喝令他站起身，把自己的自行车上了锁，命他斜挎在脖子上，然后向设在花柳塘路口的交警执勤管理点走去，把嫌犯交给执勤点的交警

林警官，然后重新上车，单手骑车去当时的定点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求医。

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可能在搏斗过程中紧张过度了，以至于居然没想到让执勤点的林警官帮忙联系队部派人过来送我就医，而是自己强忍剧痛骑车去医院。结果精神一放松，疼痛感更加剧烈了，一路上被恶心、眩晕、剧痛折腾的虚汗淋漓，眼冒金星，几近虚脱！

从花柳塘到第三医院直线距离也就两公里不到，而我感觉就像是地球到月球般遥远。到了市中心五马街口，一阵阵剧痛袭来，头晕眼花，气短心慌，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车身开始摇摇晃晃，好几次差一点摔倒，我只好下车推车步行，一步一晃地挪到了医院，找到在口腔科工作的好友李医生，让他带我去看骨科门诊。

经过当值骨科曹医师的问诊、拍片，诊断结果出来了：右手中指掌骨粉碎性骨折！我至今还记得这位曹医生看了片子后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问：“都粉碎性骨折了，你都没有觉得痛啊？”

要说不觉得痛那是假的，只不过我在与嫌犯搏斗时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抓住他，不能让犯罪分子逃脱。这一想法成了那一瞬间唯一的意念，所以才没有被剧痛所折服。直到抓获犯罪分子后，整个人才像瘫了似的，好几次都差一点晕厥过去……

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当时与犯罪分子殊死搏斗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周少莲与东山书院

周邦杰

庚子深秋，欣闻市区公园路融入文化街区改造提升后，中山公园择地重建了旧东山书院。是日适逢天朗气清，我信步从飞霞桥边入园，跨过玲珑的小院门，来到书院正堂，看见曾祖父周少莲公所撰对联赫然悬挂厅堂两侧，联首题有：“清周少莲撰句”。顿时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我低声轻吟：“宛在水中一镜波光新画本，少焉月出平帘花影读书声。”哎，不对呀，家传曾祖父下联第五字应“半”非“平”。须知，此联多处用典，其中“半帘花影”便是由元曲徐再思之“明月半帘花弄影”句点化而来。一字之差，不容小觑，如不更正，非但使门联失色，更有辱先贤之声誉。我们周氏后裔及亲友们分头联系相关部门，经沟通很快得到各级部门领导的重视、支持，在专家学者研讨后，批准纠正。同时，转请书家周延博士重新书写。面对新对联重新登上东山书院厅堂，我们激动不已。

周少莲何许人也？乐清桃源书院郑金才先生曾撰文《永嘉周少莲旧事》（刊于2007年第10期《温州读书报》），称从坊间得周少莲《且且斋诗存》，阅后参考《杨青集》《江心寺历代题咏》等书研究认为：“《温州文献丛书》之《杨青集》有多处提到周小莲，而且后附《杨园诗录》中的周小莲二十四题三十四首诗，有些《且且斋诗存》有收，亦有《且且斋诗存》未收的。有收的与《杨园诗录》所收的，有完全相同，亦有个别字与

个别段落不相同。由此可断，《且且斋诗存》中之周少莲与《杨青集》中之周小莲为同一人。”永强项廷桢（字幹臣，号七相，曾为徐定超幕僚，民国前后任北京大理院推事、浙江省议员，晚年担任瓯海实业银行董事长）少时就学东山书院，晚年著文追忆：“光绪庚子（1900年）予以故友孔君钜庠坐诵郡之东山书院……时周筱莲先生为院主，其人高尚，落落寡合，与予二人甚相得，时常聚晤，纵谈今古事。”此周筱莲正是时在东山书院为山长之少莲公。因此，周少莲、周小莲、周筱莲均为同一人也。

周公少莲，名德鸞，字左钺，号少莲，又号衣长，以号少莲行世。祖上原系中原望族，宋南渡后转由赣闽入浙，定居平阳，明中叶，其中一支由平阳迁入东瓯。卜居城郊华亭山下，耕读传家数世，至清初举室迁入郡城，卜居八字桥。因嘉庆年间八字桥宅第大火，嗣后分出三支，各立宗祠分祠。少莲公之父莲淑公属大房派有六子，少莲公为二房，十三岁进学，时人誉为神童，但嗣后屡试不第，终生青衿郁郁不得志，发为诗文，颇为时人所赏。其诗文集有《浮甕集》（诗集）及词曲、联语、民谣等，不幸连同文集均已佚失无存。

少莲公工诗。据《杨青集》载，少莲公曾因《香奁体赠呈鲍桐卿》一诗有“云迷洞口白桃花，闲倚熏笼待月华”之句，被时人誉为周桃花。曾有某总办考孝廉堂，周少莲获第一得奖二十金，杨青作《永嘉风俗竹枝词》记之：“名士原来不值钱，最难总办渴求贤。小莲也有文星照，第一公然二十千。”少莲公有《题僧松泉老僧送客图》诗曰：“天地一逆旅，老僧亦作客。借此身外身，迎送客中客。”也为时传诵。《杨青集》赞之：人第知其“天地一逆旅”出李白《桃李园叙》，而不知其“借此身外身”一语亦有来历，盖取僧淡白写真诗“以觉梦中梦，还我身外身”也，才人下笔不苟如是。

少莲公怀才不遇，忧愤难平，自撰且且斋书室联云：“杜少陵满腔子都是忠愤，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少莲公考场失意，旨在糊口维生，长期执教于城区、近郊的私塾与书院间，曾被当地书院、私塾聘请讲学。

据其诗稿中有序记载，癸酉（1873）前后还曾讲学于杭州紫阳书院。晚年执教于东山书院，“宛如水中一镜波光新画本；少焉月出半簾花影读书声”之联由此而生：倒映在水中的东山书院，在阳光返照下，波光粼粼，就像一面明镜，折射出一幅清新的画卷；转眼，暮色四合，在皎洁的月光下，零落的花影撒满窗台，飘逸一片琅琅的书声。

少莲公出身诗礼世家，其子弟皆才学出众，不忝周氏门墙。其中，胞弟周德骏（松年）、周德麟（松涛）颇具文名，与文人名士时有唱酬。周松年尤以联见长，《杨青集》也有记载。少莲公膝下仅有一子，名警迷，字纪颖，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是温州近代教育家，新式教育先驱，为温州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周警迷年青时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及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温州，又协助留日同学、结义兄弟黄颂英等人起事，组织几百人民团响应，并踊跃充当民团的幕僚。嗣后，周警迷以兴学救国为己任，为开启温州民智、培育人才四处奔走，并以其在学界的影响，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永嘉知县委任永嘉县高等小学堂（今广场路小学前身）堂长。该学堂后改名为永嘉县第一小学，周警迷又被委任为校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于县城隍仓圣殿创办“养正学堂”，聘黄崇宪为堂长。民国3年（1914）永嘉县政府对辖区的学校进行整顿改革，将城区十多所小学统一改称“国民学校”。养正学堂创办较早，被定名为“永嘉城区第一国民学校”，县政府任之为校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并入东山小学。高卓（觉敷）、夏承焘（瞿禅）、张性白（国军抗日战将）、顾墀（丹夫）、郑克（胜夫）等民国名人都是养正学堂早期学生（详见《温州通史编纂通讯》永嘉养正学堂三题），与周警迷交厚。

关于少莲公的生卒年，郑金才先生在其书中也有所探究，认为：“周少莲诗作《甲申试拔不售》：‘卅年落魄作书顽，老我名场鬓欲斑。甘露何缘滋卞璞，秋风无力撼孙山。尚问道路虚传名，每对亲朋只强颜。毕竟文章知己少，冬烘岂与主司关。’甲申年当为1824年或1884年，而1824

年与其卒年不符，故当为1884年，从‘卅年落魄作书顽’推定其出生当于1850年（道光30年）前后。”窃以为《甲申试拔不售》作于1884年确实无疑，但诗中所述“卅年落魄作书顽”是指进学之后作了三十年的书顽，实际出生时间应在1840年（道光中叶）前后，且有少莲公诗作《归娶》为证。其诗曰：“佛言诸众生，切莫自造因。我怀出世想，云何堕劫尘。杭州山水窟，於焉溷吾身。遗音託飞鸟，未发先沾巾。永念生多孽，蚤岁背慈亲。椿荆亦荣茂，睽离我安辰。邦家稍杌隉，世故难具陈。突豕焰逆赫（辛酉会粤两匪相接），化唬使君嗔（甲子遭武夫讼事时守令仇视士夫余被羈二百四十一日）。道途历穷厄，定省亏昏晨。自分常弃擲，豈伊婚媾姻。”诗中所述辛酉年（1861年）在广东遇匪和甲子年（1864年）遭陷坐牢所推，一个十来岁少年是不可能离乡壮游和吃官司的，其出生应不晚于1840年前后，而非1850年前后，故甲申年（1884年），从“卅年落魄作书顽”而推三十年前的1854年左右应是其进学（中秀才）时间，再从十三岁进学而推，出生于1840年前后就比较确实。至于少莲公卒年，《杨青集》注称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其实《杨青集》注称所谓1904年是指公历，按农历为癸卯年。杨青《十一月晦日有感·七律》作于1904年1月16日，实际上尚在癸卯年。诗云：“彤云酿雪暗郊闾，独立苍茫剧怆神。眼底天生几逆贼（广西恶氛未靖），秋来郡丧两通人（谓周小莲、陈志三）。问谁斯世能担荷，似我浮生尚隐沦。四十男儿长落落，学诗学剑了何因。”说明少莲公卒于是年秋也，而杨青于1904年初作的另一首诗《偶悼·七绝》云：“爱莲茂叔已仙游（周小莲），转眼又倾百尺楼（陈志三）。老辈日凋怎不痛，江湖满目正横流。”说明少莲公先于陈虬（志三）而去世。而据瑞安图书馆资料《十大历史人物》记载：“陈虬因贫病交迫，心力耗竭，于1904年元旦与世长辞”，1904年元旦农历是癸卯年，时为光绪二十九年。所以少莲公逝世于1903年秋无误也。

责任编辑：朱凌云

缘结鹿城 情融党办

王邦志

1986年初，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就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归建地方发出通知：人武部行政建制改归地方，军事业务部队指导，实行地方和部队对人武部双重领导。因此，全国2600多个人武部、数万名人武干部将集体转业。

部队这一重大变局，牵动着我的心。时在温州军分区政治部工作的我，心想这是个向组织提出到人武部工作、转业地方留在温州的好时机。到哪个个人武部呢？鹿城、瓯海、龙湾……当然，首选鹿城，这是我向往之地，情有独钟。最后得偿所愿，我从军分区机关调到鹿城区人武部，随即集体就地转业，由此缘结鹿城，幸运进入鹿城干部队伍，成为鹿城辖区居民。

1992年初，鹿城区委换届之际，我脱下穿了24年的军装，由区人武部副政委转岗就任区委办公室主任，且连干两届，任职10年，服务了三任区委书记。

区委办工作这10年，深感其经历过程弥足珍贵，工作体验不同寻常，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借助这个平台，除了尽心尽责履行好办公室“综合、服务、协调、监督”之基本职能外，还由于在区委办工作期间，恰逢温州模式兴盛火热，这让我有机会在其中体验了特别的过程，平添了特殊的经历，留下了特深的印象。

频频接待全国来访

如同早年全国各地蜂拥深圳学习改革开放，奔赴张家港考察精神文明建设一样，2000年前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争奇斗艳各显风采。相比之下，温州模式之市场经济的活力、敢为人先的温州人精神，更接地气，更具特色。于是，全国各地来温州参观考察队伍络绎不绝。鹿城区作为温州市中心城区，是外地来访温州首选之地、热门之区，来访最多时，办公室曾一天接待了9批客人，那天真当忙得不亦乐乎，最后以分批介绍情况、集中宴请客人来应对。当晚在湖滨饭店安排数十桌，九批客人济济一堂，九位带队团长合坐主桌，可谓宾朋满座。记得那晚区委书记站主桌边致的欢迎词很精练：我代表鹿城区领导和机关干部，热烈欢迎全国各地领导嘉宾来我区考察指导！我提议，为我们的友谊、为美好的明天干杯！

温州模式火热期间，三天两头来访不断，办公室接待事务十分繁忙，应接不暇。虽然办公室有分管行政的副主任具体负责接待工作，但有不少来访团，我要参与见面接洽、介绍情况、宴请来宾之环节，因许多来访团党委一把手带队，内地领导等级观念较强，在意接待规格，书记带队来访，都想与这里书记交流。但这不现实，客观上难以满足，区委领导很忙，不可能经常出面，除非特别重要客人，或是友好区来宾，一般来访团，区委主要领导无暇顾及交流，只是尽可能安排陪个餐。于是我这办公室主任便要充当领导交流的代理人，每每须接待党委一把手带队的考察团，我便出面应对。每次向来访团介绍情况的开场白，也必有几句漂亮的“谎言”：今天区委几位领导，有的出差下乡，有的市里开会，区委领导委托我热烈欢迎大家……这样，礼节礼貌到位，对方当能理解。而我的区情介绍、温州模式宣讲，也会满足他们考察内容的需求。如此套路接待几成工作常态，对内，我为区领导“挡驾”分神应付，对外，我宣传温州介绍鹿城，两者兼顾。

那时接待来访的大体程序是，一般来访普通处理，遇党委一把手带队

或来访队伍较大时，我去客人下榻酒店为其介绍鹿城区情，宣讲温州模式，再参观康奈鞋业、大虎打火机或法派服装等相关民营企业，而后原则上安排一次宴请。这其中令人纠结的是宴请来宾时，常常难定作陪的区领导，有时领导们确实太忙难以抽身，有时应酬太多顾此失彼，也有领导不堪应酬重负借故推避，于是乎，那时期几位外地在鹿城区委、区政府挂职的副书记副区长们，俨然成了接待宴请出场领导的“专业户”。

干了10年办公室主任，在接待问题上，我感触很深。但凡鹿城区组团外出考察所到之地，东道主往往高规格超水平接待，有的甚至警车开道，迎来送往。而外地客人到温州来，本地接待档次水平难以与内地相对等，这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理念的差异。

我之所以尽力在接待工作上下点功夫，花些精力，既是为了宣传温州，为了鹿城形象，也是换位思考，顾全礼节礼貌，尽量别亏待了嘉宾来客，人家到一次不容易。想想，我去外地作温州模式专题报告，有时东道主一桌子领导陪我一个办公室主任，让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我们作东道主有何理由不好好接待来宾呢？

如今，“三公”早已规范，少有迎来送往，当年接待应酬的热闹景象，已然成为历史回望。

屡屡受邀外地宣讲

温州模式火热期间，曾经受邀去全国各地作过多场温州模式专题宣讲报告。这与上述的接待不无关联，但凡党委一把手带队或队伍较大的党政考察团来访，大都安排介绍区情概况，宣讲温州模式，多是我讲，短则一小时，长则二小时，这样的宣讲无数场。

温州模式内容丰富，我讲起来熟门熟路，人听起来有调有谱，有的或许留下好印象，一些考察团（尤其友好区）往往会后联络相约，邀请我去当地作温州模式专场报告，以至于我去区政协工作后，仍有不少地方邀请

我去宣讲。我曾先后去东北、西北、华南及中西部等地，作了 10 多场温州模式专场报告。

印象最深的一次报告会，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之行。汪清县是张德江知青下乡之地，2000 年的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秘书给区委主要领导来电话：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委书记带队到鹿城区考察，请好好接待交流，并考虑双方建立友好区（县）。

我和汪清县委办公室联络对接，把这事办妥了。其后汪清县委书记又来温州一次，但对方再三邀请鹿城区委主要领导带队回访汪清县，区委书记却因忙于工作，一直不能成行。考虑到已与汪清县建立友好关系，汪清是省委主要领导老根据地，且对方来过两趟，我们若不回访一下，似不太礼貌，也不好交代。于是区委主要领导赞同我的建议，特派我前往东北，代表区委书记回访了汪清县。作为回访汪清县的特殊礼物，我给汪清县 300 多县管干部作了一场温州模式专题报告。汪清县对我这位特别友好使者盛情款待，交流活动之余，让我充分领略东北特色风光及当地民俗风情，县委办主任王玉龙还陪我驱车 600 公里上了长白山，并派张副主任陪我去邻近的朝鲜，令我感动不已。

规模最大的一场报告会，是 200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营经济研讨会主场 800 多人报告会。这也是我经历场面最大的一次报告会，能有机会参与如此高规格报告会具有偶然性。此番广西壮族自治区民营经济研讨会的主场报告会议程，安排两个主题报告，一个是关于温州模式的实践与意义，主讲温州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邀请温州专家宣讲；另一个是关于广西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思考，主讲民营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由广西专家主讲。

筹办这次研讨会的工作人员，来温州邀约市委政研室主任马津龙去宣讲。马津龙作为温州知名度甚高的研究经济理论专家，社会活动多，是个大忙人，恰巧广西研讨会主场报告会的日期，马津龙已有安排无法应约。后来不知缘何，主办方就找上我了。人家邀请，我自然乐意，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啊。借此机会，我还可顺便拜访一下先前在鹿城区

委挂职的副书记、时任南宁市副市长的肖莺子老领导。按照会议安排，我和那位广西专家在主场报告会上，各讲了一个多小时。会议工作人员反馈，我的报告内容听众反响不错。会后，拜访了肖莺子（肖莺子现任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场次最多的一趟报告会，是西北之行。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是我离区委办前夕刚与鹿城区建立的友好区，我从区委办到区政协工作不久，西峰区发来邀请函，约我去庆阳，为西峰区开展解放思想的理论学习活动作一场温州模式专题报告。我应约而至，报告结束后，因原路返回交通不便（修公路），即绕道宁夏、青海，最后从兰州返回。西峰区政协主席杜富前热情至极，亲自陪送我到银川，还帮我联系好西宁、兰州主城区政协相关接待事宜。有趣的是，每到当地政协，人家好奇：你一人出来有何公干？我如实道来：受邀到友好区讲课。对方便提出：那正好送货上门，顺便给我们讲一课。结果，每到一地，便讲一课，庆阳、银川、西宁、兰州，一路走，一路秀（讲课）。这一趟西北之行，连作了四场温州模式专题报告，不禁感叹：真是不虚此行啊！

历历感受友好来往

区委办工作10年，和全国友好区（市、县）交流往来，广交朋友，增进友情，留下美好回忆。

去办公室不久，就有两次友好区之行，给了我难忘的体验感受。第一次应友好区湖北襄樊市樊城区邀请，和时任区委宣传部长章新民一道，去襄樊市参加诸葛亮文化节。文化节活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精彩。返回途中，顺道去武汉市江汉区（友好区），会访了区委办主任马小援老朋友。马小援之前曾到鹿城区考察民营经济，我全程陪同考察活动，当时言谈之间，明显感觉马小援很不一样，脑子灵活，思维敏捷，语言幽默，出口成章。考察回去后，马小援告诉我，他发表了一篇见解独到的考察论文，作了一

场规模不小的考察报告，可见其水平不凡。多年后，我偶然得知，原来，马小援是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亲弟弟。前几年，马小援从武汉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任上退休。

第二次应友好区绍兴市越城区邀请，和时任区人大主任朱道统，去绍兴市参加黄酒文化节，恰好向越城区学习取经如何筹办区庆活动。越城区之前刚举办过建区 10 周年庆祝活动，鹿城区也正在考虑筹办建区 10 周年庆祝活动计划。我刚到区委办工作，区庆活动缺乏经验，越城区委办公室毛主任二话不说，给了我越城区举办建区 10 周年庆祝活动全套资料，并详细介绍他们区庆活动的做法体会，让我很是受益，我和毛主任从此成了多年好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浙江五个城市中心城区结为紧密型友好区“联盟”：温州市鹿城区、绍兴市越城区、金华市婺城区、嘉兴市秀洲区、衢州市柯城区。这缘于当时地市行政体制改革形势，这几个城区行政辖区特点类同，都属地区行署改市管县体制后新建立的中心城区，便结成省内同类友好城区“联盟”，经常交流，互相借鉴，互通有无。于是当时这些中心城区的区委办主任们，都成了经常联络的好朋友，有的至今保持联系。

印象至深的是 1994 年，温州遭遇威力巨大的 17 号台风侵袭，死亡千人，损失百亿。鹿城区也遭受重创，损失巨大，区委办公室向全国友好区发了个“鹿城区遭受 17 号台风灾情通报”。结果，所有的友好区都回复慰问信，深表同情慰问，鼓励抗台救灾，体现了友好区的可贵情谊。友好区还纷纷汇来慰问金，少则五千，多则五万，一般的一两万不等，金额虽少，情意深重。

随着温州模式风靡全国，各地来温州鹿城学习考察的日益增多，要求和鹿城区建友好区的也越来越多，我在区委办公室期间，又与全国各地相继建了几十个友好区，离开办公室时，友好区的数量早已比原来翻了一番多。至此，全国东西南北中，遍布友好区。期间，区委组团外出考察，或是东走西行，或是北上南下，其考察活动路线选择安排，多以相关友好区

位置为轴心轨迹。相比较而言，与这些友好区相互来往活动，常是外地来的多，而鹿城区去的少。

我先后走过一些友好区，皆被所到之地奉为贵宾、盛情款待，每每留下深刻印象，如北京朝阳区、上海长宁区、哈尔滨动力区、沈阳和平区、内蒙古赤峰红山区、乌鲁木齐天山区、南京鼓楼区、广州白云区、福州鼓楼区、扬州广陵区、无锡崇安区、大连上岗区、青岛市南区、珠海香洲区、武汉江汉区、贵阳花溪区、昆明官渡区、重庆渝中区、成都金牛区、济南历下区、南昌西湖区、徐州云龙区、西安灞桥区、庆阳西峰区、广西宾阳市、山东无棣县、内蒙古鄂尔多斯……

接连服务三位首长

我是老兵，在部队领导即首长，首长的威望刻入心房。脱下军装转岗地方，为领导服务，领导依然是我这老兵心目中的首长。自然，我主要服务的是区委的主要领导，那就是地方的1号首长——区委书记。

干了10年党办主任，服务了三任区委书记，这在鹿城区委办任职史上是唯一的，想必在其他单位也少有。或许不经意间，让我创下了这么个任党办主任时长服务书记之多的记录，我估摸一般少有人会去破此记录。

我之所以任党办主任时间有点儿长，当有多方面因素，自我分析，多少也与自身的人品特性不无关系。鹿城区首任区委书记、原市委秘书长邵锡水，对办公室主任身份有个诙谐生动的比喻，戏谑为“高级奴才”。如果这个比喻恰切的话，那么我也许可算是这“奴才”的料，我大体具备“高级奴才”所应有的“牢记职能、认真负责、忍辱负重、忠诚老实”的素养特质，尤其尽管水平不高，能力不强，但在做事踏实、做人老实方面，口碑不差，这也许是我持续服务三任书记的重要缘由。

办公室主任及秘书，乃领导贴身随从，当领导的一般忌讳使用跟过前任的主任或秘书，我成了例外。感谢我服务过的几位书记对我的信任使用，

对我的指导关照。感谢组织让我在办公室工作 10 年，学到有益的东西，留下珍贵的回忆。

我的前任张周杰主任向我交接工作时，坦陈他履职办公室之感慨：老王，你来接这个班，我很高兴，你是军人，我相信能干好。说实话，办公室主任这个活，真是不太好干，有时会受气，里外不是人。但这位置锻炼人，这平台能接触很多人，要处理很多事，尤其天天在领导身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是近水楼台的好处。

10 年办公室主任工作实践，印证了前任主任的感慨所言，而我服务了三位书记，比之前任经历更长，接触更久，感受更多。10 年党办主任体验，也是我人生职场最好的历练。我庆幸能有机会在这特殊岗位多年连连实践，历历修练，让我感悟多多，收获满满；我欣慰在这重要岗位履职过程，情融其间，尽职尽责，少有差池，圆满收官。

鹿城区作为温州市中心城区，区委主要领导职级多为高配，书记人选能力大都较强。我跟随的几位书记，先后升任市委副书记，其中两位书记后来分别任金华市委书记、温州市政协主席。这三任区委书记都有很高的水平、很强的能力，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工作风格和领导艺术，在我为其服务与其共处的 10 年间，零距离领略感受了各位书记为官处事的魅力风范，让我受益匪浅，给我的职场经历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段记忆，我对此十分珍视、十分留念。

坦率的说，我对跟随服务过的这几位书记都很敬崇，但其中也有些微不同的体味和感触。比如，第一位书记知识丰富，思路清晰，风格独特，处事果断，而我刚脱军装转岗地方，工作需要适应，岗位需要转化，书记刚从山里到城里，辖区情况需要熟悉，工作局面需要打开，双方工作环境和岗位角色都在转换磨合之中，初始工作中，我的行动节奏相对书记的处事节拍偶尔滞后而受责，使我对书记多少有点敬畏；第二位书记到任时，我对办公室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彼此也相互了解，书记又很大气，工作抓大放小，宽严相济，张弛有度，尤其书记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思维敏捷，

视野开阔，让我对书记很是敬佩；第三位书记领导资历深厚，工作经验丰富，统揽全局应手，尤其书记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一丝不苟的处事准则，勤勉敬业的为官境界，让我对书记非常敬重。

敬畏也好，敬佩也好，敬重也好，都是书记们给我留下珍贵而美好的记忆，成为我对跟随过的首长们最可珍视的永久念想。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我的大学

徐波克

年青时曾读过高尔基的自传体《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也曾想过写一部类似的自传或回忆录类的东西。然而，不知怎么，至今一篇也写不出来。不是没时间，主要是都想不起来了，还有确实没啥可值得一提的事。一辈子平平淡淡，庸庸碌碌，虽不至于完全虚度，却实在没一点可吹牛的功业。

我的童年，无疑是幸福的。在幼儿园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我的少年时代，应该说也是顺利的，像温室里的花朵天天向上，茁壮地成长。不像高尔基在人间，备尝社会底层的艰辛，渴望读书而不能上学。我的青年时代，大概要从17岁下乡算起，就进入了人间。中学实际未毕业，只读了2年，无毕业证书，便一下子进入了社会大学，或叫劳动大学。

1969年5月16日，这是个注定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我满怀豪情地在人民广场上了汽车，在一片哭声中告别了亲人，勇敢地迈上了人生的征途。

火车大约咣咣了三天三夜，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叫鹤岗的地方。下了火车，马上有人来接上大卡车。“二连的，跟我来！”一位脸蛋红朴朴的漂亮的女战友喊道。我们便很快地跟着上了车。后来便知道了，她是早点来的北京知青，为人热情爽朗，能言善写，还喜欢唱歌。

一路上，只见一马平川，略有高低起伏的山峦和田野，一眼望不到边，真的叫广袤无垠。那种天地相连的辽阔，让我视野大开，心情一下子兴奋起来。啊，真是广阔的天地呀！可一想到将要在这空旷无边的荒原野地里生活劳动一辈子，心里便怅然了，一脸茫然的表情。

我们18个温州人，9男9女，裹着棉军大衣，顶着呼啸刺骨的寒风，很快被拉到了连队。蒙头转向地下了车。找到行李后被带到一座挺大的砖房里。这是机务排的保养间，临时腾出停机车的大间，里头有临时搭成的统铺，长长的一大排。席子下面铺上了厚厚的一层草褥。我们9个男的都挤在一边，打开铺盖卷便很快安顿下来。大概一星期前，上海的知青已来了，也挨着挤在一块。

第二天就开始上班干活了。我被分在基建排四班，班长叫吴宝合，是东北人，当地的老职工，比我大7岁光景。他带着我们脱坯、把泥和上水，加进草料，搅拌均匀了后装进长方形框架里，制成一块块土坯。

这是我第一次干活，可以说此前在家没干过任何活。为了表现好，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我竟脱去鞋袜，光着脚丫子在泥水中踩着和泥，很卖力地干起来。不一会儿，就把脚冻得通红。5月的北大荒，还是刚刚化冻，泥水彻骨的冰凉。为了表示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硬是坚持着干。后来宝合说，快去洗一洗，把鞋袜穿起来吧！别把脚冻坏了。也奇怪，我的这双又嫩又白的脚丫子，竟然没冻坏，还变得火辣辣的，暖乎乎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一口气吃了4个大包子。大概是从没干过这么强的体力活，加上从没吃过这么大的白面馒头，好像也没啥好菜，竟吃得那么香。

大概一个月后吧，我觉得自己变胖了，变壮实有劲了。原来的白面书生变成了黑不溜秋的傻小伙。同乡们一起到鹤岗照了张集体照，自豪地题上：站在最前线。

在老职工的帮带下，我也学会了干各种基建活，如砌墙、抹墙、刷灰等。还有冬天上山打石头，10来磅的大锤一抡就是百来下，而且打得又稳

又准，从未伤着扶钎人的手。还有夏天制砖，用独轮车把制好的砖装满两侧，推到砖窑，装好窑，点上火。大热天在高温的窑前用大铁锹加添煤块，那真是汗如雨下。

农忙时也要跟着一块下地，如夏锄时也要下地锄草。还记得新来的阎连长作动员，只说了一句：是英雄还是狗熊，地头上见！便一鼓作气跑在前列，也顾不上有没有把草都锄掉了。也不是一定要当英雄，主要是到了地头才能喝上水。一垅地实在太长了，半天也只能锄二三个来回。

最难忘的是夏收时阴雨天抢收麦子，那密密麻麻的小咬直往头皮里钻，带上帽子一点用也没有。把人咬得奇痒无比，欲哭无泪，吱哇乱叫！随手一拍，就会有一大把。还有可怕的大瞎虻，一不留神，就会被咬上一口，疼得你大叫！这一切也不知当年是怎么对付过来的，还不包括晚上成群的蚊子呢！

到了秋收时割大豆，戴上手套也扎得手上都是血。小镰刀很快就割钝了，半天也割不到垅头，累得直想躺倒在地上不起来。咳，现在想想，那一天才一块钱，一月32元的工资还真是不好赚哩！

北大荒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空气中总是弥漫着冬的气息。本该绿茵的草地上仍覆盖着残雪，在南方正是春雨绵绵，这里却时不时雪花飞舞。路旁排排白杨树刚吐芽，挺胸抬头昂扬向上。当黑土地裸露出博大胸怀迎接春播的时候，那春的气息似乎还很遥远，早晚冰冻依然。

紧张劳累的春播开始了，到处尘土飞扬。只见一台台红色的东方红拖拉机，牵引着宽宽的犁铧和播种机，在无边的田间忙着作业。几个老乡被分到机务排，很快就学会了开拖拉机和简单的修理。看着他们坐在拖拉机驾驶里操纵着方向杆的神气样子，我便好生羡慕。尽管他们每天都让漫天的风尘吹刮得浑身都是尘土，可还是觉得他们的工作值得自豪。这才有诗意，春播大地，到夏收时麦浪滚滚。这才叫建设边疆，辛勤耕耘，撒播下千顷种子，到时再开着康拜因收割，如此农工，多骄傲呀！

有时，实在倾慕得慌，便找老乡请让试开一下，悄悄地干活。嘿！开

起来也不难掌握，总算过了把瘾！

北大荒的夏季，白昼比我们南方要长得多，早上二三点钟，东方已出微明，晨曦普照大地。我们在催促声中，睡眠朦胧的起来，草草洗漱完毕，喝碗苞米粥，啃一个玉米窝头，就点咸菜，就马上上路除草了。那大豆地一眼根本望不到边，一条垅沟就有一亩多。齐腰的豆苗和杂草共生，长得都郁郁葱葱，既不能碰伤豆苗，又要将杂草除尽，并不简单，相当累人。大伙儿都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动作相当准确利索，一锄便将一棵杂草锄去。有时也难免有漏网的，但一般不故意偷工减料。

北大荒的花季也来得迟，在傍晚时分，我们扛着锄头回宿舍，只见路边边角房前房后，那些不知名的野花争妍斗奇，常会给你个惊喜。采上一朵，一天的疲劳便放松了许多。

炎热的夏天可惜太短，那漫山遍野盛开的五颜六色的野花，还未来得及好好欣赏，便不觉间花谢花飞了。

小麦成熟了，玉米在拔节，大豆封垄，齐整没腰，深沉的绿叶下有无数毛茸茸的小豆荚在探头探脑。

转眼秋天来了。大豆摇铃，苞米硬朗，忙碌的秋收开始了。比起割大豆，掰苞米就显得轻松多了。

场院里的脱粒、装袋、入囤，也是不轻的活儿。我虽不是场院排的，可各种活儿都干过。最累的是扛着装满小麦或苞米的麻袋，踩着跳板往上扛。估计一袋大概至少有五六十斤，多则一百多斤。现在想起来颇不可思议，那时的我们竟然有这等体力，走上高高的有点微颤的跳板，将一袋袋粮食倒入囤中。而且一天下来，也没有听说谁把腰扭了。睡一觉后，第二天啥事没有照样上。

人到中年以后，也没干啥重的活儿，竟几次把腰给闪了，后来还严重到椎间盘突出，住了一个月的院。想来有点好笑，经过千锤百炼的身体，长期不劳动了竟变得如此脆弱。

很快，漫长的冬天来临了。到了十月初，江河便开始封冻。鹅毛大雪

说下就下，三天后就有规律地刮起“大烟炮儿”。没到过北大荒的人可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大烟炮儿”也有写“大烟泡”的，说白了就是暴风雪。它三天两头的刮，刮起时便相当狂烈。地上的积雪会被卷到空中，迷迷茫茫的一片，难分东南西北。整个天空被风雪遮盖成灰暗色，空中密密飞卷的雪片几乎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只听得暴风打着尖利的呼哨，挺吓人的。人只能倒着走，走几步又回头看看。此时的室外温度一般在零下二三十度。滴水成冰，一点也不夸张。小便马上冻成冰块。出门不带皮帽、棉手套，很快便会冻伤。晚上懒得上厕所，男的便都在宿舍门口就便，把门外两侧浇冻成两座尿坡。在阳光映照下，闪着缤纷七彩，为满目洁白的冰雪世界增添了一道亮丽色彩。

不过，说来也怪，我在那里过了六个冬天，竟然毫发未损，反倒是在回城后的头一年冬天，手上长起了冻疮，哈！

冬天农闲了，可后来大搞起挖渠修水利，起早摸黑的一天也不消停。水利大会战的宣传把气氛造得足足的，每天一大早就大喇叭响起。大冬天五点多就须起床，匆匆吃过早饭，就扛起镐头、铁锹被拉往工地。然后每人分到一二米的地段开挖。那地真的叫“地冻三尺”哪，岂止非一日之寒，而是非数月之寒。抡起镐头刨了半天，也只刨了个小坑。一天下来，好不容易总算完成分配定额，可浑身已累得像散了架，内衣裤早已被汗水湿透。风一吹，变得硬梆梆的，那难受劲儿无法形容。有一次到很远的连队支援，差点因去大便而赶不上回来的车，人生地不熟，天寒地冻的，真是好惊险，至今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那时的和后来的我总在想，干吗不等开春化冻后再挖？能不能讲求点科学种田和效率？要能安排点时间学点文化知识该有多好！前几年宝合来温时，我问起当年挖的沟渠水利有用上吗？他说有。于是我便略感释然，总算没白折腾。为此流的大汗，多少也算值了！

人老了喜欢怀旧。说起来不好意思，本人自小就不爱劳动，一上劳动课总想溜。记得一次拔草，别人都拔了几筐，或几篮子，我却只拔了几把。

前几年小学同学会时，酒席间有一女同学说：你那时学习很好，就是劳动较差。有一次劳动课拔草，你只拔了几根。我说那不至于，几把还是有的吧？都半个世纪过去了，她竟还记得我的这些事儿，真令人惊讶她的记忆力！

的确，我小时除了会吃饭和穿衣外，真的啥也不会做，十指如葱。不想后来在北大荒的艰苦环境里竟能适应下来，那种超强的重体力劳动，竟也能对付过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除了机务、学校、商店、卫生室和赶马车未干过，几乎所有的活都干过。而有两样工作是很少有人干过的，一是放牛，二是养蜂。

大约是在建武装连后，我被调到了后勤排，当了一名光荣的饲养员。其实就是放牛，整天手执一根鞭子跟在一群牛屁股后面转。

说实话，当时的失落感别提有多大了，见人总觉不好意思。你想吧，你会羡慕放牛这一工种吗？哪怕养猪也是个技术活呀！除了把牛看住，到时就赶回圈里，把门插上，便不用动任何脑筋了。轻松倒是蛮轻松，悠哉游哉的，可这就是我大好青春年华所要追求的事业吗？

那时的师傅叫陈玉廷，山东日照人，矮矮的个子，满脸皱纹，总是笑嘻嘻的，腰黑总扎了根红带子，一副典型的贫下中农模样。他只认得自己的名字，有两个五六岁的女儿。他总是抽自卷的烟叶，先撕一张纸片，卷成尖圆形，倒入捻碎了的烟叶，然后“叭哒叭哒”滋滋有味地抽起来。总见他手不离烟，似乎一根接一根。他说抽纸烟没劲，卷烟叶够劲。我跟他学着卷了一根，一抽，咳，那味又臭又呛，实在不想抽第二口了。回想那段时间里，好像除了从老陈那里学会卷烟叶外，别的似乎就没学到什么了。

在那段日子里，因无书可读，我几乎通读了毛选四卷。把那段最有文采的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话，抄在纸上，边放牛边诵读：你是立于高山之巅可见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你是大海中隐约可见的一根桅杆，你是躁动于母腹之中即将呱呱坠地的婴儿。于是乎，似看到了光明的前景，生活勇气倍增。

果然不久，大概第二年春夏之交，程副连长对我说，你去养蜂吧！把

我高兴得偷着乐了一夜。终于可以放下那根谁也不稀罕的鞭子了！我马上写信叫家里寄来有关养蜂的杂志，决心一边从书本里学，一边从实践中学，一定把蜂养好，不负领导信任。

那段养蜂的日子是最有趣味的时光。那可是最地道的世外桃源般的农家乐野外生活。我们自搭茅屋棚，自种瓜菜，带去米油盐，自劈柴火，在大铁锅上倒上点豆油，炒巴炒巴，加点盐，加点水，盖上盖稍闷二分钟，一盘盘菜就出锅了。记得我们那时种了好多种菜，有茄子、芹菜、韭菜和青椒等。由于是自种自炒的，吃起来那个真叫香哪！

还记得那时的蜂蜜是琥珀色的，甜得发腻，不太爱吃。据说是椴树蜜，可那口感不像现在卖的东北椴树蜜那么纯正。每天可产出很多蜜，倒入大桶存起来。

那时山上好像也没什么蚊子，白天基本没有，晚上似乎也不多。前几年带着小谢去连队，正碰上小马。他一眼便认出是我，问想不想去看看当年的养蜂场。我挺高兴，便坐他的车上了山。下车后沿小道往里走，一路被成群的大蚊子追着跑，快到时被水沟挡路过不去，只远远地望见当年的小茅屋顶。颇为遗憾而归。可能是长年无人迹，这里竟变得如此荒凉，令人扫兴，使人感叹。原先心目中梦幻般的仙境，竟面目全非，不敢再来了。

“你不能到这里来！这儿是军事要地。”那天傍晚，我吃过晚饭，兴冲冲地到刚组建不久的武装排宿舍想找老乡说点事，顺便看一下枪。没想到，被刚从里面走出的周副指给挡在了门口。

我一楞，盯着他看，铁青色的脸上没一丝笑容，不像是在开玩笑。顿时，我感到泪花涌上了眼眶，当场掉了下来。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严肃话语深深刺激了，一时竟不知所措。如硬要进去，肯定不允许。算了，其实也没要紧事，只好转身离开。回头一瞥，他还在盯着看，似乎担心我还会又进去。

那一夜，我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想了很多很多。难道我会进去搞破坏？会刺探军事情报报给苏修？太没人情味了，连老乡都不让看。不让扛枪，还不能进宿舍，我就那么让人不放心？

第二天刚好是休息天，我独自跑到了佳木斯，中午喝了瓶啤酒，坐在松花江边，望着湍急的江水飞卷着浪花流向远方，不平静的思绪也在上下翻卷着。想自己满怀热情来保卫边疆，不惜洒一腔热血，却连宿舍都不让进。想这么努力，还是不得不背所谓出身成份的包袱，不知何时是了？今后的前途到底还有吗？活着还有奔头吗？想着想着，泪水忍不住又流了下来。我坐那儿想了很久，从以高分被分在最差的民办中学想起，一直想到昨晚的刺痛……

后来，我捡到了一本破旧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翻来翻去看了又看。把那段“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的名言抄在了笔记本上，读了又读，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保尔在身体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坚持创作自传体小说，终于写出传世名著。今后应像他那样，坚强地走完人生的旅程，争取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后来，可能是一个出身不错的战士因偷看女厕所被除了名，我终于勉强凑合着被调到了武装排。

当我第一夜背着枪在门口轮值站岗时，心里相当激动，啊，我在为祖国边疆的安宁站岗放哨了！可不一会儿，便冻得受不了溜回屋暖和一下了。其实当时的枪里也没子弹，还是老掉牙的五十年代初的苏式冲锋枪，与人家的新式步枪不知差了几代。真要是敌人来了，就只能当铁棍子使。那反坦克炮也是苏联留下的。

6门炮曾在实弹演习时开过一炮，落弹都离靶子远着呢！不过，一次练打步枪，我的成绩还可以，在零下十几度的情况下，三种姿势都射中靶心，大概平均有7环吧。

后来形势变了，中苏紧张的关系缓和了，武装排取消解散了。我与一上海战友在炮前留下一张极珍贵的合影，可惜已模糊不清了。不管怎样，我应为有这段光荣经历而自豪，尽管没机会打仗立功。还应庆幸，曾差点因宿舍失火烧掉被褥，旁边的都烧了。那天在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回来一看，宿舍一片狼籍，乌烟瘴气的，比卖花姑娘还惨。

已记不清是在哪段时间里，我突发奇想，向副指导员兼团支书的大柳建议，想办一个图书室，以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马上得到领导们的支持，给开了张支票，在探亲回连队经上海时，买了一百多本书带回。当我扛着一大箱子书走在小道进来时，心里美滋滋的，心想这下大伙儿有书看了。

连里在学校给安排了一个教室和书柜，还不知从哪弄来包皮纸。我把每本书都包上封皮，写上书名，登记造册。然后晚上开放借书。看到大家高兴地来借书看，便开心极了，忘了一天干活的疲劳。虽然书不太多，但多少解决了当时业余生活枯燥单调问题。

在我北大荒五年多的生活里，有三件事总是时常在脑海里浮现。

一是与人差点打了起来。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曾莫名其妙地与一北京知青差点打闹起来。

大约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这世上还有啥是可信的？于是乎，只觉前途一片迷茫。有人喝酒，有人打牌，有人打闹，反正是无聊加空虚，混一天是一天。加上我那时经常锻炼，喜欢玩点举重、双杠、吊环什么的，手臂肌肉鼓鼓的，觉身上有劲没处使。一天，一老乡与一北京战友似发生了口角，对方骂骂咧咧的，老乡似还在笑。都没听清他们吵了些什么，我便打抱不平，上前就朝着胸口给了那位一拳。顿时把他打懵了，气得暴跳如雷，没想到平时老实巴交的我竟会先动手打他。嚷嚷着要扑过来，很快被人紧紧抱住了。他顺手就从旁边抓起一把镰刀扔过来。还好，没伤着。我也被人拉开了，事没闹大。其实也没啥，是我冤枉了他，他平时说话就嗓门大，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事后想想还真有些后怕。要真打起来我还真打不过高大的他，肯定要吃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人打架，也是唯一的一次，故总是忘不了。曾写过一篇《打架记》发于二连网站，略表示歉意。也许他早已忘了此事，通话和碰到时一直都很客气，可我却总觉有点对不起，又不好意思当面向他致歉。

第二件是值得吹小牛的事。自那件说起来不那么光彩之事过后，我感

到不能这样消极沉沦下去，还是要振奋精神，努力进取，把业余时间利用起来学点什么。便与几位铁哥们商量，搞个自学小组，互相讲课，交流学习心得。他们一致赞同，自认课题。我说，最近在读一本语法，试着讲讲看。于是认真备课，每周讲两次。现贩现卖，把一本语法书啃了一多半。不想竟为以后的报考市财办秘书打下了扎实的底子。据说语法部是唯一满分的。可惜当时未能坚持多久，忘了不知啥原因后来停了。不管怎样，这是件颇值得回味的有意义之事，一般人还真是没想到，更不会有此创举。尽管与正牌大学无法相比，可当我们坐在借用来的小学教室里上课时，那种其他娱乐难以替代的求知快乐，实在无以言表，至今回想起来还美滋滋的。

还有一件事是上大课。那是在批林批孔那段日子里，我偶然看到一本上海出的杂志，里头有篇文章，题为《孔老二何许人也》。便突发奇想，把它作为讲稿，利用晚上开会学习时间，上一堂大课。便马上找领导建议，说为了丰富学习形式和内容，让我讲一次试试看。领导一听，好啊，你后天就讲吧。奇怪竟很快同意了，也对我太信任了，都知道平时的我是个不爱吱声的人，不怕我讲砸了呀。我赶紧备课，其他资料根本没有，只好把那篇文章反复地看，几乎熟到能背下来。两天后，在土坯盖成的大会议室里，支起了一块黑板，我站在那里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能感觉到大家听得蛮津津有味。我知道自己其实讲得并不生动，几乎都在照本宣科地复述。可能是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课，觉得挺新鲜吧，再者多少有点历史文化知识在里头。事后我颇得意了几天，为自己的试讲基本成功，没人说讲得太差了而暗自窃喜。其实，那是替“四人帮”欲批周公借古人造舆论做了一回宣传，却浑然不知，哪懂政治的套路那么深哪！那时哪里想的到，现如今，孔子学院已遍布世界各地，仍为世人崇敬如神。当时真是无知者无畏，愚不可及，还充老师误人。

不过，那不知深浅，不知哪来的勇气的傻里傻气当老师之举，还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锻炼，以至我后来在宣传部工作，讲了不少课，讲过党史、哲学、中特理论和国际形势，一讲就是一二个小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还真有点“先生”的样子。其实呀天知道，还是当年的“老三届”，连初中文凭都没有。直到后来才混到了相当大专的中央党校函授班的学历。

一九七五年春节前，我随返城大潮，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生活了大约五年半的北大荒，回到了温暖可爱的家乡温州。

啊，往事不堪回首，如烟又并不如烟。

我为自己这辈子没有上过正式大学而遗憾，也为自己上过北大荒的劳动大学而庆幸。那是一个多么大的社会课堂呀，辽阔无边，天地相连。在那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包括各种劳动技能，还有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虽然那段求学经历是如此坎坷不平，这般充满悲喜，也没有给发个啥文凭就再教育自然结业了，我却总觉得，那是一段一般人难得上到的值得终生怀恋的的大学生活。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网”

童年轶事

王曙

在家中我行小，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家庭成员，从小就在父母哥哥姐姐们的呵护下成长。爸爸妈妈的疼爱，哥哥姐姐们的关爱，虽然在我婴儿时的记忆中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冥冥之中我感受得到。长大一些时通过哥哥姐姐们的讲述和回忆，让我切肤地感觉到父母的伟大和无私。我们的家庭从来就是一个和谐平安温馨的港湾，虽然父母去世，兄弟姐妹四人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和岗位，我们依然心心相印，相互挂念，一年一次（或几次）的大团聚，是我们“法定”的规矩。从父母那里传承下来的美德正在我们这个大家族中延续，发扬，大家虽然相隔千里，但是毫无淡漠之感。现在回忆起来才渐渐明白这是家风的影响，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家的温暖的种子。父母一直在教育我们要团结互爱，不争不抢，感谢别人要胜过自己。那时候特别期盼过年，每逢春节，大年初一大早父亲就带领我们，面对一张书写着列祖列宗名字的大红的装裱精良的牌位，点烛焚香，大礼叩拜。诚心诚意地请先辈们来家中，看看后人的兴旺，让他们欣慰和宽心。（过年的这几天，大人不让我们乱说话，凡和那些不吉利的字眼如“死”“归”之类的不让说，哪怕是谐音字也要规避。）事后，母亲就在楼下客厅的八

仙桌上，用红丝带做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形状的图案，将落花生，糖块，芝麻糖卷，瓜子，山核桃等等，均匀地分成六份。五角星最上面的一角是给爷爷奶奶的，中间的是给爸爸妈妈的，上面两个角是给姐姐哥哥的，下面是给二姐和我的。姐姐在部队，妈妈就将她的那份分给我们，让我们大声地喊：“姐姐，过年好，谢谢您的礼物！”那时候，家境不好，过年能够得到这么多好吃的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哥哥和二姐又将他俩的那份，偷偷地抓一些塞进我的口袋里。新衣服是妈妈用一些大人穿过的旧衣，翻新改制，我一个口袋里装着糖果花生，一个口袋里装着爷爷给我的一小挂鞭炮，上面口袋里还藏着几毛钱的压岁钱。浑身上下鼓鼓囊囊地，我骄傲地如同一个“小财主”。

我姐姐长我十岁，哥哥长我八岁，二姐大我两岁，除夕夜是我们的天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围坐在屋里，看着我们轮番地即兴表演节目。我一会儿表演孙猴子，一会演关公，一会儿表演猪八戒，在里屋，将被单，枕头套，大人的衣服尽往身上套，套个什么就声明自己演的是什么，哥哥在里面当后台，伴奏什么的。二姐最实诚，一挑门帘出来永远是一句台词：“吃饭了——”逗得大人们笑得前仰后翻。一家人其乐融融，记得那年我六岁，一个一去永不复来的六岁，一段永远铭记的岁月。

哥哥姐姐们经常对我说，你这条命是爸爸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那年，抗日战争中爸爸任教的大学迁址到贵阳，后来又到了重庆的万县。我就出生在万县一个叫蹕洞子的山村，我才出生几个月，一场大病袭来，发高烧，浑身抽筋，惊厥。父亲在山下“流亡大学”中教书，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急坏了妈妈和哥哥姐姐们，眼看着快不行了，隔壁房东杨奶奶帮助抢救想尽一切办法，掐人中，香灸肚脐眼，金戒指煮水喝。哥哥姐姐哭着跑到后山，插上香一个劲地磕头：“菩萨菩萨，保佑我们的弟弟早点好起来吧！”。眼看着我脸色发紫，渐渐地断了气，几乎是没有希望了，停放在屋里泥地的草席子上，等着爸爸归来，一方面请村里人去张罗购买小棺材。很晚很晚爸爸得到消息，火急火燎地跑上山来。一进门见状赶紧抱起我，贴在胸

前附耳一听，大声叫道：“都别哭，还有救！”可能是那地上的凉气一拔，让我又缓过来了。父亲将带来的药物包打开，给我注射，紧紧地将我搂在怀中取暖。有生怕我再惊厥，不敢放在床上，用一块硬纸板双手托着，在屋里来回踱步。母亲用米汤一滴一滴地喂我，他们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二

父亲为我取奶名叫晓梦，说是母亲生我的头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小男孩款款走来，凌晨我出生了。于是就取乳名为“晓梦”。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应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而为我取名。

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一高兴就拉上一段京胡，唱一段京戏，母亲经常让我们围在她身旁，吹一曲箫，好听极了。

都远去了，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那天籁之音了，心中的那种悲怆感经常缠绕着我。

都说，父母的爱是天性，是最无私的。那么我们又能够真正地懂得多少父爱与母爱，或许，基因的传递，让我们掂量到这种爱的分量，但总是姗姗来迟。

后来举家迁到杭州，童年就在杭州度过。开始临时租住在保叔山下（一个叫“石塔儿头”的地方）一个老房子里，现在我一点也想不起当时的场景，只记得，每晚院子里的大树上，猫头鹰凄惨地叫着，相当惨人。

父亲后来在杭州武林门洗马桥旁建了一座小楼房，一座有挺大院子和后门小院的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就是我的老家，是我滋长童年的摇篮，也是放牧少年时光的地方。从朝西的马路旁的大门进去穿过楼下的客厅和走廊便到了院子里。朝东的右手旁是一架户外木质楼梯，一边紧贴在山墙上一边的扶手，上面爬满了喇叭花，通往二楼的房间。由于天长日久楼梯虽然有廊护着，踩起来咯吱咯吱地发响，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种有节奏的

乡音。院子中央有一块巨大的青石板搭成的石桌，夏天一家老小都会围坐在长方形的石桌旁用晚餐，喝着黏稠的玉米粥，啃着奶奶做得大馒头或是香喷喷的花卷。桌旁有一株硕大的桃树，可惜是一株开花不结果的碧桃，几乎每年的春天都是它告诉我们的。小楼房座西朝东，楼上楼下各四间房，基本上楼上做卧室，楼下为客厅。楼上住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大姐当兵去了部队，哥哥就学住在学校中。我排行最小，和二姐住在朝西的那间，推开窗子就是西大街武林路，熙熙攘攘的行人尽收眼底。

马路旁有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冬天落尽所有的叶子让夕阳洒到床上，夏天满树的绿叶又遮挡了炎热。到了秋天树上垂挂下许许多多用枯树夜卷的虫囊，里面藏着一条条准备过冬的虫儿，细丝吊挂在树干上，风中飘来飘去，像无数风铃在摇晃。

爸爸妈妈住在朝东的那间，一排木窗镶嵌着五颜六色的花玻璃，清晨的阳光带着玻璃的色彩将整间屋子染成五彩斑斓，给我儿时带来那么多的幻想。爷爷奶奶的房间在走廊边的朝东南的那间，也是我最爱去的地方，那房间里不仅仅有辛辣的烤烟味，充足的阳光，最重要的是有听不完的故事。后面就是妈妈的画室，宽大的画桌面，文房四宝齐全，是妈妈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揽活作画的地方。朝西的那扇窗将远处的保叔山和挺拔傲立的保叔塔尽收窗框之中，带来无尽的遐想和画意。每次放学回来妈妈总是命我坐在画桌的一头，将当天的作业完成。做完了作业妈妈特别高兴地和我下一盘象棋，我知道她总是让着我，因为我赢了就有奖励，窗外楼下路边有一个摊甜米饼的小贩，发糕一样的米饼特别香甜，妈妈用绳子将铺着毛巾的小竹篮放上几分钱从窗口续下去，不一会提升上来就是热气腾腾可口的米饼了。妈妈笑咪咪地望着我的狼吞虎咽，把我嘴巴一擦，在母亲“玩去吧”的话音未落中，我一溜烟地从木楼梯上飞抵院子里。

百十平方的院子是我的天堂，一架竹棚挂满大大小小的丝瓜，北瓜，院内鲜花繁多，我特别喜欢那我们叫它“指甲花”实际上就是“凤仙花”。

不仅仅是花开得美丽，那花瓣摘来捣成泥，糊在指甲上，能够将指甲染红，这自然是女孩子的活了。我喜欢用手指轻轻触摸凤仙花的种子，只要成熟了，一碰便突然“炸开”将一肚子的种子弹射出去。那山墙上爬满了月季花和蔷薇花，大半年地绽放，香气弥漫整个小院。在院子里是我捉蚰蚰，滚铁环，打陀螺，和小伙伴一起捉迷藏的风水宝地。

我喜欢在院子的角落里，坐在小凳子上观看两窝不同群的蚂蚁为争食而群殴。会找来一些蜻蜓或者是蟑螂的尸体，放在一个蚂蚁洞的前面，那侦察兵似的蚂蚁，尝了尝美味，绕在猎物转圈，在计算猎物的大小重量，预计需要多少同伴来搬运后，就直径向蚁巢奔去，不一会就从蚁巢中带着一大队蚂蚁朝着猎物而来，将猎物团团围住，一边撕咬一边拖拉。可能是猎物太大，又有一些蚂蚁飞奔而去叫更多的援兵，这时，个头大出工蚁好几倍的兵蚁也纷纷出巢助阵。我总想听懂它们是怎样说话的，有时会拿来父亲的听诊器贴近它们聆听，总是一无所获。后来发现它们是用触须在进行交流，头碰头地说着“蚁语”，只是太微弱了无法听见。我将远方另一个洞穴前已经爬满蚂蚁的猎物，慢慢地拖到这边的蚁群旁，好家伙，两群蚂蚁立刻爆发了一场大战。显然被拖过来的那些蚂蚁势单力薄，暂时吃了亏，它们会纷纷返回去调兵遣将。不一会大队蚁群便出远方浩浩荡荡地涌来，双方兵对兵将对将地厮杀起来。场面相当壮观，前面的蚂蚁倒下，后面的又冲上去。打仗的扭打在一起，另一些就忙于肢解猎物，纷纷地往自家的巢穴中搬运。整个场面上千只的蚂蚁缠绕一起，相当壮观。蚂蚁的组织能力相当强，似乎有统领在统一布阵指挥，所有战死的蚂蚁尸体都会被工蚁及时地运走，等猎物被双方争夺完后，战争也就结束了。两方边守边撤，不一会这片战场便恢复了平静，一切都似乎没有发生过一样。

三

打开吱吱呀呀的烂了不少的门板的后门就是一个不大的菜园子，爷爷

是种菜的高手，菜地虽不大却种植着不少的蔬菜。菜园子外边就是洗马河，下了台阶就可以亲近清澈的河水。记事的那时，河水清澈能够见底，鱼虾自由自在地在遨游，丢一些食物就能引来一大群鱼，最多的是穿梭似箭的“浪里白条”柳叶鱼，还有鲫鱼，偶尔也能见到金色的鲤鱼，那都是西湖里越狱逃跑出来的。右侧不远处就是“洗马桥”，从西湖里流出来的湖水，带着荷花的芬芳，穿过洗马桥那石拱桥洞，湍急地向北流去，带着小河两岸住家的欢笑。

我十岁的那年起后河水变得缓慢，变得浑浊，长时间不下雨还会发黑发臭。洗马桥下那长长的船埠头再也见不到洗衣女嬉闹的身影，听不到噼噼啪啪棒槌拍打衣物的乡音。

河面上与许许多多的能够用细细的脚站立在水面的昆虫，以极快的速度，滑来滑去。让人十分好奇，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它的名字叫“水黾”（shuimeng）。但是邻居大人们告诉我它是“淹死鬼”的娘舅，专门来物色小孩子的，一不当心就会将孩子拖进水中，给淹死鬼当点心，吓得我们都不敢到河边玩耍，特别打怵。

我不太相信这些，总想捉住几只研究研究，看看它是如何能够在水面上行走的，幻想着自己也能够在水面上漂行。经常用细竹竿拴上长长的线，挂一只蜻蜓什么的，想钓着水黾。可是，它们围了过来，就是不咬。气得对着水黾喊“别狂，有本事把你的外甥喊来让我瞧瞧”。

洗马河常年流淌着的河水，到了春季西湖放水排涝，那河水又会是清澈的，流动得相当湍急。河里的鱼虾真的不少，用鱼叉就可以叉到不小的鲫鱼，鲤鱼什么的。

杭州的夏天是相当炎热的，马路上的柏油都被烈日烤化了，冒着一个个的黑泡泡。车轮碾过，总有一种撕裂轮胎的声音，给人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那些拉板车的人们，浑身的汗水如同喷射一般，洒到地上，呲的一声就没啦。他们发出沉闷而浑厚的喘息声，那样有节奏地渐渐近了，又渐渐远去。倒是那些贩卖冰棍的小贩一面用木片块一个劲地敲击着背在身上

的木头箱，扯着嗓子“西泠棒冰已到，买棒冰啰。”给炎热带来一丝凉意。那树梢上的知了，如同着了魔似的，齐声高唱，嘈杂声不绝于耳，给人带来昏沉沉的困意。

走出大门不远处是一个三岔路口，冲着洗马桥有一个警察岗亭，那些警察叔叔我们都认识，而且还是好朋友，经常来家里坐坐。当时还没有红绿灯，警察靠手中的一支红白相间的指挥棒指挥着南来北往的车辆。当时我很纳闷，警察叔叔怎么知道汽车要直行还是拐弯，指挥棒一指，车辆就乖乖地听他的。后来路口安装了红绿灯，警察叔叔让我到岗亭里看他操作红绿灯扳手，我才发现每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后面有一个箭头形状的灯光器，直着就是直行，横着箭头朝向就是行车的方向。

警察叔叔经常要我们去帮助他们维持交通次序，那时候杭州骑自行车到了晚上必须要在车头挂上一盏灯，由于用电池的那种费钱，大多数车都会挂一盏小煤油灯。警察叔叔把我们十多位小伙伴组织起来，守候在街头巷尾，发现没点灯的或者骑车带人的都要拦截下来，让警察进行教育，那时候我尽参加那些让人生厌的事。

这一带居民家里没有自来水，马路对面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挺粗的水管支起横在上面间隔一米多的两个水龙头，正好同时为两只铅皮水桶放水，满了用扁担一勾挑起了就走。居民用水都是靠这个公共供水点，一分钱一桶，送到家里两分钱一桶。由一位身强力壮的大嫂管理着，大家都管她叫“赵嫂”，近似方形的脸庞上长着一对深深的大酒窝，笑起来总给人留下一股可信任的感觉。每天或者隔天为附近住户送水，我们家的水两天送一次，她有大门的钥匙，不管家里有没有人都会按时送到。她挑起两桶水穿过马路，轻悠悠，步伐有节奏，一晃一晃地煞是好看，丰满的乳房在宽大的衣服内颤抖着，简直就是在表演一样，充满生命的活力。她在水桶上系上一块木头牌牌漂浮在水面，这样可以不让水起浪洒出来，真是聪明极了。往院子东头的小厨房旁的大水缸里一倒，我总觉得大嫂的力气特别大，一只手就能将一桶水举得高高的，那么轻盈。大嫂少言寡语，似乎只知道干活，

从来不管他家的闲事。在她家的木门上贴着一张自来水价格表，后面特意写着“现金支付，恕不赊账”。

后门左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宽敞的河埠头，一条叠着一条的青石板台阶一直延伸到洗马河里，是邻居们在这里洗菜淘米和洗衣服的好地方，每天都可以听到女人们嘻嘻哈哈的声音，孩子们打闹嬉戏哭笑喊叫。最令人难忘的就是那噼噼啪啪的木质捶衣棒敲打衣服的声音，那么清脆那么有节奏，不宽的河对面就是屠宰场高高的砖墙，声音传到对面被墙反弹回来，产生回响，格外好听。有时候十几个棒槌一起敲打，带着那么强烈的音乐感和错落感，让人听着是那么舒坦，令人终身难忘。靠近河埠头的河底是一片沙石地，水不深能够见底，是一些跟着母亲来洗衣物的小孩子们游泳和玩水的好地方。到了黄昏时分这里成为一带住户的大老爷们洗澡冲凉的地方。他们一边洗澡一边高声讲述一天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新鲜事。若在无人之地，说那些有关“性”的脏话，用方言高声地谩骂着，肆无忌惮地。还做出一些下作的躯体动作，臊得那些大姑娘小媳妇都不敢抬头，干脆不洗了，拎着篮子回家。

四

老屋后的河对面有个硕大的屠宰场，将牛羊猪在这里加工后供应整个杭州城。天天能够听到牛叫羊咩猪嚎的声音，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牛和羊是那么的有灵性，被车拉进屠宰场的院子后都会流泪，拼命地挣扎，在童年的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阴影。屠宰场围墙外一排高大的垂柳，那是我用长长的竹竿粘知了的地方。粘知了有两种办法，在一根细竹竿的头上先缠上一些麻绳，把和好的一块面团放在水里用手一边捏一边漂洗，洗净浮面，留下的就是“面筋”，可粘啦。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拿着竹竿在早晨去缠蜘蛛网，缠的成一个蛛网球就可以粘知了啦。大人们不让浪费粮食，我们都采取蜘蛛网来粘，小竹竿绑在长竹竿上，不够长

时要接两支竹竿。高高的柳树上知了很多，凭知了的叫声发现它，然后将竹竿悄悄地续上去，碰到知了的蝉翼就粘住了。有时候一下午能够粘二十多只，拿回家用油炸熟了吃，知了背上的两大块肌肉可好香啦。清晨一早去柳树林捉刚刚褪壳的“嫩知了”也是一件有趣之事。父亲告诉我“蝉”在变成虫之前，从卵孵化成蛹和幼虫都在地下生活，需要整整七年的时间，一旦成熟就会在凌晨成群地爬上树干，再褪去最后一次外壳就成为会飞能鸣的知了啦，学名叫“蝉”。褪下的壳叫“蝉蜕”也有人称它为“神仙衣”，是一味良好的中药，清凉解毒，退烧，我们收集起来卖给药店，能够换一些零花钱。知了只能活七天左右，交配后雌蝉又回到地上，用尖尖的产卵器将卵产在地洞里，然后就死去，它的一生就是如此这般地轮回着，简简单单地演绎着生命的进行曲。每年夏天这里成为我的游玩范围，在这里玩耍得淋漓之至。离埠头约百十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排污管，从屠宰场阴沟里淌出的血水与杂物，直接排放到洗马河中，成为这一带居民最反感与头疼的事。那污水引来许许多多的乌鸦与八哥，整天围着屠宰场转悠，别说，这倒是我老家旁的一道风景线。

1952年夏天，为了抗击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杭城人人行动，拍苍蝇，灭蚊子，打老鼠。居委会要求大家将消灭的苍蝇，老鼠集中起来上交居民区统一处理。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一张小马扎上，拿着苍蝇拍在屠宰场院子里，守着一堆猪下水，苍蝇一落下，一拍一个准，然后用小木棍夹进空汽水瓶里，不一会就一瓶，每天十几瓶的死苍蝇送到居委会，可将多么大妈大爷们乐坏了，那年还评我为“灭蝇小标兵”。

抗美援朝时期，杭州几乎是全民动员，为国家捐献“飞机大炮”，为志愿军捐献棉衣棉被，那个场面真是令人激奋。记得，当我拿着装着压岁钱的小陶罐在居委会的伯伯阿姨们面前砸开，将不多的钱捐献出来时，他们为我鼓掌，还把我抱起来，举得高高地。

小时候由于我的头长得特别大，有些不符合人体比例标准，这一带的人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大头”，大家这么叫着，我也答应着。在儿时，夏

日的黄昏后的故事总与萤火虫有关。小伙伴们在我家的后院嬉闹着追逐着忽忽悠悠，或上或下舞蹈的萤火虫，抓到后小心翼翼地装进小玻璃瓶中。等到家里大人吆喝回家睡觉时，才恋恋不舍地洗漱上床，将装着无数萤火虫的小瓶子偷偷的塞进被窝里。于是乎，那隆起的，被萤火虫照亮的被窝中成为我的另一个世界。多少幻想，多少憧憬，多少甜蜜的幼稚，多少童年的遐想，随着那闪烁的荧光把自己带进无法再追寻的梦乡。似乎童年时代的一切都在这属于自我的被窝中演变着，蜕变着，羽化着。

后来啊，钻出童年被窝的我，随着岁月的消失，几乎再也没有见到萤火虫，或者说生命的逐渐老成也没有再关注那小精灵。偶尔谈起萤火虫时，人们都说现在农药打多了，萤火虫几乎绝种了。几年前去云南元阳梯田拍摄时，遇到成群的萤火虫，在树林中翩翩起舞，一下子便激起我童年的温馨，那刻我的确如同孩子一样在林中追逐，奔跑。

夏天的黄昏，最令我高兴的就是爸爸妈妈吃完饭后，带着我们到郊外去散步。出门走不久便到了京杭大运河旁，沿着大运河旁青石板铺就的河岸一路走去。河水泛着一整天被骄阳晒得滚烫的热气，那股略带腥味和河水独特的水汽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那种醉香至今还能够回想起来。运河河道上不时有撑着巨大的桅帆的木船匆匆驶过，纤夫背着沉重的纤绳，沉闷地哼着单一的有节奏的号子，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身边走过，浑身上下的被汗水湿透，他们光着脊梁，汗珠从黝黑的肌肉里渗出，吧嗒吧嗒地砸在青石板上，在我年少的心灵中如同一尊尊雕像矗立在最柔软的地方。晚霞的猩红染透了田野，将船帆也涂抹成金黄色飘然而去。

长满青苔的河堤石块和乌黑的木桩上附着密密麻麻的螺蛳，忍不住俯身去拾取，一个浪花扑来溅了我一身一脸，暖暖的，流进嘴里有一丝丝甜。一片片的稻田绿油油的，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突然稻田里传来一声犀利的尖叫，哥哥说这是蛇在吃青蛙，吓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哥哥一直在后面叫着：小心，不要踩到“地雷”（大便堆）。

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徜徉在一片温馨之中，他们见到什么都会讲一段

故事，关于大运河，关于漕运，关于那些石拱桥，那些南来北往的帆船，总让我津津有味地听着，联想着。

夏天，妈妈将一块竹榻安放在两条长板凳上支在院子里，用凉水擦得冰凉冰凉的，那竹床用久了，呈现出油红的色泽，一躺上去吱吱嘎嘎地直发响。在院子里点上一盘粗粗的蚊香，是在长条的纸筒中灌锯末和一些什么药物，一盘能够点一晚上，青烟袅袅。我特别喜欢爷爷用采集来的艾草，晒干后编成绳，点燃来驱赶蚊子，那股清香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妈妈给我洗完澡后，浑身扑满痱子粉，像一个白霜冬瓜一样，往竹榻上一躺，拔凉拔凉的，一天的暑气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妈妈洗完澡后会坐在我身边，拿着一柄硕大的芭蕉扇，啪啪地为我们驱赶着蚊子，讲着故事，我躺在竹床上，仰望那满天星斗，听妈妈缓慢地讲述着那么多的新鲜事，月亮里的嫦娥，那精灵的小白兔，如何寻觅北斗七星的位置，宇宙中永远漂浮着数不尽的星星，什么是恒星，什么是银河系，还有那牛郎织女的神奇传说，等等，我在母亲温柔的语调中渐渐地睡去，怎么被移到屋内床上的一点都不知道。

屋内经常飘着一股浓浓的“DDT”的煤油味，隔几天母亲总会撩开床褥子和席子，喷洒一下“DDT”“吡吡”的喷壶声音在回响。那个时候有臭虫，咬起来一片片的丘疹，相当痒。每天清晨母亲都会过来检查帐子，那臭虫一旦吃饱了就和会猫在蚊帐顶上四个角的地方，母亲用旧报纸将臭虫捏住，使劲地将其捏死，嘴里还不停地诅咒着。现在回想起来那“DDT”的味道，的的确确有一种家的味道。

童年印象

——在温州乡下的那些日子里

诸向东

外垟乡后支村是瓯江边一个僻静的小村庄。一面临江，三面靠山。这里虽说离温州市区只有十几公里路，但那时隔着大山，没有现在这样一条公路，可以从市区直通到村里。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去温州，一定要走水路，坐帆船。船老大一边摇着橹，一边发出“喔——呜——”的长啸。父亲说，这是在把风叫来，可以让船跑得快些。果然，随着船老大的叫声，还真的吹来阵阵凉风，我对此便深信不疑了。

父母亲为了我们两个儿子，放弃了生活二三十年的大上海，甚至损失自己多年的积蓄也在所不惜，足可想象他们平时对我们的百般溺爱了。父亲更是自己走到哪，把我也带到那。

刚解放的农村，正忙着斗地主分田地。记得离我家一段路，有一幢青砖墙围起来的楼房，里面住的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百计”。他家拥有一百多亩良田，雇着十多个长工和短工。后来我才听说，“百计”其名张江，系黄埔军校二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军参谋长。因在福建江西一带围剿红军时打了败仗险被蒋介石枪毙，后经陈诚力保，总算捡了条命回到外垟。临解放的时候，他逃到外地躲了一阵子，后来他的小老婆同土改工作队队长好上了，无意中泄漏了其人在上海的消息，于是被抓了回来。

开斗争大会的那天，藤桥乡公所前的广场上挤得人山人海。父亲也带我去看。我骑在父亲肩膀上，看见一个肥头大耳的人正低着头，手被反绑着，背上还插了一块木牌。两边站着一些手里拿着长枪短枪的人。有人在用铁皮卷起的话筒高声讲话。下面的人群在台上一個人的领呼下，不时地振臂高呼口号。大会结束后，“百计”被拉到广场不远的溪滩边枪决。只听见一阵震耳的枪响，我吓得哭了起来，听到周围不少人都冷漠地在说：“死了，死了。”大家才开始移动脚步渐渐散去。

“百计”的后代在乡里已无人。听说还有一个儿子现在台湾台北大学任校长。2003年春节前，镇里又收到了一笔钱，说是台湾一位姓张的汇来的，用于接济贫困户。根宝报了几户，多者四、五百元，少者两、三百元。大家都推测是“百计”的儿子寄来的。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的最多的是一个大寺庙，里面香火缭绕，幽暗的大殿里供着许多菩萨，佛像前面垂挂着绣花的幕帏上积满了香灰。父亲曾告诉过我，说土改时一个工作队队长本想“破除迷信”指挥众人推倒庙里的菩萨，旁人劝他：“这菩萨很显灵的，还是不要拆吧！”他不听，非要拆不可。不料当他刚一举起驳壳枪准备指挥众人拆时，他的手却擎在那里久久动弹不得了，吓得他回过神来赶紧溜走。

现在看过《诸氏房谱》我才知道，这座庙就是当地著名的储庆寺。它是明朝成化年间诸氏第九世先祖思禄公在其长子怡庵任洪州刺史归田后，捐田108亩以粥僧家供养佛火，并对原有的金峰庵进行重建，才更名为储庆寺的。“房谱”中有《储庆寺记》专记此事，详述该寺的由来和地理环境。

小时候我胆子很小，特别怕天上打雷，又非常任性，不仅常常顶撞母亲，还顶撞年迈的奶奶。母亲就讲雷公的故事来教训我。她说，天上有个雷公菩萨，是专门轰打地上不孝敬大人的孩子的。仁地一个姓李的孩子平时不敬重父母。一天上山放牛，下起了大雨，他就躲到一棵树下去避雨。结果一个响雷炸下来把他和树都烧成黑碳了。我说：“你骗我，你骗我。”母亲说，有名有姓的，你可以去查，怎么会骗你？母亲讲话最诚实了，这

我知道。但孝敬父母和打雷究竟是什么关系，我那时搞不懂。每当天上下起大雨、闪起电时，我就紧紧捂住耳朵，钻到堂前那张八仙桌下去，以为这样就可避免雷击了。

妈妈除了讲雷公的故事，也讲其他故事给我听。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印象中的有“岳母刺字”和“木鱼的由来”等故事。“岳母刺字”是流传很广的故事了，“木鱼的由来”却是未见有书记载。故事讲的是一个秀才因道破了变戏法的奥秘，致使父女俩双双身亡，由此积怨，直到各自来世变为树木和藤条，做成木鱼和槌子，依旧整日相撞不已。两则故事使我从小懂得要精忠报国，做人要留口德，冤家易结不易解的道理。

小时候，我常常爱打破沙锅问到底。记得有年秋天割稻的时候，我跟父母一起下田。太阳快下山了，大人们都在忙于割稻打稻、捆稻草，我就跑来跑去捡剩在地里的稻穗。忽然，我见到地头一棵枯萎的藤上还结着一个小黄金瓜，就把它摘了下来，用小手将上面的泥巴搓干净。在一旁帮我割稻的几个青年便唬我说：“三豹，这个瓜有毒，不能吃！”

我不相信，就跑到田的另一头，问正在打稻的巽岙文聪姐夫：“姐夫，这个瓜好吃吗？”他一边埋头打稻，一边回答我好吃的。文聪虽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他待我这个小内弟很好，我也信任他。得到文聪的答复后，我高兴地往回走。但走了一半，我还不放心，再跑回去问：“姐夫，姐夫，这个瓜倒底好吃不好吃？”这回姐夫停下手中正在打的稻子，认真地告诉我：“三豹，真的是好吃的。”我这才放心地离去。

后来，文聪姐夫又把这事讲给当时正好挑谷子回去的我母亲听，母亲以后多次作为家庭笑料谈起。直到她病逝前的四、五天，我在医院里护理她时，她还拉着我的一只手，笑着回忆道：“三豹，那时你才这样一点高，”妈妈用手在病床稍高一点的地方比划着，“文聪说，你拿着一个金瓜，扔掉嘛舍不得，吃下去嘛又不放心，真有意思。”是呵，世上只有妈妈才会把孩子这样一点小事，都放在自己的心上。

一九五二年正月十五我妹妹出世，同年四、五月奶奶去世。家里人员

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家境困难的状况。

那时，这个穷乡僻壤每户人家普遍都很穷。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农民打下的稻谷都要按定额交给国家。交足之后，再留下来年的谷种，而后才是每户人家的口粮。那时每亩产量很低，留下的口粮就很有有限了。于是，蕃茹（地瓜）干便成了家家户户的主粮。

许多人家为了少交公粮，多留口粮，就想方设法把打下的谷子东藏西埋起来。我也亲眼看着母亲开始时怎样神色紧张地把一口袋米藏在衣柜里，上面再放上一些衣服之类。应当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母亲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件“不光彩的事”。不久，见村公所带着民兵搜查出附近人家暗藏的粮食，不仅全部充公有的人还被拉到村公所关押了几天。于是母亲再也不敢藏粮食了。

农村的贫困生活，使我们更加向往跟随父母进温州城里去。每当农闲时节，父母亲总要带着我们搭船去温州，或是到阿亮家催债，或是到姐姐学校去看望，或是到西公界十一号舅公家去作客。晚上我们就挤住在仓桥自己家的楼上。

那时，温州城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黄包车。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坐黄包车去阿亮家，在上一座桥的时候，突然车头上翘，把父亲和我一起从车里翻了出来。父亲第一个反应是赶紧把我抱起来，问我摔痛没有。见我没事，他才拍打自己身上的灰土。我看到父亲西装左袖肘关节的地方已经擦破了，这时车夫早已面如土色，一个劲地陪不是。

父亲看了一眼穿着补钉叠补钉、个子又瘦弱的车夫在寒风中抖瑟的样子，就摆摆手，说声：“算了。”接着便帮车夫把车扶好，然后把我抱上车，自己就跟扶在黄包车后面，直至车过了桥，才上车。到了目的地，父亲一分不少按原价付钱。这位车夫连声说：“您这位先生真好！您这位先生真好！”父亲则提醒他说：“以后遇到上桥拉不动，应当讲一声，让大人下来帮着推。否则把小孩摔坏了怎么办？”父亲宽厚待人的品格，在我年幼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次到温州，我们最爱到舅公家去了。特别是母亲，从小就跟着大她

十岁的舅婆拣茶叶。两个人感情很深。每次妈妈到温州都要去看望舅公、舅婆，总是要带上乡下的米粉干、鸡蛋等土产送去。两人在一起可以不停地聊天，有时谈到天都快亮了，才知道睡会儿。

舅公是位和善的、很少言语的、长着红鼻子的老人，一辈子当厨师，靠着锅碗瓢盘养活了八个孩子。母亲很羡慕他们的婚姻，总是在说：“我舅舅和阿姨两个，从结婚到孩子一个个长大成人，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我舅舅总是处处让着阿娘，多好的男人啊！”

我们到温州城里，舅公总要烧很多菜来款待我们。弟弟阿云那时才五、六岁，见到满桌子的菜肴，总是高兴地拍着小手嚷着：“哦，过年啰！摆酒啰！”

乡下的生活条件就要清苦多了。长年吃的是蕃茄干，也没什么荤菜。一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就躺在地上打滚，哭闹着：“我要吃米饭，不要吃蕃茄干！”父亲心酸了，他噙着泪水对母亲说：“老子为来为去，为了几个孩子。现在他们竟然连饭都吃不上，我还配得上为人之父吗？”他左思右想，决心还是到大城市去，重操开车旧业。

一九五三年春，父亲收拾简单的行装，再次远离故乡。

“您一定要早一点回来啊！”父亲连连应道：“好，一定，一定！”我们沿着通向江边路亭的乡村小道走去，阵阵和煦的春风吹过，送来了两边油菜花的缕缕清香。平时我常在这条长长的路上放风筝，这天却感到这条路特别短。

父亲上船前把我们一个个抱起来，亲了又亲，就提起行李上了开往温州的船，然后再从温州搭长途汽车去杭州。父亲把行李放进船舱以后，就站在船尾的甲板上，不停地向我们挥手，让我们回去。我们都不肯离去，不断地挥动着小手，对着顺风，高声喊着：“大大，早一点回来！大大，早一点回来！”船越来越远，父亲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我把喉咙都喊哑了，前面的泪水被风吹干，后面的泪水又涌了出来，直到载着父亲的船消失在地平线，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路亭。

父亲到了杭州后，写回的第一封信中这样说道：爱弟，看到三豹和阿

能两个送我时，不停地喊叫，我心里真比刀割还难受啊！我当时真恨不得跳进江里，游回到你们身边。

父亲离家后，家庭生活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了妈妈一人身上。她每天起早贪黑忙了家中忙田里，很少有空闲的时候。那时的母亲非常消瘦，脾气也十分暴躁。凡是她在家的时间，总可以听到她大声地呵责根宝。有时见我们不听话，搞得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她更是大发雷霆。

我的脾气很犟，从小就不想受人约束。母亲批评我，我就当面顶嘴，搞得母亲劳累一天还要生气。而今，当我自己为人父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天下做父母的不易！尤其是当经济困难家庭的父母更是不易！

当时年仅十六七岁的根宝长得很矮小，也成了田里的主要劳力。而秀琴姐姐则在城里读书。先是读初中，以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温州卫生学校。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正是最爱穿着打扮的时候，但家庭的困难使她没有什么好衣服穿，一杯盐水炒的黄豆，加上从学校食堂买两分钱青菜，常常是她整个月的下饭菜了。

闲苦的生活在母亲的独自承担和庇护下，数我最无忧无虑了。每顿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先盛满满一碗白米饭给我，然后再把放在锅子里一起煮的大部分蕃茄干和一点米饭拌匀，分给大家吃。后来弟弟妹妹有意见，她就在我的碗里先盛大半碗白米饭，再象征性地盖上薄薄的一层蕃茄干饭，但弟妹们还是发觉了这个“秘密”，妈妈只好笑着说：“哦，真的哩，三豹这碗饭怎么特别多，一定是灶头间太暗，我盛错了。”

父亲按时向家里汇些钱来，母亲就一路背着我，到横山镇的邮局里去领取。从后支村到横山镇约六、七里路，中途要路过一个小教堂和横山小学。后来我上一年级了，妈妈仍要背着我去。每次到了镇口，我便坚持下地自己走。

我们去横山取钱，总要买回一些米、肉和腌鱼鲞之类，家里生活就有了很多改观。邻居有时到我家串门，见我们还在吃饭，总露出羡慕的眼光：“哦，你家今天白鲞下饭啊！”母亲表面应付几句，可来人一走，她便摇着头，

笑着说：“这些乡下人，真是没见过世面！”相比之下，母亲在大上海呆过二十多年，真可算得上是见过世面的人了。

我从小非常贪玩，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家后边的那块屋基地了。

屋基地约有二亩三分，家里其他地都入了社，这块地就留下作为我家的自留地。地的四周有一道半人高的石垒围墙，对着我家后门的地方是一道竹篱笆门。走进篱笆门，有一条一米半宽的小路，把整块屋基地分成对称的两半。小路每隔一段距离，还可见到大部分埋在土里、隐约露出一一点在地表的灰白色大理石柱基。

园子里一年四季总是绿油油的，种着白菜、春豆、蕃茄、茄子等蔬菜，还种一些油菜络麻甘蔗之类。春天一到，成群的燕子飞来，时而紧贴地面，时而直插云天。园子里盛开着金黄色的油菜花，粉红色的桃花，白色的李子花，沿着墙根一带，长着火红的蛇杨梅，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紫色的白色的小黄色的小野花，把整个园子装点得煞是好看。

夏天，园子里蝉鸣声此起彼伏。络麻长得很高，象一片青纱帐，我和小伙伴们总爱钻到络麻地里乘凉，或者观看蚂蚁搬运食物，或者两个人一对拉辟辟草。有时被蝉叫得烦恼了，就手持一根长竹杆，竹杆头上缚着一条竹篾围成的圆圈，缠上蜘蛛网，用它去捕捉“知了”。我们还抓一些小瓢虫、萤火虫放在火柴盒里。到了夜晚天色全暗下来以后，再把关着萤火虫的盒子打开，抬头望着一小点一小点悠悠的淡黄色亮光，散在宁静的夜空，然后渐渐远去消失在浩瀚的幽蓝色中。

秋天的屋基园，又是另一番风景。蟋蟀在弹琴，油蛉子在歌唱。等我们这批“小猎手”一到，就悄然无声了。我们耐心地守候着。一遍遍听准了，最后翻开碎石瓦砾，把它们一只只逮住。

在屋基园正中央种着一棵大李子树，每到秋季李子熟了的时候，树上挂满了一颗颗又红又大的李子。忙完田里的收割之后，妈妈就领我们来到大李子树下，让我们兄妹三个拉着一床被单，妈妈则摇动着树杆，或用长竹杆敲打着高处的树梢，那些熟透了的果子便啪啦啦落在被单里。我们敞

开肚子吃了个够，妈妈还一篮子一篮子拿去分给邻居们尝。

温州的冬天，几乎不下雪。成群的麻雀在田里觅不到食物，飞到了住家附近，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一会儿落到地上，一会儿又窜上屋檐。根宝就教我们怎样捕捉。他用五块砖头搭一个“盒子”，里面放一些谷子，顶上的一块砖斜开着口，用一根筷子支撑着。筷子中间系一根绳子，我们拉着绳子另一头，躲在围墙后。不一会，那些贪馋的麻雀便飞了下来，胆小的在砖盒附近啄食地上另星的谷子，胆大的一下子钻进了盒内。根宝在的时候，往往可以捉到几只。我们独自捕的时候，不是拉线的时机掌握不好，就是弄出了这点那点响声，结果这些机灵的家伙受惊后，便逃之夭夭了。

屋基地里玩腻了，我和弟弟就到河埠头玩。这里同样有着无穷的乐趣。这是一条通向瓯江的小河汊，离瓯江的入海口很近，随着潮汐的涨落，这条小河的水也时满时浅。当水退得差不多的时候，大部分河滩从水中渐渐显露了出来，河滩上无数的小螃蟹便钻出小洞外。我们就一只只地把它们抓进铜脸盘里。小螃蟹抓够了，又抓跳跳鱼，整整半天我们在河滩上摸爬滚打，搞得浑身上下象个泥人。有时玩到天都暗下来了，我们还不想着回家。每当这时，就远远响起母亲那焦急的声音：“三豹、阿熊，你俩在哪里？”母亲气急乎乎找到我们，一把将铜脸盘中的鱼蟹倒了个精光，伸出两手一边摸着一个，就往家里拖。

到了家里，照例一人教训一顿。教训完了，还要替我们洗脸擦身。我们玩累了，可以呼呼大睡，而母亲则不顾自己在田里劳作一天的疲惫，附身油灯下为我们洗衣服。母亲常常怨心地说：“我不知道自己前世作了什么孽啊，生下这么两个讨债鬼！”是啊，妈妈怎么会不生气呢？

河埠头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次秋天涨水之后的捕鱼情景。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小河的水面几乎同河埠头的石板桥相平了。成群的鱼儿从上游随着湍急的水流汹涌而来，到了石板桥这里，由于桥下石墩的阻隔，河道变窄了，鱼儿竟腾空飞出水面，越过二米来宽的桥面，钻入水去。这些鱼每条都比我的人还长，足有80公分以上。此起彼伏，穿越不息。岸

边的人们一时竟看傻了眼。“快回家，拿渔网兜去！”不知谁这么喊了一声，几个在场的青壮年一下子反应了过来，便飞快地跑回家去。一会儿，他们一个个扛着渔网兜陆续赶到。十几个人背对着背，在桥面上站成前后两排，手中的网一张并着一张插进水里。奇怪的是，这些大鱼象通人性一样，居然从桥的这边跃起一人多高，越过两道人墙再从桥那边翻落水中而去。有的大鱼则灵活地从人墙的缝隙中间穿梭而过；或从人们的胯下，或从人的肩头，准确无误地穿了过去。在人们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前面的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们发出了阵阵惊叹声。

我身边的一位老人，捋着胡子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鲤鱼跳龙门哩，跳过这座桥，这些鱼就变成龙啦！”我正听老人说着话，忽然大家发出一片欢呼声，抬头望去，看见有一条大鱼终于落网了，张网的那人正好是我家的隔壁邻居亦会伯伯。落网的大鱼在拼命挣扎，旁边的一位见状，赶紧用自己的网兜扣在亦会的网兜上。

这时天色已暗了下来，大家簇拥着亦会，提着胜利品兴高采烈地回村。这条鱼一称竟有三十多斤重！当晚亦会家把这条大鱼和咸菜一起烧熟了，分给了周围每户邻居，我家也分到了一大碗。我想起了鲤鱼跳龙门的故事，为碗中的这条鱼深感惋惜，动了两筷子，就再也不去吃它了。

父亲离家后，我最爱我姐姐了。姐姐大我十二岁，独立苦难的生活，磨炼了她自强、自尊、不甘落后、奋斗不息的品格。她虽是一个女儿家，但在大事上很有自己的主见。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姐姐当时为自己选择了继续求学的道路以及后来苦苦劝说母亲迁居杭州的正确主张，我们家、包括每个人的历史，恐怕都要重新写过了。

当全家从上海回到温州时，母亲要她停学在家，帮着带两个弟弟，姐姐含泪对母亲说：“妈妈，你是要现在惬意，还是要将来惬意呢？”母亲问她“这句话怎么说？”姐姐说：“如是要眼前好，我就不去读书了；如想将来好，还是苦几年，等我书读出参加工作，有了工资就可以接济家里了。”母亲沉思良久，只得表示同意。后来家庭的变故足以证明，幸亏姐

姐当时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姐姐在城里读书，每当学校放寒暑假，她回到乡下来，总是要带上一些糖果分给我们。她还帮着母亲做些农活和家务。

姐姐每次从城里回来，都要教我识字、念数。一般姐姐只需教我一遍，我就能记住。姐姐很满意，总在母亲前面称赞我一番。母亲自己不识字，当然希望我们多读些书，所以逢人便夸奖我“聪明，有书心，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这些都促使我更用功地学习。

我六岁那年，姐姐给我买来描红簿、毛笔和砚台、墨，从此我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孜孜不倦地练习毛笔字，从练字中找到了新的乐趣。我对画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画得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船，我遐想着，什么时候能坐上大轮船开到杭州，去见“大大”；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看看外国是怎么样的，该有多好啊！

画画使我加强了观察。白天，我牵着自己家的水牛去溪滩上放牧，我让牛自个儿吃草，自己则坐在沙地上，久久地凝视着不远处驶过的一艘艘大小帆船，并一遍遍用一根细竹枝在沙地上描画着。这为我此后的学画打下了基础。

一九五五年秋天，我到了上小学年龄了。横山小学的黄老师，来到村里家访，妈妈很高兴地把黄老师迎进屋内，用系在身上的用裙抹了抹堂前的桌子和椅子恭恭敬敬地给黄老师泡上了一杯茶。等黄老师坐定后，母亲把我拉到黄老师跟前，又拿出我平时练习的字，给黄老师看。黄老师满意地点点头，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流利地一一作了回答。最后黄老师让数数，我一口气从一数到一百，黄老师连连说：“好，好，九月一日开学，你就来读书吧！”

黄老师打算起身走了，母亲又请黄老师再稍坐一会，母亲说：“黄老师，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我还有一个儿子同三豹只差一岁，求你帮帮忙，将这个小的也一起收去算了。两个专门到河埠头去玩，掉进河里怎么办？现在一个去读书了，留下一个在家更叫人不放心。正说着，弟弟从外面蹦

蹦蹦跳跳地进来了，黄老师一看两个孩子个儿一般大小，乐了，简单问了几个问题，便一口应诺“好，好，都收下了。”就这样，我和弟弟同年上了学。黄老师成了我们俩的第一位班主任。

从我家到横山小学，要走约四五里路，我从不肯迟到。那时村里没有电灯，每天晚上，我和弟弟就围着摇曳的小油灯做家庭作业。小油灯是陶瓷做的，约有二十公分高，顶部似一只盘子，里面盛着菜油，一根雪白的灯芯草浸在油中，挑出一头搁在盘边沿上，用火柴点着，就亮起了一个蚕豆般大小的光点来。每烧半个钟头光景，坐在一边缝补衣服的母亲就要用针头把灯芯草往上挑一挑，免得火给菜油淹灭了。在乡下读书的每个晚上，我们就是在这样幽暗的光线下度过的。

我还特别喜欢把铅笔削得很尖很尖，再在一张废纸上打磨，然后在作业本上把字写得很小很小，但笔划清清楚楚。每次作业批改下来，老师都给我批上优等。由于上课专心听，听了就牢牢记住。所以整个一年级的课程，我学得很轻松。一学年结束，我以各课成绩全部100分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奖给我一支毛笔、一顶墨和一本印有小红格子的小楷练习簿。那时，这点奖品对我这个穷小学生来说，已是弥足珍贵了。

学校还要我作为优秀学生的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言。对此，母亲生前曾多次讲起过：“我坐在乡下去温州的船上，几个同船的旅客正在谈论，一个说，前几天横山小学操场上开大会，有个孩子上台发言，人还没讲台高，话讲得真好。不知是哪一家的孩子？另一个说，听说是外垵升间家的大儿子哩！”我坐在一边听了，心里真比吃了蜜还甜哩！每当母亲讲到这里，脸上总是流露出自豪和幸福的光彩，好象人们在赞扬她自己一样。是啊，作为父母辛辛苦苦为了什么呢？子女有出息，不是给他们最大的慰藉吗？

我想，我的童年如果说还有什么欢乐曾经带给过母亲的话，可能也仅此而已了。这使我至今都深感内疚。

责任编辑：戴爱华

弘一大师的“第二常住”地庆福寺就在这里

黄培量

今年是弘一大师驻锡温州一百周年，他在温驻锡十二年，称温州为“第二故乡”、庆福寺为“第二常住”。温州是他佛学代表作的构思和完成之地，也是其佛学思想体系形成之地，庆福寺是温州与弘一大师联系最为密切的一处史迹。可惜如今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唯大师与温州的情缘历久弥新。提起庆福寺，大多文字资料表示位于“城东”“积谷山下”。至于具体所在几无提及。本文试着综合丘形图等各种资料来定位庆福寺具体位置。

庆福寺，俗名城下寮，寮在温州话中用于称呼规模较小的佛教寺庙，意为僧人居住的房子，且建筑较简单的。温州古时还有施水寮、白塔寮等。

庆福寺坐落于大南门东城下，处于城区边缘，背靠城墙，山门前即为护城河，与古城相连但又有城墙和护城河分隔，闹中取静。该寺创建于清嘉道年间，建造年代并不久远。从1877年英国派驻温州的首任领事阿尔巴斯特（Chaloner Albaster）拍摄的积谷山南面照片看，庆福寺位于照片最靠右位置，当时积谷山上城墙历历在目，城墙外积谷山南侧留有大片田地，尚未开建后来的运动场。在护城河对岸与花柳塘之间，建有稀疏的几座传统宅院，杨雨农家族迁居花柳塘时，建有一座坐北朝南的七间中式平房，前有二轩间，后有二厨房。此处老宅的西边有个四五百平方米的小花园，后来的巽园、馀绮楼也尚未兴建，周边是一派浓郁的田园风光。



1877 年照片中的庆福寺

进入民国后，温州城区面貌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在花柳塘的田园上，杨雨农当家时，将紧挨老宅东首的五余亩空地买下，于1920年建造了一幢欧式楼房和一个大花园。欧式楼房起名“馥绮楼”，花园起名巽园，又名绮园。

1930年10月，因温州城墙倾废，积谷山这段城墙逐渐被拆除，温州第一座公园中山公园建成，积谷山南侧空地也落成了公共体育场。在温州修行已近十年的弘一大师，开始受到周边建设的搅扰，他在给学生孙选青的信件中提到“城垣拆毁，改建公园，是间将益喧扰。不久移居乡村，远避嚣尘”。因为拆城的声响很吵，他只好暂居茶山宝严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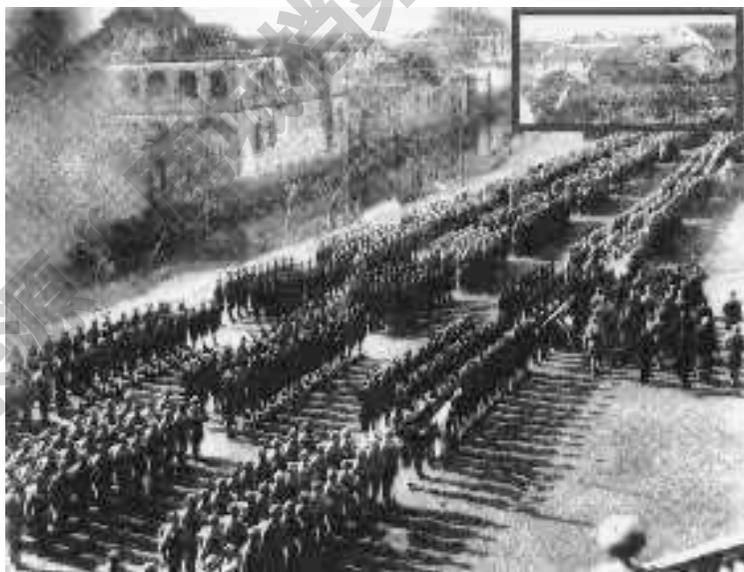
之后，弘一大师与寂山和尚商议，共同发心，集募资财，周孟由、杨雨农等居士也出钱出力，利用城墙拆除后多出的城基空地，易位重建庆福寺，并由弘一大师撰写缘册题字。

1932年，重建的庆福寺分二进，坐北朝南，占地三亩三分多，并在大殿东首建晚晴院，作为大师潜修处。这个小庭院内建有一座三间小楼，为法师掩关之室，庭院与大殿间仅一门相通。靠大殿西北首建有平房多间，

南首山门上有石刻三字隶书横匾“庆福寺”及石刻对联一副，均系弘一亲笔所书。大殿内及月台廊柱、横轩走廊石柱均刻有对联，其中数副系弘一撰写，大殿匾额“极乐庄严”亦出自弘一手笔（庆福寺拆后移至江心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庆福寺曾一度作为佛教协会会址，办有“弘一大师纪念室”。但于文革中大师墨宝损毁无遗，仅存石柱对联数副及山门上“庆福寺”三字石刻。上世纪80年代，庆福寺旧址被某企业充为仓库。1987年1月，因旧城改造，庆福寺拆除。

由于没有任何科学记录资料的留存，庆福寺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其具体位置在哪？这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近年随着对弘一大师研究的深入，庆福寺的具体位置有多种讲法：有人认为在现在市少美校校址，有人认为是人民路街心公园平台，还有人认为是今城区人民路江南大厦位置。近日又有市民意外地在邵度先生所摄的“三十年代阅兵”照片中，发现了庆福寺的侧面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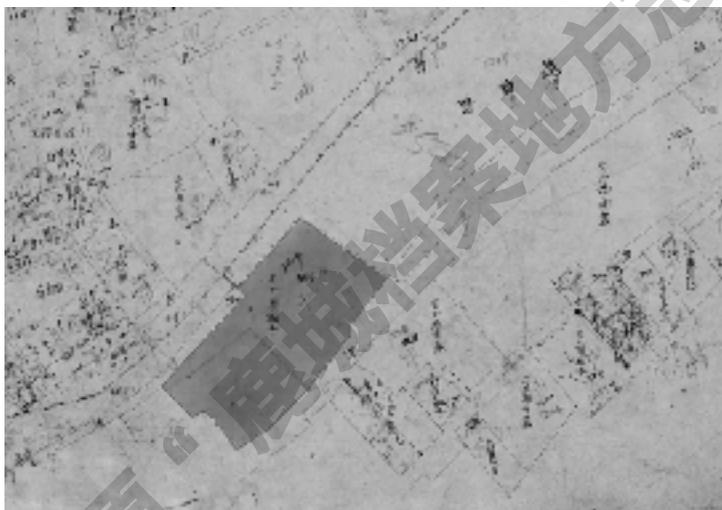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阅兵式（邵度摄）

其实，综合现有资料，完全可以科学定位庆福寺的具体位置。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民国二十五年五月测绘的地籍图（又称丘形图），这是一种测绘比较详尽的土地界止图。晚清至民国以后，西方测绘技术全面取代中国传统鱼鳞图册的测绘方法，成为近代地籍图测绘的基础，民政工作也取得系统地籍测绘的成果。

上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决定就其核心统治区的江、浙两省，选择五县进行地籍整理登记试点。1934年，永嘉县被定为试点县。1935年4月，成立永嘉县地籍整理处，主管户地的清丈、测量与土地登记工作。其成果就是最终形成的八十六幅1:500城厢户地图（实际存图为一百十八幅）。



1936年地籍图上庆福寺位置

我们选取永嘉县第一区南市镇图幅的局部，也就是温州古城的东南角，以积谷山为中心。此图采用1:500的大比例，从图上看，街巷、河网、建筑都勘测得非常清晰。相较同时期的全城地图，重要价值在城市建成区并非只是一整块色块填充，而是依据产权将各建筑依占地的基址清晰地划分界线。上面清楚地标出庆福寺的基址，不过，这已经是1932年易位重

建后的庆福寺了。

图上的建筑确实可以和老照片及现在的自然地形对应，如标注杨雨农宅，可以对应照片上的巽园、馀绮楼。作为重要参照物的积谷山、中山公园内的假山、谢池，其轮廓和现在相比无甚变化。谢池巷和府学巷走向也和现在一致，唯两巷南边仍保留河道，当年尚未填塞。



古今叠加图一



古今叠加图二

因此，我们可以对民国至今基本没有变化的积谷山、谢池巷、府学巷、谢池、东城濠等加上套色，山体套以绿色，水体套以蓝色、道路套以深灰色，庆福寺则以红色标出，其余重要建筑如杨雨农宅、运动场等以黄色标记。将此图套在现在的街景地图上，将比例调至各套色地理实体与现在街景实体相吻合的大小。就可以得出庆福寺的具体位置是在今移动公司的西侧，包括移动公司一小块、三角形的道路及BRT站台、人民路道路的一部分，西南角可抵到现人民路南侧人行道。作为弘一法师起居的晚晴院，则基本是移动公司西边那块。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从现在街景中去想象庆福寺和寺院环境，是非常困难的，当年庆福寺后面的城墙早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拆除，现在已成为飞霞桥路的一部分。寺前的护城河也被填塞，现在成为人民路和街心公园平台的一部分。寺院东侧的运动场，现已建成移动大楼和街心公园。与庆福寺隔河相望的杨雨农宅（巽园），则已拆建成了街心公园平台、人民路及银河大厦的一部分。运动场北侧原有教育会，现在则成了少美校。在这片完全已经现代城市化的区域，怎样才能让人记住弘一大师曾在此驻锡十二年的历史，这是值得思考的。

温州历史上十大书院

周晓明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盛于两宋，历时千年，遍布全国。创办者一般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以儒家学说为教材，以“四书”、“五经”、诗赋、制艺为主要研习内容。其中不乏名师硕儒来主讲，总而言之，书院是学派创立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进行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和思想传播的理想场所。众所周知我国的白鹿、石鼓、睢阳、岳麓为著名的四大书院。它曾对整个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和一定的贡献。

温州地处祖国东南，曾经因交通闭塞，又远离中原，无论是文化和经济均远远落后于中原诸省。但自从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后，浙江却一跃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温州地区也相应地发展迅猛，各行各业都呈现蓬勃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书院也随着其它行业的兴盛而发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温州历史上曾拥有大大小小几十座书院，这对培养当地人才，濡养读书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笔者经过搜集整理，通过比较其规模、影响力、名人效应、历史悠久、人才培养成效等综合考评，甄选出温州历史上十大书院，其排名仅按时间次序而定。

一、鹅峰书院

鹅峰书院的院址，即现在的苍南县桥墩小学。据《温州市志》记载：“鹅峰书院在浙江温州苍南县桥墩松山文昌屿，创办于宋咸平（988～1003）年间。在此期间所建的书院全国也仅十余所，而地处桥墩松山的鹅峰书院即是其中的一所。”

据有关学者考证，当时的鹅峰书院主要是为没落帝王贵族开设办学的，当时读书的对象也许并不多，但后来鹅峰书院却成了当地传授文化教育的重要摇篮。虽然至今尚找不到从鹅峰书院培读出来的知名文人，但在宋代后期的近百年时间里整个松山地区却文人辈出，据《温州市志》记载：“……属苍南地方文科进士23人，状元探花若干人，如黄中、黄石、林湜、韩演翁、柳梦周、林孟治、徐俨夫等等。”我想这和鹅峰书院在当时所开的读书风气是密不可分的。

二、东山书院

东山书院其旧址在现今温州市区的华盖山，后世称东山书院。明嘉靖年间曾毁于台风，后由知府龚秉德重修，清雍正年间巡道芮复传移建于城东南积谷山麓。据史载，王开祖在此讲学时，从者数百人，当时两程未出，宋学初兴，王开祖倡导修己治人，发明经义，为永嘉道学首倡者。其学重教育，以为“学者国之大本，教者国之大事”。并重视历史研究，见解高超，不同流俗，既重理论，又重实践，对后世的永嘉学派影响深远。

三、仙岩书院

仙岩书院在瑞安仙岩（今属瓯海区），南宋时期学者陈傅良在此创办“仙岩书院”。南宋淳熙间，陈傅良辞官归里，主持仙岩书院，制订规约，授

徒讲学，学重“经世致用”。反对性理空谈，使浙南学风大盛，四方学子纷纷景从，尊他为止斋先生。其门生有蔡幼学、曹叔远、木天骏、朱黼、钱文子等，均为当时名士。绍熙二年，理学家朱熹来仙岩访陈，手书“溪山第一”“东南邹鲁”。后来，蔡幼学、曹叔远等曾主持过该书院，当时对整个浙南地区都有较大的影响。

四、梅溪书院

梅溪书院因一代状元王十朋而闻名，它也是乐清最早、最著名的书院。元朝时，为纪念王十朋，官府在乐清县城九牛山下王忠文公祠内设梅溪书院，明朝隆庆年间曾重建。清朝雍正六年，县令唐传銑把箫台山下的长春道院改建为梅溪书院，并延请徐炯文主持讲席。嘉庆年间，林启亨曾主讲梅溪书院，林启亨不屑于科举八股，以笃学藏书被乡里所推重。后瑞安名儒陈黼宸（字介石）也曾在梅溪书院主持讲学。梅溪书院名重一时，门生弟子遍海内，把乐清千百年积聚的耕读文化的精华，辐射到乐清全境和整个浙南地区。

五、浮沚书院

在温州市区谢池坊的浮沚书院原为周行己的故居。周恭叔，名行己，宋时永嘉人，17岁入太学，以文行著，时尚王安石新学，却往伊洛师事程颐。北宋元祐六年辛未登进士第，官至太学博士，著有《礼记讲义》《浮沚文集》等。与沈躬行、许景衡、刘安节等皆于元丰年间同入太学，并称永嘉“元丰九先生”。北宋大观三年己丑，周行己因曾师事程颐而遭新党弹劾，罢职回温，在故宅创设书院，在此授徒讲学，传习洛、关之学。此后，“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学。”浮沚书院是温州历史上一所影响深远的著名书院。

六、水心书院

晚年叶适潜居温州水心（现鹿城区水心街道），杜门家居，讲学授徒。问学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灵、永嘉薛师石、瑞安曹豳、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黄岩柯大春等等，还有台州、余姚、福建等地来受业的学者。当时南宋著名学者刘宰曾一一记述叶适讲学的情况。叶适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是温州创业精神的思想发源。

七、会文书院

会文书院位于现今平阳县南雁荡山景区，是迄今为止温州古代书院整体保存得较为完整的一座书院。

它初建于北宋，为大观三年进士陈经邦及其兄弟陈经正读书的地方。陈氏兄弟曾受业于伊洛二程，学成回乡办学，开浙江理学之先河。会文书院的创建，改变了整个平阳一地的学风，南雁也成为浙南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后来南宋学者朱熹曾于此讲学，成为美谈。



会文书院

会文书院曾因废圯，仅存旧址。清光绪十年，邑人陈承绂、周启良倡捐重建，邑令汤肇熙捐俸劝置田产，以助膏火。会文书院作为平阳传统文化的缩影，1986年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推荐申报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后又被列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八、宗晦书院

宗晦书院位于在乐清东皋山麓，宋汤艺堂建，初名艺堂书塾。乾道间因一代理学家朱熹曾讲学于此，而后名声大噪，后至咸淳五年（1269），县令郑滁孙将邑人汤艺堂所建的书塾改为“宗晦书院”，作为对朱熹在此讲学的纪念。现在书院所处的地方其文笔巷尚存。

九、永嘉书院

永嘉书院，原址在今温州市区的书堂巷（其巷名沿称至今不变），宋淳祐十二年（1252）王致远所建。王致远为著名教育家，在南宋宁宗年间曾任太府寺丞、浙西提刑、台州知州等职，在此教育十年期间，其著述甚丰。后知州赵师簇为表彰其培养人才有功，在书堂巷建渊源坊以作纪念。

而现在新建的永嘉书院地处永嘉大若岩镇、沙头镇、岩头镇三镇交汇处，为观光旅游综合基地。

十、罗峰书院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戊寅，张璫乡荐后，在五都姚溪（今龙湾瑶溪）创办罗峰书院，当时有屋三间，园田五亩，招收学生30余人，进行讲学。嘉靖七年戊子，张璫奉敕扩建原其未第时读书之处姚溪精舍，并由世宗赐名为“贞义书院”。院内敕建“抱忠堂”“敬一亭”，其前及左右并立“翰

林学士”“寅亮天地”“燮理阴阳”“理学名臣”“中兴贤相”“黄阁元辅”等六座牌坊。

在张璠创办书院的同时，其他龙湾人也在积极创办书院，收徒讲学，对温州龙湾地区耕读文化的繁盛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其中比较知名的，为明永嘉英桥里（现属龙湾）人王激在郡城东之慈山创建的白鹤书院等。

温州历史上其它的书院还有如南宋进士、理学家戴蒙创办的明文书院、南宋皇佑三先生之一丁昌期主讲的永嘉醉经堂、明长乐人李贞庵于嘉靖十五年创建的龙渠书院、明工部尚书及刑部尚书高友玠创办的南屏书院、明朝乐清章纶创建的马屿书院、明姜准创建的悟竹书院、明朱谏创建的雁山书院、明邑令林廷献创建的鸡鸣书院、明弘治十三年知府邓谁建的鹿城书院（原府治东北今温十中校址）、清朝平阳知县何子祥创办的龙湖书院，前后大大小小几十座，难以指屈，但有些已名存实亡如瓯江书院等。

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就学者可以得到老师的言传身教和耳提面命，它既可以补官学之不足，又可以倡读书之风气。据《温州府志·学校附书院义塾》记载：“人才必由学校。东瓯自宋，名贤辈出，盛得洛闽之传。经术才猷，文章气节，若周、许、刘、戴、吴、张、黄、娄、王、薛、陈、叶、蔡、林诸子，赫然为一代伟人。正如吾邑清朝一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孙衣言曾在《题会文书院》的一首七律中写道：“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这两句诗也正是对整个温州地区书院的真正写照。

责任编辑：戴爱华

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奥考略

张鹤松

宋末丞相陈宜中，“字与权，永嘉人”，在德祐二年（1276）曾遁归青奥。青奥位于永嘉城区（今温州鹿城区）东北二百里的海中，因两山对峙如门，亦名青奥门。在陈宜中遁归之前，青奥历史上还发生过颜延之筑亭、张又新登岛寻亭、卢侏列水军等事^①。可以说，青奥是一个历来颇受关注的地方，在宋元明清的书籍中均有一些相关记载。从相关史料来看，青奥应该就是现在温州的大门岛。然而，持不同观点者却不在少数。如晚清时就有人说宋代岭北有地名青奥，是陈宜中所居之地^②。吴承志在《十三寨》中则指灵昆岛为青奥^③。胡珠生在2009年发表的《陈宜中生平考辩》一文认为，陈宜中遁归之地是七都青奥。潘猛补在2015年发表的《陈宜中遁归的清澳在何处？》^④一文认为青奥即今龙湾区青山，并且说：青山清代陈氏宗谱“的发现，解开了温州千年的历史地名之谜”。孟甫《一卷陈氏宗谱解开温州地名之谜》^⑤亦言：“青奥即青山的结论可成定讞。”陈贤宝所撰之文认为2015年在青山所发现的两方有“青岙”二字的墓碑“为‘青山即青岙’提供了文物证据”。青奥究竟在今温州何处？笔者梳理史料略述己见，祈望方家赐教。

一、青奥是一个海岛

南宋地理总志《方輿胜览》有载：“青奥山，在永嘉海中，宋郡守颜延之于此立亭。”继颜延之（384-456）筑亭之后，在唐朝时，当时的温州刺史张又新登陆青奥山寻找颜延之所筑之亭，并作《青岙山》诗云：“灵海泓澄匝翠峰，昔贤心赏已成空。今朝亭馆无遗制，积水沧浪一望中。”张又新之诗所言的青岙山就是青奥山，“奥”与“岙”两字在古代书写沿海地名中有着混用的习惯，就像混用“清”与“青”一样，书写沿海地名混用同音字的现象在古籍中还是比较多见。而将青奥称之为山，则只是古人惯称海岛为海中山之故。在张又新作《青岙山》一诗之后，时间进入到后梁武帝开平元年（907），此时镇守永嘉的卢佶派遣水军驻扎青奥以防备钱传瓘水军从浙江北部海域南下发起进攻。据钱氏后裔临安人钱俨（937-1003）撰写于北宋初年的《吴越备史》记载，武肃王钱鏐命钱传瓘“伐永嘉”，“时卢佶列巨舟四十艘于清澳海门，以邀我师”。宋人司马光所编著的《资治通鉴》也说：卢佶闻钱传瓘等将至，“将水军拒之于青澳”。卢佶为何要在青奥驻军防备钱传瓘水军呢？浙江宁海人胡三省（1230-1302）在《资治通鉴》中作注说：“青澳在温州东北海中，俗谓之青澳门。由青澳门而进舟则入温州，其外则大洋也。澳，乌到翻。海之隈篋曰澳^⑥。”胡三省作注《资治通鉴》是在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与至元二十二年间，他将青奥的战略位置说的很清楚，青奥是温州的海上大门，民间大众称之为青奥门。大洋上过来的船舶在进入温州城区之前先要抵达青奥门，在经过青奥门之后向西航行就可以直抵瓯江南岸的温州城。那么青奥的地理位置就是位于瓯江口外的海面上，而且离瓯江口不会太远。也就是因为青奥在地理位置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卢佶才列水军于青奥，企图在钱传瓘的战船进入瓯江之前将其拦截与歼灭。

当卢佶列水军于青奥之事一晃过去了369年，在宋末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青奥迎来了丞相陈宜中遁归。文天祥在狱中所

作《集杜诗》云：“苏刘义、陆秀夫遇二王于温，时陈宜中海船泊清岙门，诸人往邀之，共图兴复。”在战争时期，青奥的战略意义不容忽视。青奥是一个海岛，陈宜中驻扎青奥就可以进退自如。尽管蒙古铁骑在陆地上作战极为强悍，但相对而言，海上作战就是他们的弱项。有关陈宜中在青奥的信息，纂修于元代的《宋季三朝政要》也说：“时陈宜中海航泊清澳门。”元修《宋史》则言：“……遣人召陈宜中于清澳，宜中来谒。”而元代地理总志《圣朝混一方輿胜览》在记载“温州路”时仍然有言：“青奥山，在永嘉海中。”从宋元时期的相关记载来看，青奥地扼瓯江口外的海面上，是个地理位置较为特殊的海岛。

到了明代后，方志在记录温州府永嘉县的海岛时也大都提及了青奥。如弘治《温州府志》卷三《山·永嘉县》云：“青岙山，在海中，两山如门，今名青岙门。张守又新云：海中山也。西至郡城二百里。宋永明（初）中，颜守延（之）于此立亭观海^⑦。”弘治志指出了青奥有着两山如门的自然地理特征，是个距离郡城有二百里的海岛。嘉靖《浙江通志》则言：“青奥山，在县东二百里。两山峙于海中如门，今名青奥门。宋永明中颜守延（之）立观海亭^⑧。”《浙江通志》说是两个海岛对峙如门，但却没有说出与青奥山对峙海中之岛的名称。既然是两个岛屿峙于海中如门，那么，“青奥门”显然可以泛指两个海岛，也就是包括了与青奥山对峙的那个岛屿以及两岛之间的海峡。嘉靖《温州府志》记载青奥山时说道：“在海中，两山如门，宋颜延之立亭于此观海^⑨。”而嘉靖《永嘉县志》对“山”的记载则大多只录入名称，“青岙山”也就三个字出现在该志中^⑩。这或许是与纂修者对古永嘉的“山”缺乏足够的了解有关。万历《温州府志》卷一《輿地志·山川·永嘉县》写道：“青岙山，两山如门，名青岙门。以下山俱在海中^⑪。”明代的方志所载内容大致上还是相同。

从清代的志书来看，对青奥的记载也是与明代相似。如康熙《浙江通志》卷七《山川二·温州府》载：“青岙山，在府城东北二百里，海中山也，两山如门，宋颜延之于此立亭观海。”《大清一统志》也载：“青岙山，

在永嘉县东北二百里海中，两山对峙如门，亦名青岬门。宋永明中郡守颜延之于此筑亭望海。”这些志书的纂修者很有可能是参考过明代的相关史料，但即便如此，那也是纂修者确认青奥山就是个有着两山如门等特征的海岛。乾隆《温州府志》卷四《山川·永嘉县》对青奥的记载则比较详细：

青岬山，在府城东北二百里海中，《名胜志》：“两山对峙，郡守颜延之有观海亭，今名青岬门。”《方輿纪要》：“唐天祐末钱鏐使其子传瓘攻温州，州将卢侏将水军拒于青岬，传瓘曰，侏精兵尽在此，不可与敌。乃自安固舍舟间道袭温州，克之。
宋德祐二年，元兵至临安，宰相陈宜中遁归青岬，即此。张又新诗：灵海泓澄匝翠峰，昔贤心赏已成空。只今亭馆无遗迹，积水苍茫一望中^⑫。”

乾隆《温州府志》引用了《名胜志》与《方輿纪要》的相关记载，可见该志的纂修者的确是查阅了一些以前的相关资料进行确认，并指出了离府城二百里海中的青岬山即陈宜中遁归之地。而乾隆《永嘉县志》与光绪《永嘉县志》对青奥的记载内容与乾隆《温州府志》基本上相同，也都认为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奥就是离温州城区东北二百里海中的青奥山，并有两山如门的自然地理特征。只不过，光绪志还提到了青奥在“宋建炎后置寨兵”。总之，上述清代志书大都认为青奥有着两山如门的明显特征，亦名青奥门。可以说纂修者至少是认为青奥山在当时仍然是一个海岛。

二、七都岛、灵昆岛不是青奥山

对青奥在何处提出不同观点的也是在清代，如光绪《永嘉县志》卷首《輿图·永嘉场图说》云：“宋时岭北有地名青奥，相传为陈丞相宜中所居也。

河道直通郡城，迨明万历间徙陡门向东，离向北旧陡门里许，风潮奔啮，田复为海，遂与郡城别派分区^⑬。”光绪志所说的“岭北”是指大罗山支脉茅竹岭的北边，茅竹岭即茅竹山，山北临近瓯江，若有块地的话那也是比较凸往瓯江之中了，最终却被风潮冲入了滔滔瓯江。明代万历之前所纂修的嘉靖《永嘉县志》有言：茅竹山，“旧山北有田地数百顷，中有河，自二都至郡城舟楫皆通，而以军前大埭北截江潮。宋绍兴二十四年埭决，田地悉坍江^⑭。”既然岭北之地早在宋代绍兴年间就已经坍塌江中，那就不可能还有后来的“陈宜中所居”了。当然，岭北之地并非岛屿。嘉靖志也没有说岭北之地就叫青奥。不过，茅竹岭附近的七都岛上是有个叫青奥的地方，七都岛地处瓯江之中，该岛的东南端与瓯江南岸的茅竹岭隔江相望。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永嘉县》有载：“七都：任洲、沙洲、青奥^⑮。”此青奥就是七都岛上的三个地方名称之一。直至清代乾隆《永嘉县志》仍有记载：“七都：任洲、沙洲、青奥。”并且说：“四面临江，前经迁弃，后复垦种^⑯。”在经历了迁界与复界之后，七都岛的变化很大，新移民在岛上所形成的村落并没有继续沿用原来的地名。光绪《永嘉县志》卷三《建置·乡都》言道：七都，旧志地名三，今地名十五，“此都四面临江，顺治十八年迁弃，后复垦种^⑰”。在光绪志所记载的15个地名中已无青奥可寻。有人在光绪年间却说宋时岭北有地名青奥，这显然是将七都岛上因迁界而消失的青奥误为岭北之地，否则很难想象在茅竹岭附近竟然会出现两个青奥。

胡珠生（1927-2014）先生在《陈宜中生平考辩》中就将七都青奥当作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奥。笔者最近所遇到的一位学者也是持七都论。但是，七都岛的地理位置并不在海面上，七都岛是一个由瓯江泥沙日积月累冲积下所形成的冲积岛，这类冲积岛的组成物质主要是泥沙，所以地形就很低平单一。七都岛的海拔在3米以下，根本不具有两山如门的地貌特征，七都岛距离城区也很近。该岛的诸多特征都与青奥门明显不符。其实，光绪《永嘉县志》的纂修者也并非是采信茅竹岭附近的青奥之说，所以有在卷首《與

图·永嘉场图说》中用“相传”二字以提示读者，而在卷二《輿地志二·叙山》中则明确记载：

青奥山，在城东北二百里海中，两山如门。宋建炎后置寨兵。
《一统志》、《方輿纪要》：“两山对峙如门。亦名青奥门。宋永明中，郡守颜延之于此筑亭望海。唐天祐末，钱鏐使其子传瓘攻温州，州将卢侏将水军拒之于青奥，乃自安固舍舟间道袭温州，克之。宋德祐二年，元兵至临安，宰相陈宜中遁归青奥，即此。唐张又新诗：灵海泓澄匝翠峰，昔贤心赏已成空。只今亭馆无遗迹，积水苍茫一望中^⑧。”

由上可见，光绪《永嘉县志》的纂修者并不认为茅竹岭附近的青奥是陈宜中海船所停泊的青奥。而是指出距离城区二百里的海岛青奥山才是陈宜中遁归之地。茅竹岭附近的青奥之所以会被一些人误认为是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奥，这只是因为地名相同所引发的误会而已。但需要注意的是，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奥因其自身的自然地理特征被民间大众称之为“青奥门”，志书称为“青奥山”。而茅竹岭附近的青奥只是七都岛上的一个村庄名称，显然是不会有“青奥山”与“青奥门”这样的称呼。

除了七都岛的青奥被误传之外，清末吴承志（1844-1917）在《温州十三寨》中则声称灵昆岛是青奥，他说：

馆头见《元丰九域志》，为乐清镇传，青岙次在其下，应亦为两邑交界之地。《吴越备史》作“清岙”，云：“文穆王讨温州，卢侏列巨舟四十艘于清奥海门以拒我。”青岙当江流入海之口，为舟船出入门户，宜近旧界乐清，今入玉环之灵昆。《方輿胜览》作“清岙山，在海中”。同治《永嘉志》据万历《府志》于瓯海下云：“瓯江沿岸，北行至磐石，南行至宁村所，有双昆山为海门，遂

入于海。”双昆即灵昆，其山有双昆、单昆二峰，故又名双昆。灵昆悬屹海中，与磐石、宁村之沿岸诸山相夹为门，号称海门。是即《备史》及《胜览》之青岙。万历《府志》于本山下未标立异名……岙名湮晦已久，今始考出。此寨远近可定^⑧。

吴承志指灵昆岛为青奥只是出于猜测。光绪《玉环厅志》对灵昆岛的描述颇详：“桑田千顷，环以沙堤。单昆山麓有大马池暨醴泉井，西凹为鞋草潭，水味清淡。埠设渡船二只，一渡温郡双门，一渡盘石。旁建侯王庙，附连义祠。西即双昆山，形似眠牛，奇石玲珑，洞天虚敞，中建寺刹，旁穿石井，水泉甘冽。西南附披牌山，背开石洞，岩上鸬鹚尤多。南渡江十里，属永嘉场。”《玉环厅志》所述及的三座山体单昆、双昆、披牌都是非常低矮，状如土丘，灵昆岛也是一个冲积岛。当今就有人声称灵昆岛是形成于元代。灵昆岛与七都岛的不同之处主要还是地理位置，灵昆岛地处瓯江口的江海交汇处，这也是被吴承志误指为青奥的原因之一。但灵昆岛离城区的距离要比青奥近的多，如乾隆《温州府志》载：“灵昆山，在府城东百里，瓯江海口中。”“青岙山，在府城东北二百里海中。”可见两山因地理位置不同而与城区之间的距离相差悬殊，这就不太可能会是同一个岛屿（一岛有着异名、别名、俗名或简称的现象是存在的）被误载为二岛。在吴承志上述所提到的万历《温州府志》中也同时记载有灵昆山与青岙山。灵昆山与永嘉场两地是隔江相望，而万历志的纂修者王光蕴（1540-1606）就是一位永嘉场人。万历志在说到灵昆岛的情况时有言：旧为乐民侵据樵采，迩年邑令林应翔申呈院道垦田数千亩，议输官税。”纂修者将灵昆岛上远近所发生的事情写入方志之中，不可谓是不了解灵昆岛，这也就不具有被误载的可能性。再综合灵昆的地貌特征，可知灵昆岛不可能是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奥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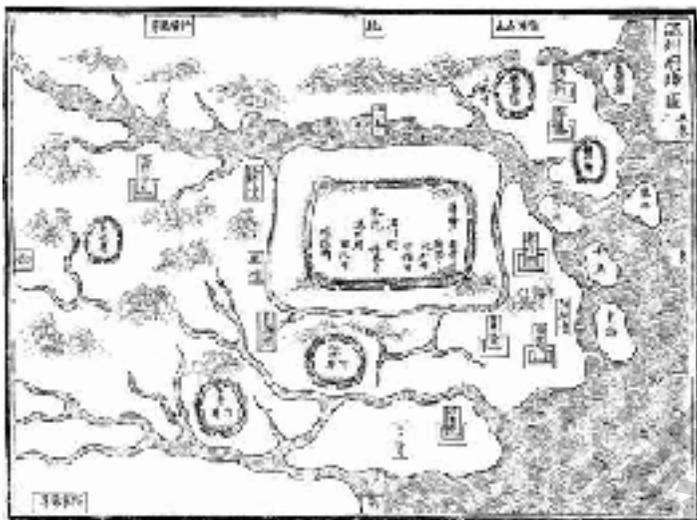
三、被误指为青奥的青山

近年来最为流行的还是青山即青奥之说。青山位于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2007年青山村有陈姓村民在老屋拆建时从屋顶隔层中偶然发现清代的《青山陈氏宗谱》，该谱记载：“青奥即今之青山也，青山为与权公旧游地，其后守益公迁居青山，亦继与权公之志也^⑩。”除了宗谱所载外，2015年在青山还发现了镌有“青岙和庵陈公寿莹”“清清岙陈公四位之墓”等字的两方清代墓碑。因此一些学者相信青山就是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奥，并认为已经是解开了青奥在何处的历史地名之谜。这一观点目前似乎已成主流。不过，地名毕竟面向社会大众，一般不至于像历史人物的某些隐私那般不为人知。而青山与青奥在明清所纂修的方志中均有同时出现，可谓是一目了然：青奥是距离城区二百里的一个海岛，亦名青奥门；而青山只是大罗山的支脉，在青山的山脚下就坐落着青山村，青山在古代属于永嘉场区域。

对于大罗山支脉青山，嘉靖《温州府志》卷二《山川》有云：“大罗山，去城南四十里……青山、天柱、黄奥、杜奥、茅竹、泉村、君子等山，皆其支耳^⑪。”弘治《温州府志》卷三《山·永嘉县》也载：“大罗山……广袤数十里，诸山迤邐，皆其支别也……青山、茅竹山……^⑫”万历《温州府志》亦言：“大罗山，去郡东南四十里……青山、郑岙山、梅头山、黄焦山、白水山、鹿迹山，皆其支别^⑬。”方志都已经说的很清楚，青山是大罗山的支脉。

而对青山村的记载，明代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永嘉县》有言：“新河、青山、金岙、乐湾^⑭。”嘉靖《永嘉县志》卷一《輿地志·隅厢乡都》有载：“四都：新河、青山、金岙……^⑮”万历《温州府志》卷一《輿地志·隅乡·永嘉县》亦云：“四都：新河、青山、金岙……^⑯”清代康熙《永嘉县志》卷二《輿地下·隅乡》同样载道：“四都：新河、青山、金岙……^⑰”光绪《永嘉县志》卷三《建置志一·乡都》则写道：“四都：黄石陡门、青山，俱同上……^⑱”明清方志所载，青山在行政上归属于永嘉县四都。

在地方志中找不到青山即青奥之说的蛛丝马迹。方志却分别记载了青山与青奥有着不同的地理位置，可见青山与青奥只是不同的两个地方而已。指青山为青奥的诸位学者主要是以清代陈氏宗谱与墓碑为据，乍听之下似乎有些道理，但细思之，则发现存在着无法解释的问题。如果青山即青奥，那么青山的四周就会是一片海域。虽然潘猛补在《陈宜中遁归的清澳在何处？》中写道：“沧海桑田，地形变迁，清澳变青山，是很自然的事。据《温州通史》主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吴松弟教授考证：温州沿海平原形成比较晚，宋代龙湾一带还是海面，青山可以泊海船^②。”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距离青山数公里处就有建于北宋元祐八年（1093）的千佛塔，有始建于北宋的朱宅大众桥。青山东边与东南边的海滨、永兴、沙城等地的海拔都比青山村要低，海滨有始建于宋代宝祐五年（1257）的忠烈观；永兴有始建于宋代的监桥、福善寺、范公桥；沙城有始建于宋末的章家桥。如果说“宋代龙湾一带还是海面”的考证是符合史实的，那么龙湾区永嘉场区域的成陆史就有必要进行修正。而永嘉场却有不少姓氏声称在宋代之时就已经是定居在永嘉场大地上，如新河邹氏、水心朱氏、曹粮曹氏、龙湾潘氏、山湾陈氏、街中王氏、普门张氏、吴汇头吴氏、大塘范氏、五甲沈氏等等^③。很明显，宋代的永嘉场不可能还是一片鱼类生活的海域。这些宗族先人所定居的新河、水心、曹粮、山湾等地就分布在青山的附近，可见宋代的青山没有濒临海面，没有濒临海面的青山也就不可能是青奥。青山在明代已经是位居于永嘉场内陆的一个地方，这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据明代弘治年间的海防资料记载：“防御倭寇官军战船于蒲门、小渔野、青奥门、中界山、楚门等处海口湾泊提备。遇有警急，即便策应追捕^④。”可以看出，明代的青奥仍然拥有着可以停泊战船的海岸地貌。笔者在查阅著名的明代海防专著《筹海图编》时，也发现该书的《温州府境图》中的瓯江口外的一个海岛就写着“青澳”二字^⑤；明代《温处海防图略》卷一《浙江温州图》、《武备志》卷二百十五《浙江温州府图》也对这个海岛标明是“青岙”^⑥。至此，可以断定青山确非青奥。



《筹海图编》卷五《温州府境图》

既然青山不是青奥，那么青山的清代陈氏宗谱与墓碑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龙湾宗祠》有言：“先祖陈宜中，宋末丞相，曾遁居青奥。传至五世陈守益，明初迁居青山，为青山陈氏始祖。”而明朝初年正是明政府实施海禁与徙岛政策之时。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徙浙南的海岛居民于大陆。这当然也包括了青奥的岛民，陈守益应该就是在徙岛之时由海岛青奥迁至永嘉场青山村定居。青奥的岛民在定居大陆之后，如果有部分人或其后裔仍然自称为青奥某某氏那也只是国人的宗族传统，这类现象在中国的宗族中并不罕见，例如龙湾区就有因祖先是迁自于福建莆田普门而自称为“普门张氏”的宗族。普门张氏在大罗山瑶溪一带的墓地颇多，如果有某位张氏的墓碑上写着普门某某张公，那也不能以此推断墓葬所在地就是普门村。而从《永嘉场墓志集录》中所收录的11位青山姜氏的明清时期墓志来看，其中的文字中也只有“青山”二字、并无“青奥”之字。姜氏先祖孝庄是在宋代来赘永嘉场“青山里宋参议申屠公之女，始就居焉^④”。

如此看来，青山即青奥之说也只能是清代陈氏家谱纂修者的误会。毕竟“青山”与“青奥山”两地名仅只是一字之差，易让人有遐想的空间。



《武备志》卷二百十五《海防七·浙江温州府图》

四、寻找青奥

青奥在今日温州的何处？我们可以从记载有船只进出瓯江的航海史料来了解青奥的地理位置所在。在青奥的历史上，除了陈宜中遁归等事外，

宋高宗赵构也曾舟泊青奥门。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赵构为躲避金军的追捕，于是在浙江定海乘舟入海往温台方向漂浮。据当时侍从宋高宗浮舟海上的中书舍人李正民所写日记说，建炎四年正月十八日，御舟驶离台州“章安镇”，“二十日，泊青澳门”。“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⑤”。李正民所说的“温州港口”即指瓯江口处，也就是乐清的黄华、岐头一带。所谓“温港之黄华^⑥”“南枕港口^⑦”。而扈从宋高宗航海的官员赵鼎在日记中也写道，正月“二十一日，御舟入温州港”。赵鼎继续写道，“二十二日，御舟泊管市。二十三日，御舟在管头”。二十五日，“闻金人明州杀戮甚酷，台州一空”。“是日，御舟移泊乐湾，避管头、台州之路。二十六日，驾幸水陆寺”。二月“初一日，御舟移泊温州江心寺下^⑧”。综合李正民与赵鼎所记叙的航海经过来看，御舟从台州南下后，先抵达青奥门泊舟，次日至瓯江口处停泊，然后沿着瓯江北岸时开时泊。宋高宗在瓯江南岸的水陆寺出现时已经是正月二十六日。从宋高宗的航线中可以看出，青奥门就是在瓯江口外的海面上，而在这个位置上就有今天被叫作大门与小门的两个海岛。

在清楚了宋高宗赵构南下温州的航线之后，再来了解一下船只从瓯江驶入大海的航线。弘治《温州府志》等明代志书有述及：“退潮东去，北至馆头，抵乐清界，南次乐湾，次崎头。舟行至此，始出江口入海，分南北行，谓之‘转崎’。北至青岬门，而永嘉之海境尽矣^⑨。”清代乾隆《永嘉县志》也说：“至馆头抵乐清县界，南次龙湾，次崎头，舟行至此，始出江口，入大海。海分南北行，谓之转岐。至青岬山，而永嘉之境尽矣^⑩。”崎头就位于黄华以东，即今乐清市岐头。船只过了岐头后驶入大海，到了青奥山，也就是永嘉县海域的尽头了。从这条驶入大海的航线来看，青奥山就位于瓯江北口之外的海面上，这个位置上就只有今天的大、小门两岛，其中一岛必定是青奥。

乾隆《永嘉县志》的纂修者认为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岬是在灵昆岛以东百里处。顾祖禹(1631-1692)在清初所纂修的军事地理书籍《读史方輿纪要》

对青奥的记载较详：“青澳山，府东二百里海中，两山对峙如门，亦名青澳门。刘宋永明中，郡守颜延之于此筑亭望海。唐天佑末，钱鏐使其子传瓘攻温州，州将卢侏将水军拒之于青澳，传瓘曰：‘侏之精兵尽在于此，不可与战。’乃自安固舍舟间道袭温州，克之。宋德祐二年，元兵至临安，宰相陈宜中遁归青澳，即此。又东有东洛、鹿西诸山，皆为海道之冲。”顾祖禹所记录的这段文字的重点之处是指出了陈宜中所遁归的青奥以东还有鹿西山。光绪《永嘉县志》有载：“鹿西山，在青奥东北海中。”那么，青奥也就是在鹿西山的西边或西南边了。光绪志所载与顾祖禹所言相差不大，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人所载地理位置可能难以尽到今日之精准。而鹿西在宋代与青奥并列“温州十三寨”之中^④，鹿西山的名称未变，即今之鹿西岛。打开现代地图来看，在鹿西岛的偏西南方向就是大门岛。大门岛地扼瓯江北口之外的海面上，其位置就是在灵昆岛的东面。大门岛陆域面积约 28.6 平方千米，海岸线长 45.8 千米，大门岛是今温州地区面积最大的岛屿。正因为面积颇大，说大门岛位于鹿西岛西边或西南边，显然也都是准确的。毋庸置疑，今大门岛就是陈宜中的遁归之地青奥山！

青奥为何被叫成了大门？从大门岛的地形来看，该岛的山脉分布从北部到东西两侧形成了类似“U”字的形状，中间夹着黄大岙平原，在平原之中可见两侧山体对峙如门。现在的大门镇就坐落在黄大岙平原上，由于黄大岙平原可以容纳人口形成集镇，因此黄大岙的知名度也不亚于大门岛，清光绪《浙江沿海图说》有言：“瓯江口东面有黄大岙，即大门山^⑤。”大门岛的北面是小门岛，大门与小门两岛在海中也是对峙如门，光绪《玉环厅志》载：大门岛“北对小门山，中通港门，海艘由此出入”。在两岛之间所形成的“港门”水道（海峡）是船只所行走的航道。大门岛南面隔着大门水道与青山岛相望，大门水道比起北面的“港门水道”要宽阔的多，大门水道是船只进出温州的主要航道。光绪《浙江沿海图说》说：“南面水道即名大门，为进出瓯江必由之路，如室之有门也”。因为温州城区的船只到了瓯江口，“既由北港出口，南港仅通小艇，止能向大门而行。因

南北两面均有浅沙”。所以，“无论行向南北，总以出大门为是”。如此看来，“大门”的命名就是温州海上大门之意。而青奥俗名为青奥门，青奥门的“门”既是指两岛如门，亦指青奥是温州的海上大门，简称或直呼为“大门”那也只是顺理成章之事。记载郑成功事迹的《先王实录》就将大门岛与小门岛分别称之为大门澳、小门澳^④。而将大、小门作为两个海岛的名称最早记载在方志之中的要数明人王叔果，王叔果在纂修嘉靖《永嘉县志》时不仅记载了“小门山”与“大门山”，还同时将“青岙山”与“黄大岙”写进“海中诸山”中，仅只是说黄大岙“故有人居，内多田地可耕^④”。王氏对海中诸岛的了解有所欠缺亦不为怪。因为明初所实施的徙岛政策致使海中诸岛在长达 200 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荒废状态，只有少数人能够在海中诸岛来往或居住。这也是造成海岛名称紊乱的主要因素。王叔果无法分辨所听闻到的这些名称，就将其一一载于方志之中。这种现象在明中后期与清代的书籍中也是较为多见。最终大门的名称取代了青奥，但其名称应该只是青奥门的一种简称而已。

五、结论

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奥的地理位置是在乐清岐头以外的海面上，船只在瓯江中经过乐清岐头之后入海继续航行才能到达青奥。很显然，七都岛、灵昆岛、青山的地理位置并不在岐头以外的海面上。乾隆《永嘉县志》还指出了青奥是在灵昆岛以东。所以，七都岛、灵昆岛、青山就不可能是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奥。再从卢偁在青奥驻扎的水军规模来看，青奥周边的水域是有着相当的深度与广度的。七都岛、灵昆岛、青山三地的地理环境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七都岛地处瓯江之中，瓯江的水域面积显然无法与海洋相提并论。清初郑成功驾驻瓯江北岸的磐石卫时，就因磐石周边难泊多船而移驾进驻小门澳与大门澳^④。而灵昆岛是位于江海交汇处，但其东边沿岸却是灵昆浅滩，灵昆浅滩往东南延伸十几公里直到霓屿岛，浅滩在现

代很适合填海造陆，所以当今的灵霓大堤就建造在灵昆浅滩上。在灵昆浅滩以南的永嘉场近海也分布着浅滩，青山位居永嘉场内陆，假设当年青山四周还是一片海域，那也未必适合停泊大型船只。因为瓯江南口处与永嘉场近海都是浅滩，永嘉场在成陆之前就难以例外，若是深水区又岂能成陆？卢佶的水军所拥有的巨舟就达到了40艘，试想如此数量的巨舟在瓯江之中或浅滩沿岸如何集结？就此看来，七都岛、灵昆岛、青山三地也不可能是青奥。

青奥之所以俗名为青奥门，一是该岛上面有两山对峙如门；二是该岛与小门岛对峙海中如门。尽管小门岛的面积不大，但小门岛是个呈条状的岛屿，船只从两岛之间的水道穿过时会让人有一种两岛对峙如门的感觉；三是该岛的地理位置颇为特殊，堪称温州的海上大门。船只进出温州大都要经过青奥门，温州城区的船只“出岐头东北至小门，可以泊船避风、樵柴、汲水”，远道而来的船只抵达青奥门时就更有稍作休整的需求。青奥门在海上丝路与温州的海洋交通史上应该是具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在青奥门的历史上，也先后有过颜延之筑亭、张又新登岛寻亭、卢佶列水军、宋高宗赵构泊舟、陈宜中遁归等事。然而到了明代初年，由于明政府所实施的海禁与徙岛政策导致了海岛的荒废与航线的没落，因此“青奥门”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明朝之后，清廷在顺治十八年（1661）推行了极为严酷的迁界令，海岛与沿海三十里内的地区都被废弃，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克塽降清之后，界始渐复。在明清时期，青奥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海防上还是能够有所体现。如明代“嘉靖年间派旗牌官一员，部领兵船一十只，专随参将屯泊于此，往来南北督哨，遇警并力援剿。其轮拨什兵一哨，划驾唬船六只，委中哨官带领，专随本参驻泊黄大岙海洋督哨^{④6}”。清代方志则认为海中诸岛是以“青奥山、中界山为门户^{④7}”。而青奥被叫成了大门，但其名称却仍未脱离该岛自然地理特征的范畴。

注 释:

- ① 光绪《永嘉县志》卷二《舆地志二·叙山》，《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0册，上海书店，1993年，第43页。原文：“青奥山，在城东北二百里海中，两山如门。宋建炎后置寨兵。《一统志》、《方輿纪要》：‘两山对峙如门。亦名青奥门。宋永明中，郡守颜延之于此筑亭望海。唐天祐末，钱鏐使其子传瓘攻温州，州将卢佶将军拒之于青奥，乃自安固舍舟间道袭温州，克之。宋德祐二年，元兵至临安，宰相陈宜中遁归青奥，即此。唐张又新诗：‘灵海泓澄匝翠峰，昔贤心赏已成空。只今亭馆无遗迹，积水苍茫一望中。’”
- ② 光绪《永嘉县志》卷首《舆图·永嘉场图说》，《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0册，上海书店，1993年，第20页。
- ③ 吴承志：《温州十三寨》，《梅冷生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03-304页。
- ④ 潘猛补：《陈宜中遁归的清澳在何处？》，《温州日报》2015年1月28日，第15版。
- ⑤ 孟甫：《一卷陈氏宗谱解开温州地名之谜》，《龙湾史谭》总第十四期，2016年4月。
- ⑥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后梁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
- ⑦ 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卷三《山·永嘉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 ⑧ 嘉靖《浙江通志》卷十二《地里志第一之十二·温州》。
- ⑨ 嘉靖《温州府志》卷二《山川》，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景印。该志天一阁版本原文为：“青奥山，去城东北二百八十里，在海中，两山如门，宋颜延之立亭于此观海。”天一阁版本在数字方面存在着一些错误，如将明世宗第三次召张璁复任的圣旨《敕原任辅臣张孚敬》的日期嘉靖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竟然错刻为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笔者怀疑青奥山离府城二百八十里很有可能会是一百八十里之误。由于未能找到其它版本的嘉靖《温州府志》，也就未能进行比对。
- ⑩ 嘉靖《永嘉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8册，

中国书店，1992年，第552页。

⑪ 万历《温州府志》卷一《輿地志·山川·永嘉县》，《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8册，中国书店，1992年，第38页。

⑫ 乾隆《温州府志》卷四《山川·永嘉县》，《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8册，上海书店，1993年，第47页。

⑬ 光绪《永嘉县志》卷首《輿图·永嘉场图说》，《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0册，上海书店，1993年，第20页。

⑭ 嘉靖《永嘉县志》卷一《輿地志·塘埭陡门》，《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8册，中国书店，1992年，第555页。

⑮ 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永嘉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⑯ 乾隆《永嘉县志》卷三《都里》。

⑰ 光绪《永嘉县志》卷三《建置志一·乡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0册，上海书店，1993年，第65页。

⑱ 光绪《永嘉县志》卷二《輿地志二·叙山》，《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0册，上海书店，1993年，第43页。

⑲ 吴承志：《温州十三寨》，《梅冷生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03-304页。

⑳ 转引自潘猛补《陈宜中遁归的清澳在何处？》，《温州日报》2015年1月28日，第15版。

㉑ 嘉靖《温州府志》卷二《山川》。

㉒ 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卷三《山·永嘉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㉓ 万历《温州府志》卷一《輿地志·山川·永嘉县》，《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8册，中国书店，1992年，第36页。

㉔ 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永嘉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 ②⑤ 嘉靖《永嘉县志》卷一《輿地志·隅厢乡都》，《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8册，中国书店，1992年，第557页。
- ②⑥ 万历《温州府志》卷一《輿地志·隅乡·永嘉县》，《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8册，中国书店，1992年，第29页。
- ②⑦ 康熙《永嘉县志》卷二《輿地下·隅乡》，《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9册，上海书店，1993年，第653页。
- ②⑧ 光绪《永嘉县志》卷三《建置志一·乡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0册，上海书店，1993年，第65页。
- ②⑨ 潘猛补：《陈宜中遁归的清澳在何处？》，《温州日报》2015年1月28日，第15版。
- ③⑩ 中共温州市龙湾区委党史区志办公室编：《龙湾宗祠》，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年，第86页、第128页、第105页、第99页、第90页、第45页、第13页、第51页、第162页、第175页。
- ③⑪ 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七《遗事·防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474页。
- ③⑫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五《温州府境图》。
- ③⑬ 蔡逢时：《温处海防图略》卷一《浙江温州图》；茅元仪：《武备志》卷二百十五《海防七·浙江温州府图》。
- ③⑭ 娄寄等：《明娄鏞墓志铭》，孙建胜编：《永嘉场墓志集录》，黄山书社，2011年，第26-28页。其余青山娄氏墓志铭分别载于该书第240页、第278页、第284页、第520页、第527页、第532页、第534页、第537页、第541页、第543页。
- ③⑮ 李正民：《己酉航海记》，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672-675页。按：“温州港口”即指瓯江口处。李正民在日记中说，建炎四年正月初二日，御舟“晚泊台州港口”，初三日早上，至台州“章安镇，驻舟”。“十八日，移舟离章安镇”。而从台州渚江口处往西航行至渚江沿岸的章安镇还有十几公里，可知李正民所说的“台州港口”即指渚江口处。“温州港口”当然也就是指温州的瓯江口处。赵正民的日记只写到正月二十一日为止。正月二十二日，李正民被旨奉使江、湖，问安隆祐宫，因此自后不复记录。

- ③⑥ 光绪《玉环厅志》卷八《军政志·海防》，《玉环古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298页。
- ③⑦ 范涑：《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海港守备》。
- ③⑧ 赵鼎：《建炎笔录》，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687-688页。
- ③⑨ 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卷四《水·永嘉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嘉靖《浙江通志》卷十二《地里志第一之十二·温州》。
- ④⑩ 乾隆《永嘉县志》卷二《山川·水》。
- ④⑪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兵六·两浙东路》。
- ④⑫ 朱正元：《浙江沿海图说·温州》，《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00号》，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73页。
- ④⑬ 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6页-187页。
- ④⑭ 嘉靖《永嘉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8册，中国书店，1992年，第552页。
- ④⑮ 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6页-187页：明永历十三年（公元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三月，郑成功驾驻乐清“磐石卫。差官催促各提督统领，严限本月二十二日齐到磐石卫……二十五日，各提督统领俱如期到卫港。时磐石地方窄狭，难泊多船。派前锋镇、左先锋镇二统领下扎大门澳，中左二提督下扎小门澳，亲军扎七都外屿，藩（指郑成功）驾扎小门澳……藩传令就大、小门澳考较弓箭……。四月，藩驾驻大、小门澳。日比武弓箭，考较器械，并行操练。以风信未顺，姑湾泊教练”。
- ④⑯ 光绪《玉环厅志》卷八《军政志·海防》，《玉环古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299页。
- ④⑰ 光绪《永嘉县志》卷二《舆地志二·叙山》，《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0册，上海书店，1993年，第43页。

谈《温州市鹿城区地名志》中景点对联的一些问题

沈洪保

近日，阅读《温州市鹿城区地名志》（2019年中华书局版），知道书中对鹿城每个地名的地理位置、命名由来、历史沿革、政区情况、自然条件、经济概况、文化特色、基础设施，以及旅游景点都一一作了记述，该书实在是花了大功夫大力气编成的，难得地记载鹿城城镇农村的一部贯通古今地名的很好的工具书。

书中卷十一有“地名艺文”一章，此章在1987年编的《温州市鹿城区地名志》中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新版新增的。“地名艺文”中选了与地名相关的碑记、游记、杂记，还有诗、词、联等等，使相对枯燥的地名志增加了趣味性与可读性，这一点是很不错的创新。

我在阅读该书入选的景点对联时，发现许多对联存在问题，于是对其中有问题的一些对联作一点简要的评述。现依入选的次序点评如下：

朔门轮船码头的安澜亭联：

安澜浪静，丽日风和；

海坛苍翠，佑吾子民。

此联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平仄问题。对联要求词组末字或者节奏点上的字应平仄相反。上句“平”，下句要“仄”。而这该联中上“安澜”与下“海

坛”的词组末字都是平声；上“浪静”与下“苍翠”的词组末字都是仄声，这样就违背了上下句“平仄相反”的联律了。二是词性不相当。“丽日风和”是并列的形容词，而“佑吾子民”是动宾结构的短句，上下两者是不对应的。所以说这是仅仅是字数相等的不合格的对联。

巽山文峰塔北侧骖鹤亭联：

巽吉山头塔影尖；
疏林斜挂月纤纤。

此联上联“山头”是名词与下联“斜挂”是动词，是词性不对应的。而上联的句尾是“塔影 / 尖”，而下联的句尾是“月 / 纤纤”，上下句节奏不一样，词语也不对应。下联用叠字“纤纤”，上联也应该用叠字。又，“尖”“纤”，两句尾字都是平声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此联是明显不合格的。

翠微山白云观南边的长春亭联：

探胜登临，历览翠微山景色；
日照白鹿，风光百里展宏图。

上句“登临”是动词，下句“白鹿”是名词，两者词性是不对应的。“历览”与“风光”是词性不对应的。又，“翠微山 / 景色”“百里 / 展宏图”，不仅词性不对应，节奏也是不对应的。

月笼翠微景色，千秋增异彩；
寻幽坐憩静听，瓯海涨潮声。

这一联问题也很多。“月笼”主谓结构与“寻幽”动宾结构，两者是不对应的。又“笼”“幽”均为平声，不合词组末字平仄相反的联则。“千秋”数量词与“瓯海”名词，两者也是不对应的。

南朝四百寺，风雨共楼台，看江山胜概，中川依旧枕孤屿；
瓯海三千年，波涛自潮汐，问文物名区，亘古高怀有几处。

此联撰得很不错，但美中不足的是上句结尾是“屿”字，下句结尾是“处”字，上下两句尾字都是仄声是违反联律的。应该是上联收于仄声，下联收于平声。

横渎水心庙内河心亭联：

晨曦耀水心，如此多娇；
夕阳映孤屿，分外妖娆。

上句开头“晨曦”的“曦”与下句开头“夕阳”的“阳”都是平声，没有做到“平仄相反”。上句尾字“娇”与下句尾字“娆”都是平声，不行。“娇”字处应用仄声字。

茶院寺湖心亭联：

昔日茶院寺，小名闻东瓯；
今朝湖心亭，钟声响鹿城。

这对联整体可算宽对。但上句尾字“瓯”与下句尾字“城”都是平声，不行。上句尾“瓯”处应为仄声。

华盖广场华盖亭联：

登海坛，上华盖，瞰瓯江潮涨；
驾白鹿，下城东，赏万家灯火。

此联上句中的“瓯江”与下句中“万家”词性不对，并且“江”与“家”都是平声，不合“平仄相反”的要求。上句尾字“涨”与下句尾字“火”都是仄声，也不行。“火”处应为平声。

杨府山金山公园内金山亭联：

南望罗峰，山川秀；
北踞瓯海，水长流。

此联上句中的“山川/秀”与下句中的“水/长流”，上下句节奏不一样，词语也不对应，不合联律。

南山建亭，高瞻远瞩观四海；
瞿屿临风，心旷神怡忆五洲。

此联中“南山建亭”，“山”“亭”均是平声，没有做到“平仄相反”。又“心旷神怡”，“旷”“悦”均为仄声，也没有做到“平仄相反”。

积谷山之巔留云亭联：

吐东山之明月，澄一镜之清泉；
圆参差之城堞，错满眼之市廛。

上联尾字“泉”，下联尾字“廛”，两句尾脚都是平声，是不合联律的。雪山风景区内青莲寺联：

远眺瓯江，潮汐波涌，江心定锁左右双宝塔；
近瞻雪山，释道丛林，莲花永镇底外两重山。

此联上句开头“远眺瓯江”下句开头“近瞻雪山”，“江”“山”均是平声，不合联中上下联每个分句的尾字(句脚)应平仄相反的要求。“莲花”对“江心”也是平平对平平，也是成问题的。

海坛上上岸亭联：

春风杨柳，瓯江南北大地歌；
夏雨秋实，海坛东西日月盈。

上联开头“春风杨柳”，下联开头“夏雨秋实”，“柳”“实”均仄声；“坛”对“江”，是平对平。均不合词组末字应平仄相反的联则。又联尾字，上是“歌”，下是“盈”，均为平声，不合上仄下平的通则。

松台山西北双莲亭：

松映飞檐世几许；

台倚落霞亭双莲。

此联中的“松映”的“映”与“台倚”的“倚”，都是仄声；“飞檐”的“檐”与“落霞”的“霞”均是平声，没有平仄相反。又，“世几许”是仄仄仄，“亭双莲”是平平平。对联是忌“三仄尾”与“三平尾”的，理由同样是“平仄交替太少，读起来缺乏音调变化”。

南塘街伍相国祠联：

凭栏眺望，瑞邑帆游，列山云烟弥漫；

倚门俯瞰，鹿城南塘，大河碧波荡漾。

“栏”对“门”；“游”对“塘”；“山”对“河”；“烟”对“波”，均是平对平，平仄没有相反，不合格律。上联尾字“漫”，下联尾字“漾”，同是仄声，不合尾字上联为仄、下联为平的联律。

松台山方亭联：

曲江留宴，雁塔题名；

续幽怪录，蟾宫折桂。

“曲江/留宴”与“续/幽怪录”，是上下句节律不对拍，词性不对品。“留宴”是留下参加宴会。《幽怪录》是唐代牛僧孺作的古代传奇小说集名称。此联未能做到形对意联。

飞霞落霞，朝晖夕映；
双屿孤屿，左带右引。

“映”“引”，两句尾字均为仄声。不合对联尾字上仄下平的通律。

另外，此卷中还收入一些地名联，如“八字桥八仙楼八仙聚会；四面营四营堂四营防护”等，可以作为趣味联，但句尾“会”“护”均为仄也是不合对联通律的。

常言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鹿城景点的对联竟有如此多的不合格的对联，实在是煞风景的令人遗憾的事。

对联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对”，简言之就是要对仗，不对仗就成不了对联。不要误以为上下两句字数相等就是对联。对联要求工，对联除字数相等外，还得词性相类、结构相应、节律对拍、平仄对立。对联要尽可能做到工整巧合，形对意联。不要以为对联短小，写起来不难，其实撰一副律和语顺的对联是很不容易的。不要把对联看成是小把戏，对联是一种文学品类，一副成功的对联其实就等于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

景点有对联点缀，这也是中国的特色，东方的风味。文人墨客，游山玩水，撰联抒情，妙笔生花。景点有对联，往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对联是观赏性很强的艺术，欣赏对联是游客游览时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景点有佳联，佳联与景物相互辉映，增添了景观的内涵，增加了游客的兴致，会使景物锦上添花。而且提高了景点的知名度，为风景生色，为园林增秀。反之，蹩脚的对联，对景点来说简直是锦衣贴补丁，佛头着鸟粪，既损害了景点的形象，又败坏了游客的兴致，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会贻笑大方，会让游客觉得此地缺少文化。景点挂病联，实在是煞风景的，一定要严把质量关，宁缺毋滥！

有人或许说那么顶真干什么，能“放宽联律”嘛？联律是在对联长期创作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是不可任意违反的格律。

鹿城有很好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

鹿城现今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事业，这将对鹿城的经济发展起着大大的促进作用。

从以上的十几处的对联点评，知道目前鹿城景点对联的水平是欠高的，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未能做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为此我建议鹿城文化有关部门能重视景点对联的问题，组织鹿城诗联方面的人士，对鹿城景点的对联作一次审查，对那些水平不高，不合联律的对联尽量予以撤。并请公开对社会征联，或请诗联高手重新撰联，经过评选，再请书法家挥毫，请工匠镌刻上柱。这样会使鹿城景点更加焕发光彩，更会提高使游客流连忘返，甚至思念再来的魅力。



江心寺大门对联

1166年，温州那场海溢

朱继亮

南宋乾道二年（1166）八月十七日，温州发生过历史上罕见的海溢“水满温州城洞齿”。由于强台风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和大潮水，形成温州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水灾。那天晚饭过后，一场恶梦降临温州，大水造成“浮尸蔽川，存者什一，民啖湿谷死，牛随以困踣”。人死数万，家园被毁，足见严重。永嘉场濒临东海，首当其冲，一片汪洋，浊浪凶狠，万物荡然无存。为恢复社会生产，温州传檄福建要求移民补籍，成为温州移民族群的主要来源。

古人对海啸现象的表述，曾经使用多种词语形式，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海溢”。汉代已经有关于“海溢”的明确记载。《汉书·天文志》写道：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五月，勃海水大溢。”《汉书·元帝纪》记载，第二年皇帝颁布诏书，就连续灾害表示沉痛，其中说：“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看来，这是一次因地震引起的海啸。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〇有“海溢”条，明确说：“‘海溢’一曰‘海啸’。”

《嘉靖永嘉县志》卷九《杂志·灾异篇》记载了温州多次有海溢：“晋

惠帝永平九年，海溢；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夏六月，大风雨，海溢。唐高宗显庆元年秋七月，海溢；文明元年，大水漂民居千余家。宋英宗治平二年秋八月，大水，州大灾；神宗熙宁七年秋七月，大风雨，漂毁城楼宫舍。”

《宋史》卷六十一：“（乾道）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风，海溢，漂民庐、盐场、龙朔寺，覆舟，溺死二万余人，江滨鬻酪尚七千余。”《宋史》卷六十七：“乾道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风雨驾海潮，杀人覆舟，坏庐舍。”《宋史》卷三十三：“（八月）丁亥，温州大水。”“（九月）辛亥，遣官按视温州水灾，振贫民，决系囚。”“乾道”是南宋孝宗皇帝赵昚的年号，乾道二年八月丁亥即公元1166年八月十七日（1166年9月12日）。《宋史》就记录了5起“坏庐舍，溺居民”的比较严重的“海溢”和“海潮溢”。乾道二年海溢就是其中一次，也是温州历史上海溢受灾最大的记载。

《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七《祥异·灾异篇》载：“乾道二年春，饥。二年夏，海门有蛟出水，长丈馀。既而塔头陡门吼二日，海上浮钱，有一老父识之曰：‘海将鬻人也，风潮必作矣。’至八月十七日，飓风挟雨，申酉益甚，拔木飘瓦，人立欲仆，市店、僧刹摧压相望。夜潮入城，沉浸半壁，人方上屋、升木以避，俄而屋漂木没，四望如海。四鼓风回南、潮退，浮尸蔽川，存者什一。以永嘉任洲言之，一村千馀家，家以五人为率，计五千馀人，存者才二百人，馀可类推。其居山原者，虽潮不及，亦为风雨摧坏，田禾无收。瑞安、平阳、乐清皆然。民啖湿谷死，牛随以困踣。”

《东瓯逸事汇录》卷九《军事·灾变篇》载有瑞安八水《周氏族谱·草斋公谱序》，其中有记载：“乾道丙戌八月十三夜三更，有一人在城击钹，踣叫，言是括之白云头陀僧喇哒张氏也：‘海民有难，故来报知，信吾者昌，不信吾者殃。’言曰：‘夏，海门有蛟出水丈余；既而，乐清县西塔头陡门吼二日。海上浮钱，有一老姓林讳铛，年一百九岁。此人识知，曰：‘海今将钱鬻人，风潮夹必大作矣，不日有异常凶变。若居海滨者，听吾移栖傍山，不然，遣舟浮渭可也。’嘱曰：‘十五六，不移走，母子夫妻难相守。且待天明，看吾白灰画城垣，水必至此。’”

天晓，有等凶暴数十辈团聚，遍寺观搜寻不见，此僧咸笑颠妄也。有双门杨氏员者、何氏云者、张氏月者、萧氏笃者数老辈，知有异常。至夜，按瞻天象，见红光缭绕。水带绳绳，民果有水厄之危。谕众，不听……

是月十七日申、酉时，果一声惊震，顷刻飓风挟雨，溢甚。海浪潮翻，拔木飘瓦，人立欲作摧倒。市店、公廨、民居、僧刹，夜潮入城，沉浸半壁，人方上屋升木以避，俄而屋漂，一望如海。四鼓，风回南，潮退，浮尸蔽川，存者什一。其居山原者，虽潮不及，亦为风雨摧坏。田禾无收，瑞安、平阳、乐清皆然，民啖湿谷死，牛随以困。适水果满僧画灰之处。”

《嘉靖永嘉县志》卷九《杂志·灾异篇》载：“（乾道）二年秋八月，大风雨，海溢，死者二万余人，髑髅七千余。先是有蛟出水，长丈余，塔头陡门水吼三日，海上浮钱，一父老曰：‘海将鬻人’，寻有是变。浮尸蔽川，存者什一。”民国《平阳县志》卷五十六亦载：“孝宗乾道二年丙戌八月十七日丁亥，大风雨驾海潮杀人，覆舟环庐舍，漂盐场，潮退浮尸蔽川，田禾不留一菑，无收三年。”

二

龙湾区天河街道环川王氏宗谱中，收录了王毓英撰写的《乾道二年水满温州城记》一文。据记载，宋朝南渡，乾道二年丁亥岁，杭州府钱塘县海下有一洞庭湖，湖主有一宫主适与温州经阳湖湖主名经川次子为姻，与夫不和，湖主发怒，将宫主斥逐出门看羊。

一日，在西廓谷头看龙，凡人看见一妇人看羊。独有一个生员姓柳名毅，乘船到杭州赴选，远远看见岩头看龙。毅曰：“此非凡人女也，宜往拜之。”即上船参女。礼毕，女问曰：“汝是何人？拜我何故？”毅答曰：“我乃姓柳名毅，忝是庠生，今往杭州赴选，特来谒参。”宫主曰：“汝既赴杭，我写书一封，烦送与我父母，何如？”毅答曰：“有何不可？”女遂即袖中绞纱帕一条，将指头咬破，写血书一封付与，祝曰：“我父母在钱塘江头，

洞庭湖湖主是也。我将金钗一股、犀牛角一对，与你作盘费。”

秀才即将此书并钗、犀收讫，遂拜别下船，竟到杭州江头寻取洞庭湖。不见，徘徊久之，忽见江边有一石碑，现“洞庭湖湖主”数字。毅停立在旁，思恃何人可托此书，无奈，将此犀角、金钗顺画碑上三字。忽然，海水大裂，现一马道大路。秀才随路入一里许，内有门额曰“洞庭之阴”，有大桔树，异之。又有人相引，连过三门，入殿见湖主，叩头拜见。礼毕，湖主曰：“汝是何人？来此何为？”秀才言过，即将此书奉上湖主。

湖主看讫，与夫人言曰：“女去之后，向无一音。今日见此一书，始知女在彼处受苦。”即唤长子骑黄龙，竟到温州城北经汤湖望妹。遂与妹夫相骂，两边触怒，差黄龙行风行雨，连战七日，海水大沸泛滥，满城人民，溺死已尽。幸有平水王正净光塔上射三箭，水始退下。前一个月，天落铜钱一日，众人皆拾为宝。惟有金老人，年登八十，言称乃是换人口之钱也，遂即买大树，造大篷船一只在城内。众人皆讥之曰：“城内造大船，何处出去？乃是愚人之所为也。”后果有此水以应此兆。后独留金家一姓，后人号之曰“金土地”也。温州一府，只留萧、何、张、杨四姓，瑞安只留邹、林、鲍、蔡四姓。此八姓当时在朝为官，以免死难，后返故乡，传为后裔焉。

又言柳毅被湖主留宴五日，毅求外出赴选甚切。湖主曰：“汝科场无分，我遗大珠一颗与汝，后必得进宝状元之位也。”

飓风暴雨，拔树倾屋，夜潮汹涌入城，“水满温州城洞齿”。那天晚饭过后，一场恶梦降临温州，大水造成“浮尸蔽川，存者什一，民啖湿谷死，牛随以困踣”。家园被毁，足见严重。永嘉场濒临东海，首当其冲，田地淹没，一片汪洋，浊浪凶狠，四望如海，浮尸蔽川，十不存一。万物荡然无存，许多村落自此失据，民族谱牒等文明湮没不能查考。虽然后来再行移民开发，但此前便成了断代史。

三

温州是多山的地区，有限的沿海平原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南宋温州共管辖4个县，这4个县的县城和主要集镇无不分布在沿海地带。因此，这一次灾害给温州带来极为惨重的损失。海水消退，大地一片狼籍，尸横遍野，房屋倒塌，良田被毁，白茫茫的一片。剩下不多的也走的走逃的逃，伤亡巨大，遗民甚少，原始居民几乎灭绝。

据《宋史·五行志》记载，温州沿海仅仅因翻船而溺死的人数便达2万余人，正在江边来不及逃生而死亡的也有7000余人。此外，传世的温州沿海地带的家谱中，颇多南宋乾道时村庄遭到毁灭性破坏以及灾后外来人口大量迁入的记载，显示沿海地带死亡人数也不在少数。如加上这些数字，估计全温州死亡人数或许在5万以上甚至可能达到10万。

宋·薛季宣在《浪语集》卷二四《与刘复之》一文中记述：“去岁风涛之害，虽幸以天而免，孤单之族绝者五房，亲戚故人半入鬼录，而又家乏粒食，漂泛无复遗余，妻啼儿号，日日相似，虽无佳况，然视死者将十万辈，其亦厚矣！”当时温州不过只有七八十万人口，这次灾害导致温州人口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

据老人们口传，当其时，部分永嘉场人因逃避大罗山等高处得免。据龙湾王俊海等人考证，郑岙郑姓、屿田村李姓、环一村蔡姓等为海溢后留下的姓氏。他们水退后掩埋族人重建家园，休养生息。

在龙湾区永中街道前街村峰门山，一个高约二十余米的山坡上，刻着一艘帆船，竖桅扬帆，船后有舵，长约50公分，帆船的下边还刻有“乾道二年水满到此”八个隶体字。这是永嘉场一处惟存的珍贵的水文材料。据文物部门考证，这是温州最早水文记录，记录800多年前发生在永嘉场的一场洪水，同时印证乾道二年“水满温州城门齿”的民间传说。

四

温州飓风成灾，乡人在朝者奏请赈恤。《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七祥异·灾异篇载：“时郑景望任国子监丞，率乡人在朝者告灾异，遣官循行赈恤。”《嘉靖永嘉县志》卷九杂志·灾异篇亦载：“时郑景望为国子监丞，率乡人在朝者奏闻，诏遣官赈恤。”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学者称敷文先生，谥文肃，永嘉城区（今鹿城区）人。德行夙著，邃于经学，与薛季宣并以学行知名。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乾道二年（1166），任国子监丞。

《宋会要辑稿》瑞异三之七载：唐豫（度支郎中）乾道二年十一月六日有《乞减温州被水去处当年苗税奏》载：“被旨前去温州存抚赈恤被水去处。窃见温州四县并皆边海，今来人户田亩尽被海水冲荡，咸卤浸入土脉，未可耕种。兼今次水灾之后损失人口不少，又虑人力不足及阙少牛具，不能遍耕，难令虚认苗税。”

食货五八之四载：宋孝宗于乾道二年九月七日有《令宋藻（浙东提举常平）往温州赈济被水阙食人户诏》。瑞异三之七载：九月十一日有《令唐豫等具温州合赈恤事件闻奏诏》。食货六八之一二六载：乾道二年十月一日有《宽恤温州诏》：“温州近被大风驾潮，湔死户口，推倒屋舍，失坏官物，其灾异常，合行宽恤。”

食货六三之二七载：乾道三年四月十八日有《销欠温州逃移死绝人丁所纳绢诏》：“温州永嘉、平阳、瑞安、乐清四县逃移、死绝人丁共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丁，每丁纳绢三尺四寸，共计一千二百五十七匹二丈三尺，并行销欠。”

食货六三之二八载：乾道三年九月十七日又有《蠲免温州经总制钱二分诏》。食货六三之三〇载：乾道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有《蠲温州民户欠赋诏》。食货六六之一载：乾道七年二月八日有《放免温州下户合纳身丁绢诏》。

《宋史·食货六八·赈贷》载，乾道二年十月一日诏：温州近被大风驾潮，淹死户口，排倒屋舍，失坏官物，其灾异常，合行宽恤，可令度支郎中唐

豫同提举常平宋藻、知州刘孝黻共议，参酌措置，条具闻奏。仍令内藏库支降钱二万贯，付温州专充修筑塘埭斗门使用，疾速如法修整，不得灭裂。

灾后，各地相继修海堤、建陡门。淳熙十一年（1184）、十二年（1185）完工的瑞安石冈、平阳沙塘陡门，以石更造，最为著名。宋郡守杨简修建瞿屿陡门（今下陡门）横塘。淳熙四年（1177）温州知州韩彦直募民工13000人开浚州城河道，一坊一渠，舟楫毕达。据《弘治温州府志》、王叔杲《重修蒲州海塘记》载：“蒲州埭，与朱浹埭接，地形低下，诸乡水之所钟。宋乾道丙戌（1166），大水冲激，二埭扫迹。已而，八月风潮，塘岸俱毁，直抵官路，膺符、德政、吹台三乡居民协力再筑。”

在今龙湾区瑶溪街道龙湾村西北浦口有龙湾陡门，俗称蛎壳斗门，据传因建在一块遍生蛎壳的巨石上而名。东西走向，始建于南宋乾道水灾前。据《弘治温州府志》卷五水利篇载：“在四都乐湾山趾，宋乾道丙戌（1166）海溢，亭四间俱圯。刘守孝黻再作。嘉定二年（1209）火。议仿乐清盘屿斗门于里河浅处立水闸，未果。丙戌（宝庆二年，1226）筑大埭。”

五

海溢后，温州人口大为减少，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社会生产，温州知州传檄福建要求移民补籍。福建东北部尤其是长溪县（即今霞浦县）的人民纷纷迁入垦殖。福建移民大量迁入，增补了温州户籍，提供了大批劳动人口，并成为温州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说，当时温州郡新太守姓侯，其年带四子家眷一同来到瑞安湖岭山背歇雨，遇洪水湮没四县人民，俱死完尽。待水退时，到府登任，见尸如蚁，目不可观。太守是福建人，见四县无人补住，议将自四男分落各县，一边申文察院，动本批发福建赤岸人民补各县居住。遂将长男分落永嘉城内居住，次男分落乐清蒲歧居住，三男分落瑞安十七都居住，四男分落平阳三都章岙居住。有此侯太守四男分落永、乐、瑞、平四县居住，传为后裔焉。

宋代以来，温州籍人士文集中有关自己祖先迁移的资料，相当一部分人自福建迁入，迁入时间最早在唐末五代，宋代迁入的福建移民占相当部分，分布在北从玉环、南到平阳的各县。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民族志》中提到近代温州主要氏族的来源，据此资料统计共得宋代迁入温州 43 族，35 族来自福建，占总数的 80%。换言之，即宋代温州外来居民的大多数来自福建。宋代福建人民移民温州的高潮，发生在乾道二年以后的数年间。

福建等外籍先民渐次迁徙过来，他们聚族成村，繁衍生息。从永嘉场内一些氏族宗谱可以了解移民史的概貌。属于这段时间迁入永嘉场的姓氏，如海滨街道沙北村周姓，永中街道镇南村陈宅浹陈姓、朱垟村朱姓、双何村金姓、新河村邹姓、上京村潘姓，瑶溪街道南山村倪姓等三十多个姓氏，他们在永嘉场长期定居，并延续至今。

状元街道横街村夏姓先祖自福建赤岸徙永嘉场黄石山北（即今瑶溪街道黄石村，今已无夏姓居住），宋乾道二年水患后，大宗祠被冲没，子孙散居各地。其间有夏长者，字得中，于元至正年间（1341-1370）由四都山北（今瑶溪街道黄石村山北）迁六都新建之莲潭（今状元街道横街村埭头）居住。

天河街道环川王氏迁始祖王绿，字伯岳，行百十三。世居闽长溪赤岸太原井后野龙原（今福建霞浦县松城街道桥头村）。宋孝宗乾道二年丙戌（1166），温江海溢，湮没民居，靡有孑遗。新侯郡主，闽海人，奉旨移文福建，召人补籍。王绿择迁于永嘉场一都携仁里马园居住。瑶溪街道南山村倪姓，于宋嘉定年间（1208-1224）由乐长林客于金华后迁永嘉五都南山，改地名为倪家岙。

灾害过后，沿海地带人口剧减，房屋倒塌，良田被毁，许多生气勃勃的村庄变为死寂的废墟。在这种背景下，人多地少的福建东北部沿海的人民纷纷迁入温州沿海平原垦殖。今天，温州沿海各县人们的许多家谱中，都提到自己的老祖宗在南宋乾道二年以后从福建迁入温州垦种，也正是出于上述背景。

《先妻薛氏孺人圻志》释读

王剑峰

2020年3月18日，因项目施工，于永中街道上湾村洽桥意外发现明代墓葬圻记，即英桥王氏四派七世溪桥翁王钺曾孙妇、八世仁山翁王沛翁孙妇、九世后桥翁王叔本冢妇、十世王光蕙之妻室的《薛氏孺人圻记》，包括1件“墓表”、1件“篆额”、1件“圻志”。该“圻志”石质精良，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明确记载了墓主乃“郡城墨池王氏”光蕙之先妻薛氏。英桥王氏乃明清龙湾官宦文化世族；至王叔本及其子光蕙，据《记》已迁居“郡城墨池”坊，亦印证了英桥王氏“门当户对”的联姻族约和子弟“孜孜向学”的世泽遗德。

而薛氏乃“世居郡城之仓后里，裔出宋尚书端明殿学士薛公叔似后，代为名臣。”郡城薛氏是宋时温州显宦。据嘉靖、光绪《永嘉县志》：“薛叔似，字象先，薛弼族子。”“其先河东人，后徙永嘉。”薛弼曾担任“湖南运判”，协助岳飞征伐杨么筹饷；秦桧“居永嘉，弼游其门。”薛氏多贤，薛季宣是薛弼的世侄；另有薛嘉言、薛微言和薛绍等，均一时之望。据《双屿街道志》“艺文”篇，有“薛叔似墓碑志”。其墓地在稽师村。当地称原墓葬为石马坦，规模宏大。今尚存墓碑1件，石狮1件。薛叔似《宋史》有传。从“圻志”可以证实薛氏乃“世居郡城之仓后里”。

今特为标点、释读，以飨同仁。原圻志仍依繁体字照录。相关注释以能通读概览为要，不做过多繁琐考证。

先妻薛氏孺人墳誌^①

嗚呼！此余亡室薛孺人^②墳室也，余忍誌乎哉！顧^③懿德淑行，不以夭亡，泯泯泣淚^④，書行略並世序^⑤之詳，藏之幽志^⑥，不忘也。

孺人姓薛氏，余曾大父右通政溪橋翁之曾孫婦，大父太僕寺丞仁山翁之孫婦，家大人光祿寺署丞後橋翁之冢婦，而余光蕙^⑦之室也。世居郡城之倉後里，裔出宋尚書端明殿學士薛公叔似^⑧後，代為名臣。曾大父諱寧，封按察司經歷；曾大母項氏，贈太孺人。大父諱翰山，山東沂州同知；大母張氏，封孺人。（父）騰蛟，南京兵馬司吏目^⑨；母吳氏，以嘉靖庚戌七月廿三日生孺人。為人柔嫻^⑩靜莊，進退容止，皆有儀度。事父母孝，視弟及女友愛。年二十有二歸余王門，尤執婦道。事舅姑^⑪如其父母，視諸姑^⑫若諸叔氏，如其兄弟；遇內外屬，尊卑長幼，下至僮俾，無不當於禮而恩稱^⑬之。故與之處者，皆愛；哭之死者，皆哀。家大人^⑭致官家食，母夫人張素孳病^⑮，孺人待飲膳藥餌，未嘗須臾^⑯去其側。余為郡博士弟子，頗刻志於學，去家假館讀書去不歸者累數月，歸後輒去^⑰，孺人略無慍^⑱意，孜孜勉學，無倦也。體素羸，帶病室^⑲余，僅五年，生二女，幼未字^⑳，繼又生子不育，竟以是成疾弗起。時萬曆乙亥十月十三日也，距生年僅二十有六。卒之明年^㉑十二月丁亥^㉒，葬於五都茅竹山原，從寺丞公之^㉓也。

嗚呼！音容渺矣，令儀^㉔如在。何天厚其德而夭其年，遺以相余而奪之速！余不知其所以，又不知其哭之慟^㉕也。粗述梗概，尚冀立言，君子采^㉖焉。

萬曆四年^㉗冬十二月丁亥日 夫王光蕙泣誌

注释如下：

①此《先妻薛氏孺人圹志》，于2020年3月18日上午在温州市龙湾区上湾村出土，墓地坐落今洽桥附近杨府庙正对面。为确认墓主与具体身份，英桥王氏后裔暂先予起其圹志，后复置埋原厝墓地，以保持墓葬原貌。该圹志原石保存完好。长约75cm、宽约50cm、厚约9cm。一起发现的，还有“明郡城墨池王氏之墓”墓表1件；“明故冢妇薛氏圹记”篆铭1件，并附记“明万历八年庚辰岁九月三日庚年改厝于五都上奥之原即今地也”，即曰改厝墓地为当时五都上奥。这里“先妻”，指丈夫对亡故妻子的尊称，即薛氏孺人。所谓“圹志”，一般是与墓主人一起埋葬于地下的铭文，主要概述墓主人生卒与生平履历，按照明朝丧葬规制，五品以上许用碑（墓志铭），六品以下许用圹志。薛氏孺人（1550-1576），即永嘉场英桥王氏十世四派祖王光蕙之冢妻，世居温州郡城仓后里，裔出宋名臣尚书端明殿学士薛叔似。据当地村民反映，此墓葬应是王叔本子孙墓群，规模庞大，原占地可逾两亩有余。据《英桥王氏宗谱》：“王叔本，字立德，号后桥，行庆。郡庠生，升光禄寺署丞。高寿六十六，娶张氏。”“子四：光蕙、光阴、光著、光范。”

②室，妻子。亡室，即亡妻。孺人，明清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封孺人。这里指王光蕙先妻，封孺人。

③顾，（书面语）但是。

④方生者曰亡。夭亡，指夭折，英年早逝。拭泪，拭泪，擦眼泪。谢灵运《折杨柳行》：“妻妾牵衣袂，拭泪沾怀抱。”

⑤世序，指（薛氏）历代世系排序。

⑥幽志，即此墓志铭。

⑦光蕙，系王叔本长子。据《英桥王氏宗谱》：“字季芳，号文河，行荣。郡庠生。娶郡城薛氏；续瑞安店下林氏。”“子志侃，字昭毅，号逸国。庠生。”

⑧薛叔似（1141—1221），南宋名臣，《宋史》有传。字象先，其先河东人，后徙永嘉。永嘉城内（今温州鹿城区）人。薛季宣从侄。南宋乾道八年（1172）进士，论事劾首相王淮去位。一度任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嘉定十四年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恭翼。雅慕朱熹，穷道德性命之旨，谈天文、地理、钟律、象数之学，有稿二十卷。

⑨曾大父薛宁，封按察司经历；大父薛翰山，任山东沂州同知；（父）腾蛟，任南京兵馬司吏目。均为明代官制及其任命职名。

⑩ 嫀，yì 四声，性情和善可亲。

⑪ 舅姑，古人称公婆为舅姑，即“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尔雅·释亲》）

⑫ 诸姑，这里的“姑”，为衍义，可引申为“丈夫的姐妹”；亦可有“父亲的姐妹”意思。《尔雅》：“父之姊妹为姑。”诸姑，可称；凡夫家的姑嫂、姐妹皆如同对待叔、兄敬重。

⑬ 恩称之故，尤“恩故”“恩旧”。亦指“旧交”。

⑭ 家大人，指对他人称自己的父亲。这里指夫家王光蕙之父王叔本（1524—1589），号后桥，以父王沛抗倭死难，荫入太学，补鸿胪寺主簿，擢光禄寺丞。致仕归，与王叔果同居林下，诗文自娱。著有《二雁纪游诗草》。

⑮ 彡病，彡，古同“多”。彡病，即多病。

⑯ 更，指轮流、更换的意思。

⑰ 去，此两句有三个“去”。第一个“去”，指“离开”；第二个“去”，指间隔时间的“距离”；第三个“去”，亦指“离开”。

⑱ 愠，含怒、怨恨。

⑲ 室，作动词，以嫁人作妻室解。

⑳ 字，（书面语）许配。

㉑ 明年，第二年，即万历四年。

㉒ 丁亥，指“丁亥日”。

㉓ 寺丞公，指仁山公王沛（1485—1558），朝廷封赠为太仆寺丞。温州博物馆藏有明世宗赠太仆寺丞王沛救命原件。兆，莹域，即安厝之地。

㉔ 令仪，指美好的仪容、风范。

㉕ 恸，极度悲哀。

㉖ 采，指采录、采集。

㉗（明）万历四年，1576年。薛氏孺人生于1550年，亡于1576年，享年26岁。哀哉英年早逝！王光蕙何不哭之恸也，泣志铭文。

责任编辑：王剑峰

诗图九山

黄兴龙 诗 / 摄

鹿城山川秀丽，古迹众多。据《天下名胜志》载：星罗棋布市区的九座小山，其形势是“华盖、松台、郭公、海坛为斗魁；积谷、巽吉、仁王为斗柄；黄土、灵官为辅弼。”东晋开始，鹿城古城墙就从郭公、海坛、华盖、积谷、松台逶迤跨山而过。

华盖山

飞升之地喜登攀，太玉洞天资福山。

丹井灵泉涵碧玉，大观亭里悟休闲。

华盖山，以遥望如“华盖”得名。因位于古城正东，又名东山。此山平面面积 13.2 万平方米，主峰海拔 56.8 米，素有“九斗山”斗魁之称谓。山上资福道院始建于晋，宋徽宗赐号“金门羽客”的温州名道士林灵素曾筑室于此，称通真庵。宋高宗赵构来温时改名为资福寺，故华盖山又名资福山。明嘉靖《永嘉县志》载，华盖山因黄帝时的容成子于此飞升，故称其“容成太玉洞天”。明弘治《温州府志》谓这里有石龟池、玄妙观、青牛坞、老松泉、孔庙、真华观等，今均已湮没。2009 年，资福道院重建。山顶大观亭亦名江山一揽亭、吸江亭，系温州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亭。华盖

山现在还有玉华亭、龙头庵、蒙泉（又名砚瓦槽）、东瓯王庙、丹井、温州古城墙遗址、却金亭、吉林义士王希天烈士纪念碑、工农兵塑像、华盖山绿地景观公园、红日亭等景点。



鹿城古城墙

松台山

净光宝塔济陀钟，宿觉名山举世从。

证道求真光始现，仙人井水饮须恭。

松台山又名净光山，位于温州古城西面，东西走向，平面面积9万平方米，最高点36.36米。因其昔日山上广植青松，山顶又平坦如台而得名。唐代著名高僧宿觉大师（665～713）圆寂后卜葬于此。山上建有宿觉大师真身塔，唐僖宗敕建净光寺。宋太宗恩赐上书“宿觉名山”四字匾额。南宋建炎四年（1130），高宗驻蹕温州时，曾以净光寺为都堂。山坪有冰壶道院、仙人井和女贞亭。历代多名人诗词题咏。山南麓有始建于唐、

盛于宋，现为温州市佛教协会所在地的妙果寺。寺内有传说奇特的“济陀钟”（俗称猪头钟）。寺西侧现为明嘉靖皇帝为大学士张璁所建的碑亭，内竖有汉白玉御碑三座。中为御诗碑，并刻有张璁像。左右分别是嘉靖为张璁亲笔所书的“孚敬”“茂恭”名字碑，其上各有“广运之宝”玺文，及仿刻“御笔”“嘉靖”两圆形图章。该碑是温州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古碑刻。山西麓为风光旖旌的九山河。



松台山八角井与净光塔

郭公山

相传郭璞卜瓯城，白鹿衔花欢乐鸣。

富览群山如列宿，吉祥富贵永升平。

郭公山，又名西郭山。高 17.2 米。突兀于温州旧城西北隅的瓯江之滨，惊涛拍岸，江流有声。东晋太宁元年（323），永嘉（温州）建郡城时，相传郭璞曾登此山察看地形，故名此山为郭公山。从金沙岭拾级而上，山

巅昔有富览亭，相传亭额为书圣王羲之所书。该山现有最胜禅寺、郭公井、郭璞塑像、陈府道观等胜迹。号称“温州外滩”的望江路途经郭公山麓，向西直抵瓯江三桥。拾级而上，山顶有造型精美的富览亭及“郭璞建城”大型花岗岩浮雕。



郭公山富览亭

海坛山

江滨雄峙报恩山，白鹿郭仙天宁环。

俯瞰潮流东逝水，尊贤礼适此登攀。

海坛山，又名报恩山，坐落华盖山北面，两山仅隔康乐坊一条街。海坛山北濒瓯江、东临护城河（今环城东路址），山麓有水门头、安澜亭、陡门头、涨桥头等船埠头，人们也称其“上岸山”。山平面面积 13.5 万平方米，高 32.5 米。历史上著名古迹有晋代的白鹿庵、郭仙庵，梁代的悟真道院，唐代的嘉福寺、海神庙、杨府庙，宋代的天宁寺，明代的五灵庙。

现山上建有山原道观、国际海员俱乐部、爱民模范赵尔春烈士塑像以及纪念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的礼适亭。位于海坛山支阜慈山的叶适墓，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高环顾，瓯江南北富有时代气息的高楼大厦直入霄汉。极目远眺，江曳白练，群山叠翠，宛如一幅江山胜揽图。



海坛山山元道观

积谷山

常闻积谷有神灵，千古池塘春草青。

天设九山如北斗，君当斗柄耀魁星。

积谷山，又名飞霞山，位于温州中山公园南部。高38.7米，平面面积1.2万平方米，因其山形高峻如圆廩得名。这里有池上楼、小赤壁、月带桥、义井、谢客岩、升仙台、古樟、留云亭、泐泉等。历史上城墙跨山而过，有东山书院、王谢祠、飞霞观、卧树楼等建筑。山西麓谢池，据说系我国山水诗鼻祖、

永嘉郡太守谢灵运开凿。其《登池上楼》诗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乃千古之名句。穿小石门，过东山书院遗址东南行数百步，即可到飞霞洞。积谷山被誉为“山之胜甲一郡”。清代诗人曾儒璋说这里有飞霞春晓、池塘春草、山楼夜雨、赤壁夕照、碧波秋月、蓼岸归鸿、带桥残雪、雪亭松涛八景。



积谷山下池上楼

巽吉山

山巅塔影顶尖尖，骖鹤飞仙白玉蟾。

郑氏雄兵曾驻此，风云突变震雷添。

巽吉山，又名巽山，雄踞温州府城东南，按八卦排列，正是“取义吉祥”的巽位。山顶巽山塔始建于宋，1974年倒塌，2004年重建。塔旁有骖鹤亭，相传北宋道士白玉蟾曾驻鹤于此。清康熙年间，郑成功大军围攻温州城，

他与部将在塔侧饮酒议事，忽天降大雨，一迅雷劈死其身边士兵。众皆大惊。次日即挥师离温进军舟山。



巽吉山驂鹤亭

仁王山

灰飞烟灭巨声隆，东屿风光转眼空。
棋布星罗无斗尾，毁山建厂理难通。

仁王山，又名东屿，被列为温州“九斗山”的斗柄之尾。该山原位于今三板桥（飞霞南路5号）的温州东屿发电厂内。高十余米，旁有小阜名湖屿，遥对古代温州府大衙门（今人民广场址）。此山在建电厂时炸毁。温州旧城改建前，人们在府前街南眺，还可看到东屿发电厂。



现东屿发电厂所处位置，系仁王山遗址

黄土山

当年此地有山丘，威武雄狮好戏球。

黄土填河城改造，星辰殒落岂無愁。

黄土山，又名狮子山，原位于今马鞍池东路与山前街东侧的转弯处。据当地父老介绍，此山高约 20 米，犹如一头威武雄狮，注视着它与巽山之间一个天然的球形小丘，人们称之为“狮子捧球”。黄土山的山前、山后过去均有陡门。山前陡门系南宋温州太守赵不群所筑，以调节城外南塘之水。1952 年，黄土山的泥石大都被运往百里东、西路填塞百里坊河，仅余山前街 300 号门牌处一个数米高小丘。1989 年，地方人就在该遗迹上建

成亭台楼阁，并美其名曰“卖麻桥老人文明乐园”。2006年，在旧城改造中黄土山再次遭到铲除，从此在温州的地标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马鞍池东路与山前街东侧的转弯处，就是黄土山旧址

灵官山

奇哉院内耸圆丘，花木葱茏玄妙求。

羽客通真栖息地，众安亭上可登游。

灵官山，原名覆釜山，位于今吴桥路37号温州电业局高压修试工区的大院内。山高10余米。因其距东屿仅0.3公里，故人们又称之为西屿。灵官山因北宋名道士林灵素葬此而得名。此人初学佛，后学道，以方术得幸于宋徽宗赵佶，赐号通真达灵先生、金门羽客、玄妙先生。宣和元年（1119）贬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当年病死。现在的灵官山，虽然小巧玲珑，但

经过西屿电厂的精心策划，石磴通幽，花木葱茏。1996年，还在山顶造了一座六角形、上铺橘红色琉璃瓦的众安亭。



灵官山上的众安亭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

康宁巷的往日时光

贾振葵

康宁巷，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如蛇游鳞走。窄窄的巷弄里，两三层民宅，高高低低，鳞次栉比，沿巷道而延伸。康宁巷，给人一种宁静祥和以致远的印象。的确，小巷里的左邻右舍都比较和睦，少见纷争。

我的家，曾在小巷里安顿过。一间九平方米的阁楼，挤着我们一家三口。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眠，洗洗涮涮，无不在这阁楼里兜兜转转。一年复四季，感受着日月轮替的斗转星移。阁楼的窗口很小也很矮，伸手就能摸到檩条。凹形的汉瓦一片压着一片，片片相交错。灰黑的瓦背，藏着历史之悠久。所谓的墙壁，是薄薄的板壁，甚至不敢钉钉子。这头钉，那头出。邻居家的一声喊，只有立即拔钉停锤。象极了老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里的生活场景。春雨连绵时节，雨打汉瓦，噗滴声声如诉如泣。夏天炎热如炙，大人孩子汗如雨下。秋季台风吹过屋顶，风声鹤唳，令人胆战心惊，只怕小阁楼会被台风所破。此时，难免会想起诗人杜甫来。直到台风过去，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寒冬腊月，板壁缝丝丝透风。小阁楼寒冷与天地同。地板缝隙如人老齿疏。小儿正玩耍的一枚硬币，骨碌碌掉进了地板缝里，转眼就摔到了楼下。楼下是邻居，邻居家门关着。小儿的硬币无法取回，因此不高兴了一整天。夜晚，躺在床上，辗转未眠的时候，抬望眼，藏在瓦片缝里的月光，便悄悄地洒下。虽不是举头望明月，

低头且见星星点点疑似薄霜在地板上游游荡荡。

小巷离人民广场很近。每天晨曦微露时，无论春夏秋冬，喜欢晨练的人的脚步，就象鹿之奔跑声惊醒小巷的睡梦，脚步声声奔向人民广场。偌大的人民广场，练各种把式的都有，踢足球的、打篮球的，那羽毛球呼呼带着风声；跑步的快、太极拳的慢、跳绳的步步紧；也有不紧不慢走两步的，也有练举重练哑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喜好，互为交融，互为较劲，彰显着自我精彩的那份精气神。每天早上，人民广场都是老城区最热闹的地方。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晨练的人们纷纷回到小巷，擦把汗，准备去上班。此时的人民广场才慢慢回归沉静，空荡荡的。八点钟之后，又换作另一番场景。

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气，低矮的小阁楼酷暑难耐。无论什么东西，摸上去都感到热乎乎的，象刚蒸过的一样。热的人们无处遁形，邻人笑侃，真想爬到河里不回家了。这话不错，华大利与康宁巷相望的一带，其间原有一道前桥，桥下流水潺潺，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小河带来习习凉风，解了不少暑气。人们喜欢在河边乘凉。后来小河填了，小桥拆了，变成通衢大道。老的市人民政府就在大道旁，与小巷隔路相望。广场路成了商贾云集之地，繁华无比。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的无处藏身的左邻右里，便会念起小河小桥的好来。一到傍晚，赤膊的男人们，穿着大裤衩，拎一桶清水，站在自家门口或巷道边冲凉沐浴，从头浇到脚。有人吹着口哨，那一份冲凉的惬意与欢快，永远是男人们的专属。日头西落。晚饭前，女人们会在门口或道坦上地面上泼洒些清水，消消暑气，然后摆放一张小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讲讲念念，吃一顿乘凉晚餐。最热闹的是康宁巷孩童们，吃饱饭，小巷里就是他们玩耍的天堂，捉迷藏的，躲在墙角的暗处。玩木头人的，大声喊着“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谁先动了或者谁先开声说话了，谁就算输了。童声歌谣如铜铃儿响。孩童们你追我赶，跑来跑去带来丝丝凉风。大人们，则搬出旧的发了红的竹椅、躺椅，用凉水细细揩净，削减酷暑带来的热度，使竹椅尽快凉爽下来。然后摇着大蒲扇，

坐着的半靠着的，凑在一起谈天说地。说着听着，道听途说的各种趣事乐事，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说到乐处，笑声喷起。风渐起，小巷微风徐来，有的乘凉人就慢慢打起瞌睡来。这时候，藏在砖缝里虫声啾啾叽叽。伴着虫声，女人凑在一起，叽哩哇啦，笑声语声不断，有拿手遮嘴的有手拿扇子拍大腿的，高兴的前仰后合。被吵醒的男人忧忧的说：古话讲，三个老娘客，赛过一群鸭，这话没有讲错。起身回家睡觉去了。只剩下女人的笑声在巷弄里飘过。

远远的，一声声敲梆，犹如韩信点兵之鼓，是馄饨担。每当夜晚十时左右，馄饨担的敲梆声准时在小巷里响起。梆声从广场路那头响起，笃、笃、笃，越来越近。汽灯的光摇晃着。这个时间点，正是馄饨最好卖的时候，嬉戏的孩童跑饿了，苦夏的人，此间也开始有了点食欲。有几个邻居家人拿着碗，去买馄饨。我也是闲饥难忍，拿着碗下楼买馄饨。前面已有几个人了。我等着。卖馄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伯。一头是圆筒似的炉子，木柴噼啪作响，炉火正旺。被柴火熏的黑不溜秋的铁锅，里面倒满了清水。不一会儿，锅里的水已经响边，滋滋地冒着热气。老伯把几个人的碗拿过去，放在馄饨担另一头的小案板上，一一摆好，依次放入紫菜、炊虾、榨菜末、鸡蛋丝，点入猪油。老伯拿起一个长柄的大铁勺，从锅里舀一勺开水倒入碗里，放入葱花，香味扑鼻而来。借着路灯的微光，开始下馄饨，随手从案板下的盆里抓起一把红根绿叶的菠菜，放进锅里烫一下捞出，分到每个人的碗里。细看，菠菜盆下扣着半桶清水，可以随时舀一勺水，添加到沸腾的锅里。长柄大铁勺的优势由此可见。一把破了边的大蒲扇，象是从济公和尚那里借的，随意地插在杂柴的缝隙中。馄饨担，一头担的是水，一头担起的是火。谁说水火不相容？水与火，用其相融之道，组成了人世间千年不断的烟火，养活了世世代代的饮食男女。看似简陋的一副馄饨担，启示着丰富的人生哲思。那个笃笃发声的竹梆，大约有我的两拃长，固定在馄饨担的架子上，中空，雕了一开口。老伯的竹梆红润光泽，看样子，是有些年头了。老伯伴着竹梆，走街串巷，馄饨担从这边巷口出去，正好

是热闹的府前街。笃笃的梆声，传到很远，很远……特有的中空灵动的声音，一下一下，直敲到小巷人心思古，话题离不开当年初。当祖母的，把热气腾腾的馄饨端着，边吹边喂着小孙子。嘴里念念有词：馄饨汤喝眼光……馄饨肉配白粥……那是一首流传了百世的温州童谣。一副水火交融的馄饨担，一首满满述说馄饨之美味的童谣，相互印证着它们的历史多么悠远绵长。小巷啊，在笃笃的梆声衬托下，越发显得宁静祥和。

腊月天，十二月，正是晒酱油肉的时节。1980年左右，计划票上的肉是不经得晒的。温州人的习俗，过年酱油肉是不能少的。那可是酒席上的寓意十全十美的十个盘头之一，是红红的高脚碗里的重头菜。小巷人家早就忙了起来。有亲戚在乡下的，乘着休息日跑到乡下去买些猪肉、鸡鸭等，也有乡下客送来的，自然舍不得吃，都早早的用心腌渍好，晾晒干，留到过年时好待客。这个时候的人家窗外、屋檐下，总有酱油肉列队，几只酱油鸡、几只酱油鸭相拥，都在阳光下闪着酱过才有的闪闪油光，预告着年景有几多好。那些酱味，只有分岁酒新年酒上才有得吃，一年到头了才有吃。小孩子只能眼巴巴地望着，过两天，问一声：年到了没？盼年，好吃的好看的好穿的好嬉的，是孩童最大的幸福。正当小巷人家欢欢喜喜忙年，却传来酱油肉被盗的案件，好像还不止一处。当年，酱油肉何等金贵！如此过年的珍肴被盗，这可是大事！市井人心都被这起案件扰乱了，人心惶惶，生怕自家的那点酱油肉也被小偷惦记上了，这年可怎么过？最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酱油肉被盗的人家，竟然还收到了小偷塞进门缝里的纸条，大意是说：酱油肉味道很好，只是咸了点，下次再晒的时候，盐要少放点。如此这般。好个贼大胆，偷吃了人家的酱油肉，还去激撩人家！此案件全市都传的沸沸扬扬，家喻户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之后，民警几经蹲守，抓住了几个专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着带钩的长竹竿，去偷人家窗外屋檐下酱油肉的盗贼。人心终归于平静。

正月初一，小巷人家争打百子炮，抢头响，意寓“开门红”，日子越过越红火。鞭炮噼哩啪啦的响声带着新年的喜气连续不断，遍地红炮衣尤

如地毯，脚下绵软。连续不断的烟雾，缭绕透着祈福的红红的对联，模糊又清晰，恍如仙境。小巷弄里，邻居们开门见面，笑容满面，互道一声“新年好！”是啊，新年好！新的一年又匆匆忙忙地赶来了。



旧时的康宁巷

书法探讨七则

浮石

一、现代书法精神

何谓现代书法精神？大抵是指现代书法的灵魂或价值何在吧！我们都知道，中国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承载着传播中华文明、教化世人并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等客观使命。所谓客观，即并非指书法一出现，就具备这些作用。书法同语言一样，一直来主要的功能只是传递交流信息，仅是一种载体。从远古、先秦直到唐代，很长的历史时期来，不存在“书法家”之独立职称，文字只是官宦文人们公文或诗书传递的表达形式。代代相传，其中的皎皎者才被后人尊称为书圣、书法家，成为一家之专长，如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等。有宋以后，专门从事书法（或以书法为主业）的名人才多了起来，如米芾、赵孟頫、郑板桥等，书法由实用走向了专门艺术。

现代书法理应继承先贤们这份宝贵的遗产，并将之发扬光大。但前些年书法界也被铜臭污染了，只认方孔兄，不认“真善美”。更有甚者一些文痞自以为会写几个字，就招摇过市，或胡乱涂抹，或追求怪异，或骗吃骗喝，搞得书坛乌烟瘴气。这当然是背离了书法的宗旨。

有朋友把书法精神理解为仅在“手帐”上体现，这是片面的。其实书

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手帐”只是基中之一。据说“手帐”是日本人的称谓，通常指的是手札。即我们习惯所说的书信、便笺、手谕之类。这里面自然也应当体现现代书法的精神。但把书法精神仅仅局限于手札中，显然是不恰当的。两者是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二、书法的道和技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道与技之分。道，一般泛指经世理国之大道。技，则是指各种技能。而要将技能掌握好，也得有理论和方法作指导，这便是小道了。

书法长期来主要作为一门工具存在，是一种表达和传递信息的技能。逐渐地因涌现出王羲之、颜真卿等大批优秀书家，他们的作品准确完美地表达中华文化的精髓，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不仅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赏识，而且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书法也由“末技”登上了大雅之堂。尽管如此，书法理论仍属于指导习书者的“小道”，而不可能成为经世治国、改变人们道统观念的大道。

书法理论对指导人们正确书写、提高欣赏和鉴别能力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但习书者万不可迷恋其中而不能自拔。一个人即便书法理论讲得头头是道，而写出的字却让人喷饭，那么很难使人信服你是个懂书法的人。

曾听得一位书法界朋友讲过：书法技巧不要把它讲得神乎其神，高不可攀的样子。其实很简单：起笔、行笔、收笔。记住这三个要点，字就写好了。起笔，一般是按；行笔是稍提后平（竖）移动；收笔再按，或出锋或逆回。横竖折勾，任何一个笔画，都离不开这三个基本动作。掌握了，字也就写好了。

当然，这只是讲写好某个字的基本要求。如以整体来说，还要注意结体、行气、章法等。有关书法理论的书籍汗牛充栋，懂得一些是需要的，但也不必太多。如孙过庭的《书谱》等重要书法理论还是要学习的。后世很多书论，一是因袭相抄多，二是个人体会局部经验多，难以为每个人所用。

三、关于笔的选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初学书法者来说，选好毛笔是必需的。选笔宜注意以下几项：

1、按写字大小需要选笔。一般写大楷字用大、中号笔，写小楷用小号笔。粗大的斗笔初学者一般用不上。

2、按所学书体选笔。笔分羊毫、狼毫、鼠毫、兼毫等。羊毫较柔软，狼毫、鼠毫较硬扎，兼毫在两者之间。写硬字（如魏碑），用软毫笔；写柔字（如篆书）用硬毫笔。一般写正楷，选用羊毫和兼毫均可。

3、按手的大小使用自如选笔。手大的，宜选笔杆稍粗些的笔，手小的选笔杆稍细些的笔，以捏在手里转动自如舒适为宜。笔杆不论粗细，均应直挺、上下匀称。

4、按个人喜好选笔。依毫之长短，笔分长锋、短锋。长锋吸墨多，蘸一次墨字写得多，用侧锋行笔，着墨粗壮，但难把控；短锋较易把控，但吸墨少，侧锋时着墨面小。

5、选笔时，可通过转动毛笔，仔细观察笔头的毛是否整齐均匀地收拢到笔尖，中间有无鼓起和毛粗细不一的现象。如有，表明书写时笔头易散，难裹拢，妨碍中锋行笔，因此不宜取用。

四、关于书法用纸

要回答宣纸厚薄对书画的影响，首先需要了解宣纸的性能。据向经营书画用品的朋友了解，现在市面上销售的宣纸有上百种。如果依照不同参数指标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下面结合各类宣纸的特性及个人体验，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1、从原料配比看，大家知道宣纸主要的原材料是檀皮，再辅以其他棉质纤维。檀皮具有纤维韧性好、渗透力强、经得起摩擦等特点。因此檀

皮含量的多少，决定了宣纸的主要特性。檀皮含量在 40% 以下为棉宣，渗透力弱，适合于写字；含檀 60% 为净皮，书画皆宜；含檀 80% 以上为特皮，适宜于画画，尤其是画写意山水。

2、从宣纸的后加工看，分生宣和熟宣。生宣是焙烘干后，经裁整后即直接可用的纸。渗透性相对较好，适合于写书法中、大楷作品及写意国画。熟宣是经过矾浸泡处理后再烘干为纸成品。渗透性较弱，纸质较密致，适合于写小楷及画工笔画。

3、从宣纸的厚薄来看，有单宣和夹（双）宣之分。不同质材和加工处理的宣纸均可有单、双宣的区别。单宣薄一些，渗透性较好（熟宣除外），但耐磨性差些。双宣厚些，耐磨。其中双宣棉纸，着墨后，墨色浓郁，写字效果较好。

4、从宣纸的制成品看，有净白的、烫金的、硃红的以及各种颜色涂层的。一般不同质材及厚薄的宣纸均可加工。这类宣纸普遍不会渗洇，书画皆宜，有特殊效果。

可见，不同宣纸对书画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影响程度的大小，则取决于书画家对纸墨的熟悉程度和驾驭能力。当然，初学者不必都用宣纸来练字，采用旧报纸，毛边纸等即可。

五、关于临帖

临帖的重要性如同开车上路前，先得学会驾车的基本技能才行。这些技能是无数先人的总结，老老实实在地跟着学，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书法作为一种书写的技法，主要是要处理好大脑、手、笔和纸的关系。其中手是主要环节。当手能够灵活到几乎无需大脑指挥，下意识也能把笔划写好，那么你的写字也就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了。这就如同开车，当手感练到很自如的地步了，才有可能应付各种路况。倘若一边开车，一边还在想手应该如何动作？这个车是断然开不好的。

写字也是这个道理。要使自己的手能够“自主”地行笔，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必须反复练习，不断地修正。这比学开车要难得多。开车，只是手与机械的关系。当机械接受手的指令后，后面的动作都交由机械和电子去完成了。而写字则不同，还要兼顾手和笔、笔和纸的联动关系。所以要花大力气去临帖习字。

临帖也有诀窍，一味埋头临帖是不够的，要与记、背、悟相结合。在临写中对某些笔划的处理，可以试着用不同角度去写来作比较，以加深对法帖的领悟。每次临写好的字，最好贴挂在墙上，经常地观看琢磨。当你发现自己前面写得不好，也感觉到不好的原因，说明你已提高了。

六、练字的目的和步骤

不练行书，是否可以直接进行草书练习，犹如不练楷书能否练习行草一样，我以为没有必要太过纠结。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练字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从直接原因来说，练字就是通过反复的实践，达到灵活运用手中的毛笔写出得心应手的漂亮的书法作品来。这个过程，是一个心、手、笔如何做到高度协调的过程。也即，你觉得自己有能力把握协调了，那么从什么书体入手都可以。

其次，从一般习书的规律而言，总是从相对来说“四平八稳”的楷书、篆书、隶书入手，比较容易掌控，行书次之。而草书中章草尚可，今草难度就大些。因此循序渐进，或许更适应初学者。有人把楷书比喻为坐，把行书比作走，把草书比作跑。以为像一个人，连坐走都没有个样，怎么跑？说明练书法，离不开基础。只有基础学扎实了，提高才有可能。

最后要说的是练书法的基础是什么？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得心应手。因此，关键在于手。手指、尤其手腕的灵活性至关重要。提按使转诸多笔法，都要通过手来“自主”完成。就如一位好的驾驶员，练到手能下意识灵活操作了，你的车一定开得好。书法练习也如此，心手的高度统一协调是终

极目标，而不必纠结于从何种书体开始。

七、关于书法欣赏

时代在发展和进步，书法也是与时俱进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落实到具体某个当代书法家，就需要具体地去分析他（她）到底进步在哪里，有哪些发展和创新。如沙孟海、沈尹默、费新我和女书法家周慧珺等，他们的书法实践和理论较古人是有所突破的。我们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应当不薄今人爱古人。

大师可有两类：一类是技能型大师，一类是精神型大师。书法、绘画、雕刻等以技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其中在该领域有突出贡献并独树一帜的，都可以归类到技能型大师。而像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以及世界上苏格拉底、孟德斯鸠、释迦牟尼、泰戈尔等就属于精神大师了。他们一般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他们的思想成为了人类的灯塔。

技能类大师也可以上升为兼具精神型大师。如王羲之、颜真卿们，不仅书法达到了巅峰状态，而且他们的思想文章和人格魅力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成为指引人们追求真善美的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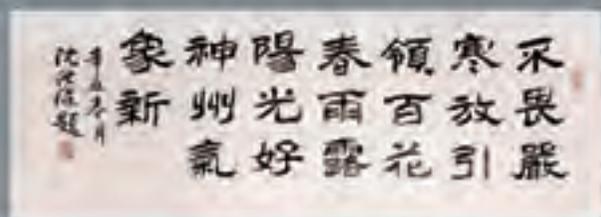
现实社会中不乏书法方面的技能型大师，但缺少技能和精神二者相兼的大师。因此他们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局限就是必然的了。

责任编辑：孙任翔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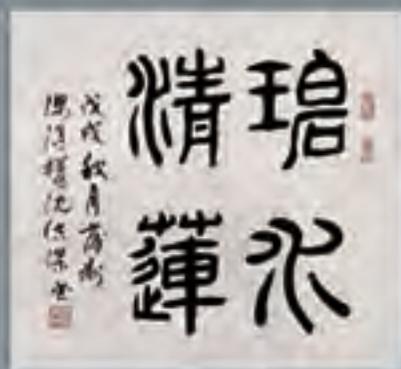
书画精粹



梅花立轴



碧面牡丹



篆书斗方

沈济镇，1964年生，1985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留校从事训诂和古代文学教学工作，后调任浙江师范学院《汉学大讲坛》主要讲席人员之一，讲稿后结集《河白集》《浙江学刊》《权力与罪》《沈氏讲读文集》《从经史子》等。后辞官，一直从事浙江万里学院教学工作，出版《河白集》、《沈氏讲读文集》、《从经史子》、《河白集》、《沈氏讲读文集》、《从经史子》等。后辞官，一直从事浙江万里学院教学工作，出版《河白集》、《沈氏讲读文集》、《从经史子》、《河白集》、《沈氏讲读文集》、《从经史子》等。

封面题字：俞坚平

封面摄影：吴 莹

封底篆刻：沈洪保

装帧设计：方立庭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